甚麼叫80後

80後的背景

八十

八十

八十

80後

80後

80後

80後

80後關心的是甚麼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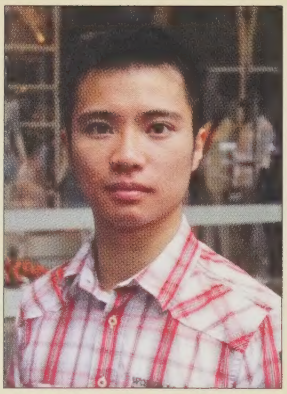
EAST ASIAN LIBRARY
31761 08877002 9

香港新青年革命

八十後運動

林匡正◎著

次文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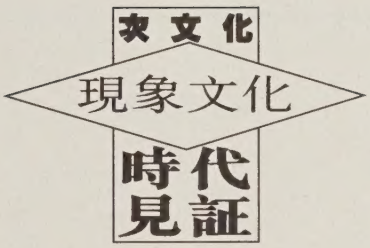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林匡正 筆名武大郎，一九八三年生於太平盛世的香港，熱愛中華文化，以中國人身份感到高興，以振興社會為己任。曾就讀於香港培正中學和英國波爾矛夫大學。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8770029

次文化現象文化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七十三

八十後運動

香港新青年革命

林匡正⊙著

次文化堂出版

LIBRARY
FEB 08 2011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ENG YU TUNG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㊸

八十後運動

作　　者：林匡正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0 年 5 月初版
書　　號：SCB522
I S B N：978-962-992-240-5
定　　價：HK$80
©二〇一〇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前言

其實人是不應分甚麼80後、50後、70前、第幾代等等，而我也不能代表其他同齡的人，但希望這本書能使大家去理解年輕人同時，提供多些角度去讓大家思考。這本書的主角，乃一群關心社會、關心香港、熱愛身邊的人和事的市民，他們有些較多參與社運，而被傳媒標籤為「80後」。「八十後運動」的「80後」就是指那一班人，並非一定是80年代出生的。

有說80後是生在溫室的一代，有父母安排道路，小至興趣班編排，大至選讀哪間學校、讀甚麼學科，都已有人好好安排，但當偶有不從，希望決定自己的前途，會被視為反叛。

有說80後從小嬌生慣養，少去體諒別人和關心社會，但當長大了，意識到應關懷身邊的人和事，發現很多人因無權無勢而不斷被無理欺壓，於是便伸出友誼之手，以將心比己之心為被欺壓的朋友討公道，卻被別人標籤為搞搞震、破壞社會和諧、不知足的只懂投訴。

80後較普遍的有精美玩具，活在遊戲機和電腦世界，缺乏接觸大自然和真實世界。但當意識到應重返自然生活、保護大自然、尊重令世間美好的花草田野時，卻發覺社會為了建樓，不斷破壞大自然，不斷污染環境，於是便

挺身而出去保衛自然世界，卻被視為阻住地球轉、阻人發達。

有說80後缺乏思考，但長大了發覺所謂教育只是在培訓自己為賺錢機械的填鴨教育，於是產生異見，認為公義應比錢更重要；意識到在地產主導經濟和高地價政策下，工資水平、打工仔、中小企永遠是被犧牲或壓迫的，因為話語權永遠在大業主手中。不論經濟好壞，大地主也可任意加租，因此我們衣食住行，行街、睇戲、食飯，花大量金錢去購買產品或服務，那些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大部份是被租金所佔去，所以不論經濟好或壞，貧富懸殊也不斷增加。打工仔根本毫無議價能力，面對工資被削，打工仔除了離職或啞忍，是別無選擇，正如店舖面對租金上昇，除了照租或放棄店舖外，也別無選擇。這全因政府財政單一地、過份地依賴賣地收入，地產商便是政府政策偏頗下的既得利益階層，加上他們有政治特權，在立法會功能組別有很多票，在特首的小圈子選舉中有極大影響力；在不民主選舉制度下，特首及其班子和部份功能組別議員不得不向地產商叩頭，以及保護高地價政策和地產主導主義來保障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卻犧牲了沒有政治特權的一班中下階層市民。

於是80後便向造成不公義的權貴抗爭，卻被視為無事生非和自己找自己笨。究竟80後是否外界想像般本那麼差？希望此書能給讀者一些觀點去思考。

代序

快樂的抗爭，溫柔的解放

陳雲

呎價八萬，時薪廿元。激進的老虎蟹出洞抗爭，沉睡的河蟹醒覺過來，紛紛吶喊助威。2010年4月，中大亞太研究中心公布香港社會和諧的調查結果，說香港有25.9%的人不抗拒激烈鬥爭，化成人口數字，是153萬人。報章及學者分析，香港社會不和諧，甚至有暴動之虞。今年元旦遊行的時候，以巴勒斯坦頸巾蒙面的少年，高舉抗議牌，說「這是一個警告：我們對狗官沒有耐性，已準備暴動及流血。」網上也成立了相關的Facebook群組。原先以為是若干青年激進而已，調查公布之後，認同這些口號的，有幾十萬人也不定。

黃毓民扔蕉，曾蔭權低頭。這就是抗爭的力量、抗爭的收效。從反高鐵運動算起，80後青年的抗爭，令很多市民知道激烈抗爭其實也在安全範圍，沒甚麼大不了，而且有效果，起碼政府對菜園村的安置問題已經軟化了，大角嘴舊樓的地基影響，也獲得正視。青年為了香港整體福祉的關懷，我想很多市民都不會無動於衷的。香港的社運前輩等了許久，才找到隔代的傳承人，而且手法和理論比以前更進步，更有視野。吾道不孤也。

激烈抗爭是理性的選擇

有些報紙詮釋香港會有暴動，難免令官員驚怕。然而，民不畏死，暴動比在家集體自殺，來得有益及有建設性。

上世紀70年代港英的福利、政治諮詢甚至文娛政策，起因就是1967年的工人暴動。當政府不再回應民眾的正義訴求，民眾僅有的武力和生命，就是最後的本錢。活得有如等待屠宰的畜牲，有如等待輪奸的性奴，當人民認清了自己的處境，有人拿性命去賭博，或者在旁邊吶喊助威，是極其理性的行為。暴動，比起在家中燒炭，或者為一位燒炭自殺的親屬而哀嘆，來得更有道理。

嗜血、發泄、好勇鬥狠，是人的天性，只是文明社會教化之後，令人覺察如果團結和諧，可以一起達到更佳的人倫歡樂和物質生活，便應該放棄暴力，交出兵器，將暴力的專利權交託予可以信賴的統治者，這是法治政府的原理。然而，現在的香港人，有人倫歡樂麼？有很好的物質生活享受麼？如果兩者都沒有，又要捱生捱死，時薪二十元，被地產財閥、政府高官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不斷剝削和出言侮辱，這種生存，有意義麼？與其吸毒飲酒麻醉自己，與其躲在家中打罵親人，怎不上街激烈抗爭？或者最少支持人家激烈抗爭？如果激烈得來又有文化娛樂創意，快樂抗爭，歡樂今宵，那就更加 very good 了。

民意的可塑性

看官，如果你讀了上面的文字而覺得有道理，或者蠢蠢欲動，不論是做上街的老虎蟹還是靜靜支持老虎蟹的覺悟河蟹，也許，亞太研究所的調查是可信的。

王朝中國第一明君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對答，最著名的就是民意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意如水，以為人民冷漠，熱衷私利，誰知給予火力助燃，是可以沸騰起來的。這是民意的可塑性，以前一位共產黨老幹部向我說過，「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這當然是極端的講法了。然則，民意確是受到行事條件、安全性和可得的效果而改變，裏面有理性的因素、感性的動力。比如說，愈來愈多的和平示威者被警方控告襲警的刑事罪行，而不是阻差辦公、行為不檢等政治罪名，民眾就會真的動手打砸，不打白不打嘛。我在2010年1月26日在《信報》寫文章「(曾蔭權) 如何毀滅一隊警察」，警告過港府之後，警方就不再以襲警罪名控告和平示威者了。他們也不真的是政治白癡啊。

所謂安全性，就是「法不治眾」，只要激烈的人聚集夠了，有了群眾動量（critical mass），政府就只能容忍激烈行為，民眾對激烈抗爭的看法也會改觀。如果激烈行為帶些調皮幽默、文化雅興與本土情懷，民眾甚至當作是有政治作用的文化享樂。是但男、巴解男、扔蕉大哥、扔鞋小弟、街頭和議會的溫柔烈女……，都比「打工權」和「張廿蚊」更能引起共鳴，帶來更多歡樂。

也許中國永遠需要香港

《尚書》有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都是有血有肉的生靈，是感受到時代危機的。百姓有怒火，顯示社會有危機，有智慧和仁心的統治者便要改革，孚應民心。

香港並無戰亂，社會也很太平，但香港危在旦夕。以中國全局而言，一國兩制是必須維持的，香港的整體經濟繁榮和真實的政治和諧，對中共有利。香港是中國的金融活口，沒了香港的緩衝，中國很難逃避一場金融洗劫，落入1997年的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命運，甚至更早的菲律賓和南美國家的命運。而以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和社會人心來看，中國也許永遠不會有憲政民主與社會和諧，面對內外夾擊，中國也許永遠需要香港。中國愛護香港，是出於自利，而不是出於憐惜。4月7日，中央政府高調出席廣東省與香港之間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簽訂儀式，確保香港的金融領導地位，也許覺察到危機所在。香港不保，大陸便要在金融和政治上直接面對美國，這會很刺激，但絕不是好玩的游戲。

全國一盤棋。看穿這棋局，香港人要這要哪，打打鬧鬧，都不是問題，而且打鬧要趁早。這就是政治判斷，就是我一貫說的香港生存公式：以政治特權換取經濟特權。只要玩好這一招，香港永遠有運行，人民永遠有得撈。然而，也有很多富豪、高官和土共，都叫香港人不要搞政治

的。為甚麼呢？因為他們是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並且以代理人的身份——即是政治買辦，撈得風生水起。然而，他們是稱職的中共代理人麼？

代理人失職，香港危在旦夕

香港的特殊地位，正受到兩種非理性的權力擴張所侵蝕。第一，是中共無法在香港直接統治，其所委託的政治代理人（proxy），不論是土共還是港英餘部，都是不知自我克制，夾帶私貨，上下其手，發展勢力，撈取非分的利益。不論是港府和民建聯，官僚勢力要膨脹起來，都是非理性的巨獸（Leviathan）。可惜，即使港官權力膨脹，遇神殺神，他們都是吃裏扒外，不盡代理人之責，不去調和北京和香港之間的衝突，遇到民怨，便使出一招「仙人指路」，將衝擊香港政府總部的民怨，指引去上環的中聯辦，自己「走精面」，坐山觀虎鬥，要阿爺做醜人。至於民建聯，本來是勞工階級的代言人，可惜中共走資之後，土共又沒智慧，不能維繫其中間身份，反而愈來愈走資，成為香港財閥黨派的附庸。如此，香港的勞苦大眾便失去代理人，要親自上街爭取了。

至於香港的地產財閥，則因為代政府預收三數十年的稅（樓宇供款），也以土地收入來供養政府，勢力坐大之後，盛氣凌人，也有非理性的擴張和剝削，不惜殺雞取卵。香港是他們的老本營，沒了香港，他們是沒處謀取暴

利的。他們能去大陸落腳嗎？能去美國與人家玩嗎？然而，若非受到民主制衡或政治調停，資本擴張是瘋狂的、非理性的、自挖墳墓的。近日，個別發展商也認同復建居屋，有些富豪的第二代，也許察覺到社會不利，出來搞甚麼「香港精神大使」運動了。然而，這與政府高唱獅子山精神一樣，是沒意義的，只會令人民討厭。

快樂地抗爭，溫柔地解放

「80後」的出現，提醒香港的本土身份覺悟，新一代真的以香港為家，不容財閥和高官上下其手，破壞香港人的家園。而且，他們不是上一代火爆爛撻的革命青年，他們很多是溫柔的素食主義者和田園生活愛好者，甚至視抗議、絕食和苦行是身體和靈性的修煉。他們運用新的知識工具和動員網絡，剖析官商勾結的制度，解放香港人的思想，身體力行，付諸行動。

快樂抗爭是很理性的，很過癮的，而且有實效的。不玩，香港就會玩完。不玩白不玩。

目　錄

前言

代序（陳雲）

第一章 • 甚麼叫80後？ 3

第二章 • 80後的背景 9

第三章 • 八十後運動 23

第四章 • 撐高鐵、反高鐵 71

第五章 • 各界訪問 129

第六章 • 八十後運動探討 243

第七章 • 80後的本質和特徵 253

第八章 • 政府的謬誤 263

第九章 • 四代香港人PK 80後 285

第十章 • 我們的80後 309

八十後運動

香港新青年革命

第一章・甚麼叫80後？

踏入2010年，香港突然多了一個常被傳媒和大眾掛在口邊的名詞——「80後」。那麼「80後」代表甚麼？從字面解釋，「80後」代表一班從1980至1989年出生的人。亦都有解釋指「80後」代表1979年以後出生的人，但這個解釋有點兒牽強。第一，「80後」一詞也同時衍生了「60後」、「70後」、「90後」等詞，如果「80後」包括了所有1979年以後出生的人，那麼1989年後出生的人算是「90後」或是「80後」或是兩者皆是？ 80年代出生的人又可否算是「40後」、「60後」、「70後」的一份子？為了避免混亂，「80後」代表一班從1980至1989年出生的人好了。

美國的Y世代

在香港開始為這班從1980至1989年出生的人給一個尊稱的時候，國內和外國不少國家一早為80年代出生的人給予專有的名詞了。就以美國為例，早在90年代初期，美國人給了從1980到2000年（有的是從1976年開始而非1980年）出生的人一個名詞——Y世代，又稱Y一代或世紀一代，英文叫Generation Why。美國Y世代的特徵是生於一個科技開始起飛

和經濟極為富裕的時代。Y世代的孩子多在父母、長輩的一片讚美聲中長大，不論做事或是學業的成績是好是壞，都會得到讚美和鼓勵。這些孩子聽得最多的字詞便是well done、nice、great，即使成績不好，聽到的也只是fine、that's ok，絕少會被責罵，所以有人亦叫這一代的人為寵壞的一代，他們因受到過量的讚美，往往經不起考驗，一遇上挫折，便特別容易感到失落和沮喪。

國內的80後

而國內更是早早便已有「80後」這名詞了，也是給1980至1989年出生的人的統稱。國內出現「80後」名詞的背景是從1979年起，政府便把計劃生育確認在基本國策，而這計劃生育的政策便是一孩政策，規定住在城市的夫妻只能生一個孩子，否則便會被處分。因此「80後」在國內也可被用作是獨生子女的代名詞。由於是獨生及生於相對富饒的年代，國內這些80後的孩子多是萬千寵愛在一身的小皇帝，他們多嬌生慣養，和美國的Y世代一樣，同是被寵壞的一群。當然，80後的出現亦標誌着中國開始進入一個男女比例失衡的新世代。在重男輕女的傳統價值觀下，為了能生男孩，女嬰被遺棄和殺死的數目直線上昇，導致社會出現男多女少的情況。

國內的80後也常進入互聯網世界，多在網上討論一些時事，在博客抒寫己見，用web2.0即時吸取世界各地和香港的

各種新聞。如「做人不要太CNN」一句流傳，源於北京80後在網上成立了反CNN網站，用「做人不要太CNN」來評論美國傳媒選擇性報導西藏消息的新聞。

似乎國內普遍對80後的評價也不太好，但隨着無數的80後在四川大地震後，不收分毫、不怕危險的到當地做義工振災，去拯救落難的同胞以及無私地參與08北京奧運當義工，使到當世人認識到他們無私奉獻、愛國愛民的一面，評價也立刻大大提高起來。於是乎國內便多了一個新名詞去正面的形容80後——「鳥巢一代」，一個以北京奧運主場館命名的詞。

香港的80後

那麼香港的「80後」代表甚麼？是否所有由1980到1989年出生的人都會或可以被稱為80後？在香港，「80後」一詞是和那些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被捆綁在一起。你會發現那些參與「反高鐵•停撥款」、六四晚會、元旦遊行的年輕人會被稱為80後，但那些反對參與街頭運動、支持高鐵總站建於西九、堅持不參與六四晚會而同時在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如呂智偉、陳一諤、青年民建聯的張思晉和季霆剛（那位因從公民黨改投民建聯而被稱為「劉江華二世」及開始為外界所注意的年輕人）等人不會被稱為80後。

「80後」是傳媒給予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的概稱，因那

些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是以80年代出生的人為骨幹。其實「80後」應是「憤青」一詞的延續和改正版，估計是傳媒發現之前把那些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叫作「憤青」是有欠公允，故改以「80後」來稱呼他們。

至於「80後」一詞第一次被傳媒廣泛運用，可追溯到2009年的六四20萬人燭光晚會上，一班在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自稱為80後，他們宣稱不會因在89六四發生的時候自己的年紀仍幼小而不去紀念六四；反之會從80年代出生的人的角度去看待事件和分享他們對於六四的體驗。自此傳媒便開始用上「80後」一詞去形容關心時政兼參與社運的年輕人。

事實上，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不一定憤怒。他們是熱血的，但熱血並不等於憤怒。他們多是理性的及以和平方式來表達訴求，叫作「憤青」真的是有點兒不公平，因為多數人都把「憤青」和不理性連在一起。

總結來說，最標準的「80後」解釋，就是一班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

第二章・80後的背景

背景

要剖析80後的本質和特徵，就必先探討80後生長在一個怎麼樣的年代。究竟80年代是一個甚麼樣貌的年代？它對80後的本質有何先天性的影響？

前所未有的身份認同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雙方聲明中國會在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主權。這一下的意義可謂極奇深遠了，香港人終於望到自己能當家作主的一天。在回歸的時候，最年長的80後也只是17、18歲，這標誌着當80後成為成年人的時候，無論在血統上還是在政權上，他們的身份是個百分百的中國人，是香港正正式式的主人。80年代出生的人們是第一批不需以成人身份去作為英籍華人的一群，他們對中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比80年代前任何一代出生的人為高的。在他們出生的時候，他們就知道他們將會成為香港的主人，能當家作主。而身份的認同，種下了80年代起出生的青年人關懷社會的幼苗。

爭取是天賦的權利

80年代香港開始了一個令民權抬頭的運動，這就是爭取直選的運動。雖然88直選的爭取失敗，但憑着港人鍥而不捨的精神，終成功爭取到91年立法會選舉及89年的市政局選舉引入直選議席。雖然爭取路中港人多嘗艱苦，但只要抱着永不言敗的精神，最終是會成功的。

同一時間，世界發生了「蘇東波」事件。憑着堅決的人民力量，在蘇聯、波蘭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的人民，成功顛覆百廢待興的共產政權，踏入了民主自由之路。

不論是香港的爭取民主選舉運動還是世界性的推倒共產黨政權運動，同樣地為80年代打下了人民力量萬歲的社會價值。只要人民的力量夠堅定夠團結夠強大，便可「敢教日月換新天」，沒有甚麼事情是爭取不到的。人們在80年代的行為給80後灌輸了一個新社會價值和思想，只要是對的或是應有的權益，努力地爭取是天賦的權利。

先天性抗拒中共政權

1989年的中國可謂多風多雨的中國，國外一個個共產黨盟友岌岌可危，國內中共政府要面對數以萬計的學生在天安門靜坐，要求為胡耀邦平反、反貪腐反官倒、爭取民主改革的運動。而香港也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國內

的學運。可惜中共政府最後選擇以血腥鎮壓來清場及驅散人群，即發生了中國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六四天安門事件。

六四事件和接着中共政府對不少參與學運人士的秋後算賬，不但打破了無數港人的心，也打破了港人對中共政府的信任，導致接踵而來的移民潮和抗拒中共政權的心理。而這個抗拒中共政權的心理，也由成人心裏潛移默化到下一代，造成80後普遍地先天性抗拒中共政權的心態。

80年代的背景帶給了80後的三大社會價值，便是對自己能當家作主與中國人身份的認同、用人民力量爭取權益是應份的和中共政府難以信賴。而這三個社會價值正正可解釋到為何80後的一群那麼熱愛香港及以香港人自居、那麼樂意與自發的用人民力量去爭取權益和普遍的不大信任中共政府。

80後面對的困境

在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在現今社會上面對不少困境，這些困境有可能是推動八十後運動以及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多關心社會各大小事的因素。話休饒舌，先討論一下80後面對甚麼困境。

缺乏向上流的階級

相信不會有太多異議的，是80後正處於一個嚴重缺乏

向上流動的階梯的社會，不管他們怎樣努力的工作、怎樣有才能、有創意，機會和利益皆被既得利益者霸佔着，導致香港雖然經濟發達，但財富分佈嚴重不均，經濟好時打工仔加薪追不上通漲和物價，不管經濟怎增長，基層也分不到成果，中產也只是在通漲下生活壓力不斷增加，開支交稅有增無減。經濟差時減薪卻超越通縮，還要被大量裁員，頓失依靠。無論經濟好或差，得益的只有大地產商、大企業家們，基層甚至中產永遠是被剝削者。這全因社會資源、機會全被一班既得利益者操控、官商勾結、政府無能和政策偏袒既得利益者，導致社會流動階梯被打斷，中下層再努力也只夠餬口，無法爬上社會上層。工資常被無理壓低，經濟成果由管理層獨享，付出的努力得不到應有回報。

GDP近12年上昇近5%，但收入最低的30%人士收入反下降、工資最高20%的人擁有全部工資的50%；貧富懸殊不斷加劇，35萬兒童來自低收入家庭、堅尼系數長期高於0.4的警戒線、貧窮人口超過120萬、拿取綜援的人數已多達50萬；這些數據正好說明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產生的弊端。

在向上流的階梯被堵塞後，80後根本看不到曙光、看不到前景、看不到自己有擢升的機會。從前即使是從事基層工種如扛抬和五金，也能看到出頭的一天。現在則只要知道明天還能上班已是萬幸。前路茫茫是80後現今的處境。

第二、三代港人居住的香港雖則比現在的香港貧窮和

落後不少，但當時的香港生機處處，不論出身較好的或出身低下的，有着同等的機會更上一層樓，不像現在那樣，富的更富，窮的難以脫貧。上一代生活成本和物價較低，水平合理，男人獨自出外也能養活一家四口，有冒險精神的，只要夠眼光，隨時製造出小本創業神話，現在公一份婆一份也只夠餬口。上一代社會不斷進步，整體工資不斷上昇，現在社會越發達，工資則越低，上昇的只有樓價和鋪租。從前即使收入不足也可兼職數份，多勞多得，現在天天OT，放工時已八、九點，想兼職也沒有時間。

現在生活成本甚高，養活一個兒童也要數百萬，創業者被大業主以租金上昇手段不斷壓榨，不少因此而結業，能應付高昂租金的只有大財團，中下產難以匹敵瘋狂加租行為。

置業成為極困難的事

上一代港人，安居和置業並不是甚麼遙不可及的事，但現在新一代的港人，即使怎樣努力工作，隨時連一中小型普通單位也買不起。皆因現在樓價飆升得脫離現實，樓價上昇速度遠遠拋離工資上昇的水平。尤其是年輕人人工不斷下降，大學生畢業後也只得數千人工，但學費卻有增無減，但一層普通中小型單位也要三、四百萬，年輕一代要置業是難過登天（買豪宅更是痴心妄想）。樓價迭創新高，年輕人為買不起樓而愁懷萬縷。如果父母的餘蔭不足，雙親沒有樓，新

的一代便差不多注定一世處於貧窮階級。連大學生也難以買樓，家境不好的一群中下階層根本難以脱貧或爬上上層。即使勉強買得起樓，租得起鋪，也因樓價鋪租極其昂貴，市民大部份的收入也是奉獻地產商，供完樓時已差不多退休，大部份青春和金錢也落入地產商袋中，香港人差不多一生只是為地產商打工。在70、80年代，供樓普遍不用10年，現在供20年甚至30年也比比皆是。政府政策只重視地產商利益，令到香港樓宇買家無議價能力，樓價全由大地產商控制，當年的孫九招和市建局重建市區是以地產商能發展豪宅賺錢、使原區的窮人不能重返原區和改善生活的政策都是好例子。在封建時代，農地資源被地主階層霸佔着，使到其他以農維生的人被逼做「農奴」；現今卻因土地資源被地產商霸佔着，置業的人被逼做「房奴」。

面對巨大的就業問題

80後平均學歷比上一代提昇很多（擁有大專學歷的由96年的一成八上昇到06年的三成多），但因政府制定政策時規劃不足，沒有考慮社會沒有相應地增加適當工位，造成工位供不應求，很多高學歷的被逼做以前只需低學歷便可做的職位，而低學歷的就業就難上加難。結果80後想找份平穩的工也困難重重，大專畢業生要為找工作和失業問題而懊惱，在從前是十分罕見的。年輕人收入下跌，但其他年齡組別收

入卻上昇（20-24歲的收入中位數由97年的$8,200跌至08年的$7,500），收入下跌和不穩就是就業困難帶給80後的困境。

官商勾結嚴重

由於政府政策上的偏袒和欠公允，使日益關心社會狀況的80後意識到官商勾結嚴重，而這和制度上的缺憾有關。在目前的制度下，除了800人的小圈子可以選特首外，普羅大眾投票選特首的權利是被剝奪了的。難怪政府的政策很多時是偏向小圈子既得利益者，因為特首是他們才可以選出來，問責高官又是由特首委任。所謂的「港人治港」只是由一班小圈子既得利益者治港、由一位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的港人治港，並非由普羅市民授權的人治港，並非真正的「港人治港」。普遍香港人根本分不到應得的政治權利，更遑論經濟成果。這也說明為何政府常被質疑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如西九龍單一招標、紅灣半島事件和數碼港貝沙灣事件全是好例子。這說明了為何兩任特首總被批評為只為少數權貴和大財團服務。政府政策向大財團傾斜，令到社會資源、機會全被一班既得利益者操控。

在立法會上，普羅大眾只得一票選地區直選議員，但一些小圈子既得利益者有兩票甚至數票，越富有就越多票。而功能組別本身也貧富懸殊嚴重。功能組別只得20萬多選民，但單是教育界就7萬多名選民選一代表，醫學界和社福界又

是數萬人選一代表。大部份界別只得數十和數百位選民就可選一代表，非常不公平，代表非常不廣泛。由於立法會是採用分組投票，由全民選出的直選議員的權力和由小圈子選出的功能組別代表均等，很多普遍得到市民支持的議案如勞工要求有集體談判權、最高工時、僱主無理結業拖欠員工薪金列為刑事化、平反六四、否決九巴加價9%的申請和藍領要求和白領看齊，每年有17日法定假期等等，即使在多數直選議員支持下，也因被過半數功能組別議員反對而令那些得到多數市民支持的議案不獲通過。功能組別的存在就是維護少數既得利益者利益來剝削多數人利益。這也說明為何民主派在選票上是多數，但在議會內反成為了少數。立法會制度的不完善，也加深了80後和市民認同官商勾結的程度。

要減低官商勾結嚴重的問題，第一必先解決權利貧富懸殊問題，就應由改善立法會選舉制度和普選特首開始。政治制度不改革，即使是換了特首人選，也不能改善香港的管治質素、減低官商勾結的容易度來改變官商勾結的狀況。

可惜政府不單無法解決貧富懸殊、社會經濟失衡的情況，政府政策上的失衡和制度上的不公令問題日益嚴重，令到新一代的港人抱怨日深。養一個孩子要數百萬、買樓又要數百萬，但每月人工只有一萬多，叫人們怎生活？就業難，置業難，結婚也難（欠缺足夠的資金支持），但80後偏偏生活在一個價值觀是沒有房子沒有家的社會，社會價值觀把幸福

生活和擁有物質能力掛鉤，這便使80後感受到他們正被社會所看輕，巨大怨氣也應運而生。80後的社會地位不被肯定，只好在別的方面找肯定及去改變社會，參與社會運動是方法之一。

面對生活環境被嚴重破壞的問題

除了面對難以安居樂業的困境，80後還面對其他困局。80後正正活在一個連吸口新鮮空氣也困難、污染嚴重的地方。而帶來這困局是因香港過去甚至現在，因只顧發展經濟而忽視其他因素，導致污染問題嚴重、生態及舊有的生活環境被大大破壞，寧謐的鄉郊差不多難以復見。但80後是無從選擇的，生態被破壞和污染禍害日益強大，使80後開始關心環保、保育、城市規劃等問題。這也是80後向政府和工商界發出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便需平衡各方面的因素的訴求。

回歸後經歷過政府無數次誠信破產

回歸後經歷過政府無數次誠信破產亦是80後面對的一大困境。當權者只懂滿口才猶的吹水、只懂陳腔濫調的吹噓，卻不懂兑現承諾。譬如科技港、中藥港等多次的假大空、八萬五的落空、引頸以待的曾蔭權普選玩鋪勁承諾沒有兑現、曾蔭權在97年表示經濟不會衰退，怎知金融風暴隨即而來、政府表示香港經歷金融海嘯後開始見到曙光，但隨即以雙底

論來推翻自己說法等等，已使80後對特區政府多次失去信用而感到困倦和不滿。這和回歸後政府表現強差人意同樣使80後對政府失去信心的一票。

固然80後面對的困局，是我們探討八十後運動成因所不能忽視的，但80後的一些共通點也可成推使八十後運動出現的理由。

80後的共通點

互聯網乃主要媒體

隨着互聯網在90年代的迅速發展，接觸和使用互聯網已經是80後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他們多愛使用互聯網，MSN、Facebook、Twitter等等，成為了八十後運動不能缺少的配套。和上幾代多是從讀報、看電視、聽電臺等得到新聞知識不同，80後多從網絡世界吸收所知。

土生土長

80後和上一代不同，上一代大部份是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移民潮來港定居，但80後則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因此80後對香港的歸屬感比任可一代也要大，對保護香港的生活環境更關注，也使80後產生保衛香港、保衛出生地的決心。

教改的試驗品

80後不少是政府十多年來教育改革下的白老鼠，使他們感到自己是政府不斷探討不完善政策如何改正的犧牲品和政府朝令夕改的受害者。

種種的共通點，不多不少把千萬個獨立不同的個體連結在一起，如若再配上共同話題、共同目標，隨時成為一群眾運動。

第三章・八十後運動

八十後運動成因

一個運動的成因可有千千萬萬個，一個運動吸引人加入可有千千萬萬個理由。同樣地，八十後運動成因繁多，有些人可能只被當中一個成因吸引而去參與八十後運動、有些可能要好幾個，總之人人參加運動的因由皆不同，現在約略描繪一下其中較易為大眾所理解和想像的成因。

為了自己的原則和信仰走出來

現今香港充滿着不公義、不公平、不平等，很大程度是政府欠缺誠信、官商勾結情況普遍、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偏袒既得利益者、社會不斷發達但貧富懸殊加劇等因素造成。紅灣半島事件、嘉亨灣事件、梁展文事件，等等，只是多次官商勾結事情中的冰山一角，但已足夠讓人們認清政府常為了少數富有人士權益而去出賣大多數人利益的面孔。這便促使一班以保衞香港、保障出生地、保護一個屬於自己的社會為原則的年輕人產生了要為不公平發聲、為弱勢社群高呼、誓要確保公義於社會得到彰顯的信仰。正因社會的不公義造

成國富而民貧的情況，愛國愛港的年輕一代只好搖舌鼓齒的去宣揚反對不公義的訴求。

現今的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正正就是基於原則，為了宣揚自己所信的而走出來。當中不少年輕人可能根本不會牽涉在內，但基於有顆路見不平，發聲相助的心而走入群眾中去抗爭。

八十後運動最基本的一個成因就是年輕一代、對社會有盼望的人為了宣揚自己的原則、信仰、訴求，為了追求民主、自由、和平、公正、人權得到保障等普世價值而親身站出來爭取。80後面對社會問題不會逆來順受，而是敢於挑戰權威和爭取社會應得的公平和東西，如清新空氣、清潔環境、安定生活、民主自由等等，而組織自己的運動是最直接的爭取方法。

年輕人信奉理想、抱着原則做人是八十後運動出現的主因之一。

年輕人的思想和聲音不被重視

當年輕人／80後也有自己的思想，對未來也有自己的憧憬時，上一代和有權勢者更不應去介定他們應有甚麼思想和憧憬。正因他們的思想空間受壓逼，聲音不被理會，八十後運動才出現，希望社會能有突破，突破現有的不公平問題和聲音無人理會的狀況。而80後一群透過自己組成的運動明白

到自己是對社會日益重要的一群，加強了八十後運動的連續性，使之不斷出現。

和部份上了岸的上一代有所矛盾

80後和上一代不少人存在不少矛盾和隔膜，為了讓上一代人認清年輕人的一套思想和解決矛盾，不少80後決心走出來表達己見。譬如不少買了樓的上一代，無視樓價脱離現實的問題，希望樓價越高企越好，完全不顧新一代置業艱難的問題，讓年輕人感覺到部份上了岸的上一代自私地置他們於不顧。這也激發了年輕人出來發聲和抗爭，間接加大了八十後運動的成因。

不想香港走向內地化

隨着資訊發達以及後生仔女多留意時事，知悉到內地出現了很多問題，如言論自由欠奉、官員貪腐嚴重、官員倚勢欺壓人民、強行圈地等弊病叢生，他們不想回歸後香港會被內地化，於是便起來行動，避免香港內地化。他們知道內地發生不公義的事情，他們雖想改變之也有心無力，但在相對開明開放的香港，他們有能力做到，激發了他們站出來的決心。

國內為了實行官員口中的所謂「和諧」，便對反對聲音、批評聲音實施封殺行動。所以在內地對不公義發聲、聲討貪

腐的官員和政府，不管是真人或在網絡世界內發表相關言論，隨時招來被打壓、被監視、被剝削自由甚至以言入罪等殺身之禍。但不少敢言直諫之士如鮑彤、譚作人、劉曉波、黃琦等，懷着耿直不阿的性格，以「君不正，以直諫之」的精神，不避斧鉞的進言，雖因此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這些事情一方面使年輕人和80後意識到，在內地即使要講真話有那麼多制肘和危險，也有那麼多人出來說真話，在香港的他們、言論自由得到保障的他們更應好好運用自己的公民權利去為社會發聲；另一方面，內地對反對聲音的打壓及不理會、不聆聽的態度也加深了年輕人對內地政府的不信任，加強了他們不想香港走向內地化的決心。

人民當家作主的幻想破滅

97回歸，使80後在他們出生的時候，就知道他們在回歸後將會成為香港的主人，能當家作主。這個寄望也使80後產生重大的身份認同。所謂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當80後得悉原來回歸後也不是真正的人民能當家作主，自己多年的希望和幻想破滅，令到不少80後對香港政府產生了先天性的不認同和抗拒。

回歸後，作主的不是香港人，而只是專權統治者的奴才。不少80後意識到，所謂的「港人治港」只是由一班小圈子既得利益者治港、由一位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的港人治港，

並非由普羅市民授權的人治港，並非真正的「港人治港」。80後心中的港人治港，是香港由一個真正代表人民的人作領導，而非阿爺的奴才或哈巴狗，更非只向既得利益者服務的領導人來管治香港。而回歸後，先後的兩位領導人，是真正以民為本還是以阿爺為本、以權貴為本，相信不用多說，大家自有答案。即使在回歸後，權力還沒下放，雙普選遲遲未實現，一次又一次的以不同藉口作拖延，這刺激到80後明白只要站出來要求還政於民，他們和香港人才能真正的當家作主。「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樣地，「香港非一黨之香港，乃香港人之香港」，這道理存在着80後的心中。

舊有的爭取方式無效過時

多年來，政黨和從政者們多次為香港爭取權益和普選，但多次也以失敗告終，使年輕人和80後意識到舊有的抗爭手法作用不大，以往的示威、集會、遊行、絕食、搞記招等已經是過時及了無作用，這使新一代參與社運的成員明白過於被動的爭取方式是無效的，因經歷過即使和平地據理力爭07/08雙普選、2012雙普選，也被人大以釋法方式粗暴的用高壓和強權去打壓和平訴求。兩次釋法逼使80後意識到為他們爭取權益的政黨也幫不了他們，但那些政黨還在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的沿用舊有且無效的方法，使80後明白到政黨代表不了他們，便考慮新的爭取手法，促使八十後運動出現。

政黨們，尤以泛民主派為甚，不去改革爭取手法，使之和80後的思想越走越遠。泛民舊有的邊爭取邊妥協邊談判方法已證明了根本不行，成效不大（泛民的爭取方式的成效有時甚至遠低於建制派的手法）。只要泛民一日保持行之已久的爭取手法不變，不管他們演說時言詞如何慷慨激昂，氣魄強盛的空山悲號、縱水狂呼，也無法得到80後的認同。連本應思想最能和80後相近的泛民也不能準確地反映80後的聲音，80後只好自己為自己發聲。

泛民的手法落伍，使年輕人意識到如若想爭取公義得到成效，必須一改故轍，改弦易轍才能。這也說明了為何八十後運動中的爭取手法，是那麼多元化，那麼創新，那麼變化多端，有些更是前所未見、聞所未聞，令人耳目一新。

由於80後和政黨們及泛民主派的距離越走越遠，故他們決意不再倚靠政黨。如（2010年）元旦遊行後，主流民主派如民主黨急於和相對下較激烈的80後劃清界線，社民連又發生所謂的長毛抽陳巧文水事件等，便是80後和泛民距離日深的好例證。

但發聲平臺已被當前的從政者霸佔着，不論是泛民也好、建制派也好，傳媒報導只是圍繞那班主流的從政者而已，其他聲音，包括80後的聲音普遍地不獲重視。80後在缺乏發聲的平臺和機會下，只好自己製造運動和焦點以帶來注視，八十後運動便應運而生。

互聯網的急速發展

互聯網的急速發展，是八十後運動形成的必要條件。互聯網在90年代尾開始發展，現已成熟，成為了八十後運動不可缺少的配件。80後現多於網絡世界的交友站和討論區發表己見、對每單新聞的看法、和別人交流等，如果想組織群眾，在Facebook開個group去召集人便可，可以說是差不多零成本便能組織起一個行動。和其他人溝通，透過Facebook chat或其留言、MSN等通訊設備便可，如若要和別人分享短片和宣傳片段，用YouTube便可，總之非常方便快捷。例如社民連便是最早運用YouTube去宣傳政綱和其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表現，而許文彪片段及「民建聯最無恥」片段正好說明YouTube和互聯網的威力，絕不比主流傳媒遜色，長遠計甚至潛力比主流傳媒更高。不少議題和事件正是先在互聯網上熱烈起來，才引得主流傳媒報導，反客為主，主題由自己定而非傳媒所定，例如港大女生大鬧元朗某售貨店事件、港女大鬧美心燒味師傅事件、甚至高鐵得廣泛報導等，皆先在網絡世界上討論得極為熱鬧和重視，主流傳媒避免落後於形勢才開始大力報導，反映了互聯網的厲害。如其中80後「反高鐵、停撥款」運動中的數次包圍立法會行動，正好把互聯網運用得淋漓盡致；用Facebook召集成員和收集意見，用Twitter戶外直播立法會開會實況，議員和官員表現即時無所遁形。

再者，人們可從互聯網找到平常甚少傳媒報導的資料，

使樂於運用互聯網的一群年輕人，從互聯網上吸收了很多平常在學校、傳媒得不到的知識，使他們更容易有自己一套的價值觀和思考法，以及和主流社會不同的觀點。多吸收更多不同事物，使年輕人更易於創新，於是乎創造新的抗爭手法靈感不會缺乏，令八十後運動更多姿多彩。

因互聯網和溝通科技如MSN、Facebook的進步，使很多互不相識的80後能結識到志同道合的人，不用再依賴地方組織和政黨拉攏；透過資訊科技發達和互聯網發展，80後的個體發現自己是千千萬萬同類人中的其中一個，有相同理念的大有人在，自己不用孤單作戰，遂起惺惺相惜之心，一起運動來抗爭；那就形成了八十後運動誕生的條件了。

對政制缺憾的不滿

社會普遍認為80後的怨氣造就了八十後運動的出現，而80後對前景的擔憂、面對之經濟困難，造成了80後的怨氣。但80後的怨氣，就像80後的聲音和八十後運動的成因，是多元化的，非單一的。對現有制度上的缺憾不滿，尤以對政制的不滿，也是80後怨氣的來源之一。

特首是小圈子選舉的產物，特首要上位靠討好阿爺和在選委會上有極大影響力的大財團便可，令人意識到特首像阿爺和大財團的扯線公仔多於人民之代表或大眾之代表。選委會那班選委，大部份便是那班既得利益者，由既得利益者

選出來的代表，在制訂政策上難免不多不少的偏向既得利益者，其動機是報恩也好，是要鞏固自己的地位也好，皆不能避免給外界官商勾結的形像。而立法會的組成，在功能組別方面，大部份議員皆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但他們具有和直選議員同樣的權力。最弊的是，很多功能組別的議員，多年內皆被評為表現欠佳、常常缺席會議、甚少發言、甚少提出議案、「三點不露」、只是投票機器等等，總之就是劣評如潮。但這班若參加直選九成九會輸的議員，卻在功能組別的結構和小圈子保護下，一次又一次的連任，徒增市民的反感和憤怒。

功能組別的原意是要平衡各方，議會上有均衡代表性，但現在功能組別的制度設計，正正造成了代表性極不平均的現象，直接影響民生。

當然有部份功能組別議員是頗為稱職的，選民人數基礎多的，通常也較稱職；反之，選民人數基礎越低，常自動當選的議員，於每年立法會成績單內表現差劣的一排，總是名列前茅的。在此列一些外界眼中頗為稱職的議員名字，以免他們受冤，如吳靄儀、張文光、劉健儀、梁劉柔芬等。

於是乎，現今之政治制度產出來的當權者，根本就是代表性不足，在80後眼中，那些功能組別議員、特首、眾司局長更嚴重地不能代表他們。當政府吏治不靖、漠視民意的時候，社會上的怨氣便大大增加。而那班缺乏代表的80後，怨

氣之深就更是難以測量。

根據學者練乙錚的理論，大財團（練乙錚本用上「資本」一詞，但筆者愚見認為大財團更易使人明白）已有差不多無限的鈔票去影響社會，已有極大的力量（影響力），而人民的選票就正好形成另一股力量去影響社會，防止大財團的力量為了利益而成為了作惡力量。人民選票之力量和大財團鈔票之力量本可互相制衡；大財團可運用其影響力防止社會因政客們要討好選民而走火入魔，使社會產生大財團口中的民粹主義或過度的福利主義；人民選票的力量就可防止社會利益及資源偏向大財團，使社會發展偏向大財團的利益。

可是政制上的缺憾，大財團比普羅大眾有更多的選票，多了為數很多的功能組別選票和為大財團特設的議席（大財團在功能組別的代表們），造成富有階層越有錢就越多票，越多代表，影響力越大。難怪政府只向權貴問責，而非市民。制度上的不公造成兩股原本可以互相制衡的力量失衡，社會不一面倒向大財團那邊就奇，社會沒有怨氣就奇，80後會滿意就奇。

對政府凡事只從經濟角度出發不滿

從一個有缺憾的政制選出來的政府，自然是一個有缺憾的政府。當真正的老闆不是普羅市民而是阿爺和大財團時，政府和當權者怎不能偏護他們以博取歡心呢。於是乎我

們看見，在政治上，政府只顧向阿爺獻媚，在經濟和資源分配上，政府只懂偏護大財團。當大財團只顧自己利益，忽視其他方面，政府也只好把社會發展的方針調向只以經濟利益去考慮的方向，造成政府凡事只是以經濟利益去計算，為社會帶來很多不良的後遺症。譬如教育政策也利字當頭起來，殺校的準則只以收生人數、學校營運成本和收入收生多少計算，忽視了學校本身的價值、效益、貢獻、教學理念、教學質素的考量，不少有存在價值的村校因而被殺。城市和基建規劃方面，只顧所起之建築有何經濟效益，而不考量其他方面如保育、環境保護等因素。

即使經濟發展有成績，都不是每個階層也能分享到成果，尤其是中下層。因此香港政府行的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主義，而是不公平的單向傾倒性的貌似自由經濟。

而政府除了在經濟發展的成績可人外，其他方面也乏善足陳。全民就業和開工充足情況、改善中產和基層民生、公平分配社會資源和利益等，也是不合格的。

當80後逐漸明白到社會其他因素對發展的重要性時，便會站出來，要求政府改變現有發展方針。

對政府無能的憤慨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政府的顢頇無能和施政上的多次缺失，為社會帶來了很多窘

境，激起民憤，人民怎不會站出來？

其中年輕人對政府未能解決80後面對的困局感到沮喪，故決定組織志同道合的人出來爭取應得的，也因政府的無能在80後廣泛被認同，故運動能一呼百應。

再者，政府多次不守承諾，多次的食言帶來了誠信破產，如八萬五政策的突然消聲匿迹、不少政客在六四前後20年的變臉、曾特首死口否認參加過民運晚會等。而政府對政策「假諮詢」所帶來的民憤也促使80後走出來。政府所謂的搜集民意，全是假諮詢，把合聽的意見寫下，便說政府的政策得到大部份市民支持。這說明為何政府公佈的民意和實際民意有那麼大的出入，西九發展、廿三條立法、港台前途問題等全是好例子。

80後面對政府施政強差人意、誠信多次破產，認識到只有行出來抗爭才有一線生機，不能坐以待斃，促成八十後運動。

政府應對手法差劣

面對年輕人的抗爭，如天星、皇后碼頭保衛戰，喜帖街事件、高鐵爭拗等，政府只懂以高壓的手法對待之，或加強警察運用武力的程度，以大石砸死蟹的方法壓倒年輕人的反對聲音，而不懂同時作出疏導。

面對抗爭，只懂行高壓政策，不懂懷柔政策，使年輕人

對政府更反感，支援的年輕人便越來越多，八十後運動的聲勢便更強大。

和上一代的隔膜

本來和上一代出現隔膜是每代人皆會面對的問題，但當發聲渠道被上一代塞滿了，新一代缺乏發聲渠道，那麼兩代人間的矛盾便被放大了，欠缺發聲渠道的一邊便被逼走出來為自己發聲。

在上一代，只要有大專學位，便等於為事業發展和日後生活帶來了平穩安定的保證。到了現在這一代，因政府近年濫開大專學位課程，大出副學士、高級文憑等學位，但相關工作職位數量沒有提昇，使大專生變得過多，大專生不再是甚麼天之驕子了，價值直線下降。擁有大專學位已不能對找到工作和過安定生活帶來任何保證。當年輕人因此出現怨氣時，有些上一代人便責怪年輕人只懂自怨自艾，不去努力，認為年輕人生於豐衣足食、物質豐裕的年代便不應有多多要求，沒有從年輕人角度和實際情況出發，使雙方出現誤解。

一些買了樓的上一代，無視樓價脫離現實的問題，上了岸就想保持樓價高企，完全不顧新一代年輕人置業艱難的問題。這顯示了某些自私的、上了岸的上一代，因自身利益而置新一代於不顧，新一代只好為自己爭取，自發組織起運動來。

上幾代的人多先考慮自身利益和前（錢）途，例如怎樣賺取多點錢以養家和改善生活、如何才能成為專業人士等；新一代則多考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等。

八十後運動主旨

在歸納筆者能看出的八十後運動主旨前，我們不妨看看80後如何表達自己的主旨。《80後宣言》，是那班在09年六四晚會上自稱為80後的年輕人們發表的宣言，極具參考價值，也可從而認知他們的思想。

《80後宣言》（取自Facebook群組：P-at-Riot：80後六四文化祭）

- 我們保持年輕，讓生命持續燥動。
- 我們擁抱歷史，把已故的美好價值承接到未來。
- 我們保持敏感，發掘美好社會隱藏的虛偽。
- 我們保持發聲，坦率宣說一切不公義。
- 我們保持行動，站在自身不同崗位作動。
- 我們保持開放，容立世上不同知識和立場。
- 我們懂得包容，尊重自身和他者。
- 我們懂得消費，面對消費主義我們知道為了甚麼。
- 我們願意承擔，自己的選擇由自己負責。
- 我們擁有耐性，即使改變遲緩但也不退守。

筆者歸納的80後主旨

從以上的宣言，和80後在不同公開場合的說法，80後的主旨可歸為以下幾點：

- 不是為反對而反對，而是表達出自己的信仰，信奉公平、公義應得到伸展、社會發展要多元化、多從不同因素考慮等。
- 以和平、理性、創新、非暴力為表達訴求的手法。
- 熱愛社會，希望提出的問題能得到社會和政府關注及被理性討論。
- 有自己的思考，不想被標籤為流氓或激進份子。

80後是一班怎樣的人？如何形容？

從80後的成因、背景和宗旨，可得知80後大約是一班怎樣的人：

- 一班關心社會發展、時政的年輕人。
- 一班認清社會真實，認清政府偏袒既得利益者的年輕人——地少人多還狂建豪宅，而不是普羅大眾也能負擔的一個安樂窩。
- 因種種問題，對前景不樂觀、對香港發展感到憂心甚至幻想破滅。
- 雖對前景不樂觀，但會以積極心態去面對和爭取，不會悲觀的坐以待斃。

• 願意保護弱小，保衛環境，保護家園。熱愛香港、熱愛人民、關心時政、關心環境發展、關心保育、環保等問題，關心政府施政的好壞。

• 對政府有訴求的人群。

八十後運動歷史簡介

06天星碼頭事件

2006年，政府因要進行中區第三期的填海工程，需把有48年歷史的舊中環天星碼頭及其鐘樓拆毀。一些市民，包括長春社和不少獨立個體，舉起反填海、保護集體回憶、保留地標、保衛歷史文化和保育等旗幟，以在碼頭靜坐、宣讀、掛大字報、敲鐘樓的鐘、舉行燭光晚會和企圖阻止工人進入地盤去拆毀碼頭等手法，要求政府不要拆卸天星碼頭和要求和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對話。

意義：這班人主要透過互聯網互相號召和聯絡，為日後運動開始了新的主要聯絡、通訊、集合方式的先河。

這次行動維持了大約一個月，立法會議員中除了長毛梁國雄多次到場參與抗爭外，民建聯的蔡素玉，泛民的楊森、李柱銘、陳偉業、張超雄等人也曾到場聲援。是次事件雖以碼頭和鐘樓被拆毀告終，但開始喚醒市民對保育的意識和參與本土運動的觸覺。而民間保育組織「本土行動」，也在事件完結

就值價化文

QUEEN'S PIER
不告別

後成立，活躍的成員包括朱凱迪、何來、陳景輝和司徒薇等。

不過這次事件發生了一些小插曲。抗爭者曾於互聯網上公開孫明揚的電話號碼，使其遭到不少電話轟炸，抗爭者此舉被公眾批評為欠缺理智。而在阻止工人進入地盤去拆卸碼頭時，因曾和工人和警方發生零星衝突和肢體碰撞，令不少人產生抗爭者是暴力和過激一群的錯覺。不過，當時保育運動只是在雛形階段，行動中難免出現差錯，且帶來的破壞性甚低，是情有可原的。

07 皇后碼頭事件

2007年，政府因要進行中區第三期的填海工程，需要把皇后碼頭拆卸。但政府吸收了上次拆卸中環天星碼頭激起民間抗爭和不滿的教訓，表明拆卸後包括牌匾在內的組件，不會運去堆填區，而是將它們保留，在碼頭拆卸後，覓地重建，希望能紓緩民間的不滿情緒。不過隨着民間保育的意識比以前強烈和深入，有很多市民要求不清拆，原址保留皇后碼頭。本土行動和一些市民再次打着反填海、保護集體回憶、保留地標、保衛歷史文化和保育等旗幟，爭取不告別皇后碼頭。

今次的抗爭行動手法比上一次的天星碼頭事件更多元化，更多色彩。除了演講、絕食、靜坐等原有的方式，今次更舉行大型音樂會、簽名行動和在碼頭舉辦圖片展覽等，軟

硬兼施。十多個民間團體，包括香港建築學會、長春社、香港專上學生聯盟等，提出原址保留方案，用探討城市規劃的手法，希望能取代政府的覓地重建方案。其後本土行動又提出進行承托工程來保留碼頭的方案，並以比政府的拆卸方案便宜數千萬的誘因來爭取市民支持。

同一時間，民間抗爭組織開始懂得在技術上、細節上、專業知識上和政府鬥智鬥力，一改以往只懂正面衝突的抗爭方法。例如在細節上，他們今次懂得和政府爭拗皇后碼頭應被介定為歷史建築物和法定古迹。因皇后碼頭如果被介定為法定古迹，政府是不可以把它拆掉的；但最終皇后碼頭也不能被介定為法定古迹。另外他們又懂得提出質疑，究竟古物諮詢委員會是決策者還是諮詢組織，如果是後者，便無權決定拆卸皇后碼頭，成功逼使政府再諮詢公眾；也有抗爭者懂得從司法方面鬥爭，何來和朱凱迪便申請司法覆核，轉移和增加鬥爭場合。

意義：這次的民間壓力，爭取手法懂得軟硬兼備，雖爭取原址保留的訴求最終也失敗了，原址保留方案被否決，但政府也被逼作出讓步，如重新諮詢公眾、以原址修復方案取代覓地重建方案及多次和民間團體進行談判。此外，是次行動大大加強了民間對保育的意識，對集體回憶、公共空間和城市規劃的重視。今次行動成功吸取了不同界別的人士支持，如文化界有多達400人聯署支持原址保留方案，文化人梁

文道、馬家輝、李歐梵、陳清橋等更身體力行。而「集體回憶」四個字從此在傳媒和民間被廣泛應用了。

利東街事件

位於灣仔的利東街又稱喜帖街，因這條街是著名的印刷品門市集中地，而印刷品中又以喜帖為主，是香港獨一無二的婚嫁印刷品集中地，其他印刷品也以喜慶色彩為主，包括利市封和揮春。

利東街的建築物以一群建於20世紀50、60年代的唐樓為主，但不算十分殘舊。其最大的特色是先有印刷，後有喜帖。靠着做印刷和做零售的街坊互相協助、互有默契、前鋪後廠的運作模式，令製造印刷品和喜帖的成本大大減低，使得喜帖等印刷品價廉物美。如果利東街只有喜帖的鋪，而沒有印刷的廠及沒有街坊間的守望相助，便發展不到這情況。

2004年，市區重建局把利東街及其周圍納入H15市區重建計劃，利東街將會被拆卸重建。一班利東街的街坊、一些保育人士和專業人士，包括城市規劃師杜立基在內，成立了H15關注組（H15是利東街重建項目的項目編號）。H15關注組提倡保育應是保存社區網絡，而非重新打造社區，因社區網絡是靠一個自然的生活環境慢慢形成，而非靠金錢去堆砌出來。H15關注組在同年，設計了一個利東街的市區重建方

案，名為「啞鈴方案」。可是，「啞鈴方案」被市建局以不夠專業為理由否決了。2006年，政府公佈了重建方案的發展藍圖，但政府的方案被外界批評為扭曲了利東街的原有特色，因此其後政府以新的「姻園方案」取代原有方案，算是街坊和保育人士的一次小勝利。

但這個「姻園方案」同樣招來批評。H15關注組批評「姻園方案」沒有居民參與的角色和空間，使居民的原有社區網絡無法在「姻園方案」中生存（這和「姻園方案」否決了街坊「樓換樓、鋪換鋪」的訴求有直接關係），也沒有保存原來的地區特色，只是一個以婚姻主題作包裝的商業方案。「姻園方案」最大的讓步是承諾不建屏風樓、不建巨型商場，只建一座四層高的商場和步行街，保留小區風貌，及為了保持地區含有婚嫁特色，會設立一個中西婚嫁傳統博物館。

「啞鈴方案」雖被否決，但其有着極大的象徵意義。那意義是開拓了居民自發參與自身居住地區重建規劃的先河，大大提高了公民意識。

2007年11月，H15關注組再草擬一份聲稱是糾正市建局現有方案的方案，但城規會將於2008年1月審議該方案前，市建局已為重建方案定案，即不會考慮H15關注組這個新方案。

2007年12月23日，政府開始清拆利東街，身兼H15關注組成員的街坊葉美容（May姐），以絕食方式，要求政府停止

清拆利東街及保留街中段的唐樓群，又要求政府下放權力，讓居民可以參與社區的發展和規劃。May姐還發表了絕食宣言，內容包括控訴政府多年來沒有認真對待街坊面對的困境和沒認真溝通、多次約見也沒有回覆；表達政府否決H15關注組提出的重建方案而感到憤怒，因那是一份令到想留和想走的街坊，甚至地產商都有得益的多贏方案，及重申街坊樓換樓、舖換舖的要求，只是想市建局尊重它成立的主要目標之一；又表達對政府假諮詢的憤慨，市建局就着利東街的規劃方案，在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196份申述中，有192份是反對市建局方案，但市建局還是一意孤行其方案。更甚者，全港僅得沙田和北角兩個地區可以索取諮詢文件，以及文件以英文為主，不諳英文的市民根本難以參與諮詢。

May姐的絕食得到保育人士，如麥家蕾、冼惠芳和本土行動成員，社會各界人士，如前立法會議員勞永樂、前區議員黃英琦、金佩瑋的聲援。雖終換來當時的市建局主席張震遠的探望，但利東街也難逃清拆的命運。

是次事件的意義除了開拓了居民自發參與自身居住地區重建規劃的先河之外，還促進了街坊、專業人士、保育份子齊齊合作，結合各界人士齊齊保育和各施長處。事件也反映了政府的所謂諮詢是假諮詢和現有制度的缺憾。難怪黃英琦表示事件反映了在不健全的民主制度下，居民、鋪戶無法過問對他們影響重大的市區重建計劃。

意義：事件另外一個插曲是，當政府進行清場時，警方以示威者曾和警員有肢體碰撞為由，拘捕15位示威者，及對其中4男3女示威者無故進行剝光豬搜身（且是在律師離開後才進行），被批評為鬼鬼祟祟外，有濫用職權、明欺壓示威者之嫌。事後外界批評警方此舉是製造白色恐怖。而這次事件，使保育人士和抗爭市民們，與警方生產了一道難以磨滅的裂痕。

公共空間事件

公共空間，英文叫public space，又別稱公共場所、公眾地方。例如屋苑範圍的公用空間、行人道、街道、公園和公共圖書館等。任何人，不論甚麼身份，都有權進入公共空間，及在內享有同等的自由與權利，可在當中不用花費的做任何合法活動。

2008年，位於銅鑼灣的時代廣場，其業主，即地產商九龍倉集團，被批評把時代廣場的公共休憩用地租給咖啡店星巴克近兩年，以及十多年來向在時代廣場的公共休憩用地舉辦展覽的機構收取費用和租金，最貴一次甚至單日收12萬之多。其後更遭踢爆，早在1995年，時代廣場業主以3,000多平方呎的用地還給市民作公共休憩用地，即公共空間，來換取超過16萬平方呎的額外樓面，而這超過16萬平方呎的額外樓面也為九龍倉帶來以億計的收益。因此，時代廣場業主收取

租金的行為是不當的，再者時代廣場的管理在這十多年來對市民於這個公共休憩用地的種種限制，也被批評為違反公共空間的原則。

那些限制包括業主限制了部份市民進出該公共休憩用地的權利、不容許市民帶任何飲品食品、限制市民某些合法性的活動、業主有權趕走不喜歡人士和不准市民在用地內坐臥等等。業主這些行為完全違反公共空間的定義。因此有關心公共空間使用的團體，如本土行動、好戲量、公民黨等，要求時代廣場的業主把多收的租金交回出來，以及把時代廣場公共休憩用地的使用方式改為和一般的行人專用區一樣，即所有的合法活動皆可在內進行。

那些團體和個人多次在時代廣場進行藝術表演和派發傳單，來宣示市民在公共空間的應有權利，和呼喚市民對公共空間權利的關注。活動包括公民黨在該公共休憩用地舉辦圖片展、表演團體舉辦跳繩表演、好戲量數次表演戲劇《凍結時代 • 廣場復活》、朱凱迪和數名保育人士穿上印有「此乃公共空間」字樣的衣服在內表演、MC仁表演塗鴉等等。

那些個人和團體一次又一次的活動，成功引起市民對公共空間的關注，及發現原來很多屋苑樓宇由發展商提供的公共空間，因設計或管理的原因，根本不能為公眾所使用。某些屋苑的發展商更把公共空間的花園建在樓層上的平臺，而非地面，故意阻礙公眾使用的機會，把公共空間變相私有

化，如大角嘴的港灣豪庭便是一例。

由於公眾對公共空間前所未有的關注，發展局決定採取陽光政策，分批公佈全部公共空間的情況，實行官民兵分兩路的共同監察各公共空間，及要求沒有開放公共空間的屋苑將那些公共空間開放給市民。

其後時代廣場改善其管理，以彈性手法，平衡不同市民使用該公共休憩用地的要求。而在官民監察下，發展商私有化公共空間的情況差不多已經消聲匿迹。

意義：爭取公共空間運動最大的意義是，原來毋須遊行、示威、絕食等，而改用創新的手法、藝術表演，也能帶來公眾關注、傳媒焦點及政府回應，證明多元化的爭取方法是有效且能為大眾所接受，直接鼓勵了日後的抗爭活動要多元化和創新。

爭取政府開放大氣電波及免費電視牌照

多年來廣管局所發放的大氣電波牌照，只得香港電臺、商業電臺及新城廣播電臺這三個電臺擁有；而公眾電視頻道／免費電視牌照，更只得無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和亞洲電視擁有，不論電臺或免費電視的數目也不如理想，民間便一直爭取政府開放更多大氣電波及免費電視牌照予民間。和其他發達地方相比，香港政府所發放的大氣電波及免費電視牌照的確比較少。英國在20世紀70年代封鎖海盜電臺事件後，已開

放回民間大氣電波權；美國、臺灣等地的大氣電波和免費電視台之數目更是多不勝數。

民間有自己的廣播渠道，最大好處是可作消息溝通之用及為不同人群提供發聲平臺，使外間、社會、政府更易聽到和正視不同人群的聲音。

民間爭取開放大氣電波的團體有兩大目標，一是開放大氣電波，還給市民可自行營辦電臺的權利，提供多元化廣播服務；二是開放更多電視的公眾免費頻道。

早在1984年，政府已發表過一份報告書，指香港在一些新市鎮如沙田和荃灣，可設立社區電臺。1996年，陳偉業提出公共廣播政策動議，立法會於那時便開始辯論公共廣播政策。但多年來的反覆討論，實況還是原地踏步，遂激起民間的爭取活動。於2005年，全球已有3,000多個民間電臺的時候，前立法會議員「阿牛」曾健成和楊匡等人，為非牟利形式運作的民間電臺進行試播，開創了香港首個民間電臺，以頻率FM102.8廣播，宗旨為「寧鳴死、不默生」，口號為「突破封鎖，主動出擊」。民間電臺希望節目能多元化，如評論、校園、動物、愛情、音樂、娛樂等等的節目皆包羅其中。其後一大班年輕人加入爭取開放大氣電波行列，民間電臺的主持們更是以年輕人為主，包括Angel、金鷹、張錦雄（Ken仔）、阿禮等人。

由於廣管局拒絕民間電臺的牌照申請，民間電台及其

寧鳴死
不默生
民間電台
CITIZENS' RADIO
Struggle fo edom of expressio
and righ dio broadcasting

成員是無牌管有及使用無線電發射器材，屬非法廣播和違反電訊條例。民間電臺多次被政府查封，主持和節目嘉賓更被警方拘捕。但本着公民抗命的宗旨，雖多次被查封和沒收器材，甚至一度停播三個月，民間電臺仍繼續廣播至今，繼續爭取政府開放大氣電波牌照。

2009年10月1日，一班年輕人，包括一些民間電臺的成員，另起一個民間的電臺FM101，成員包括阿禮、周諾恆、年華等人，令民間的電臺增添更多色彩。

在免費電視牌照方面，無線的獨大一向為人所詬病。這是由於廣管局的《電訊條例》和《廣播條例》中的公平競爭條例不足，廣管局沒有好好以反競爭條例阻止無線一臺獨大，令本港免費電視長期欠缺競爭的情況。不少市民對此已有長期不滿，而這不滿的情緒更於2009年廣管局的中期檢討公聽會中爆發了出來。在公聽會中，有很多年輕人和民間團體出席，包括蕭若元創辦的人網（My Radio）、何民傑創辦的107動力等。當時的亞視執行主席張永霖、廣管局主席何沛謙、無線電視總經理陳志雲三人更成為眾矢之的，尤以後者為甚。當中投訴包羅萬有，包括不滿無線獨大、無線限制歌手在別的電視臺出席亮相、電視節目質素下降或未如期望、無線電視新聞娛樂化及自我審查嚴重等等。而第二次在禮頓山的聽證會，陳志雲被外號老味男的觀眾當面指罵及蕭若元對無線強而有力的控訴，更成為一時熱話。

意義：自此之後，市民對免費電視市場缺乏競爭非常關心，政府也考慮開放更多免費電視牌照，有機構，譬如有線電視，更正式入紙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相信不久將來，免費電視市場將會出現另一番景象，而當天推動政府開放牌照的人和團體，是功不可沒的。

不滿傳媒歸邊，自組自己的傳媒

97回歸後，各大報章、雜誌、電臺、電視臺的新聞報導被評為不斷歸邊，自我審查日趨嚴重。亞視新聞被部份人批為「中央十臺」，無線新聞部自袁志偉上臺後，批判聲日大，而無線新聞在2009年多宗處理新聞的手法被人所嚴批，無線新聞自我審查的指責聲得到更大迴響，CCTVB之名無人不知。

例如無線新聞曾在傍晚新聞時段播放陳冠希淫照事件受害者之一鍾欣桐在TVB高層陳志雲的清談節目《志雲飯局》內的訪問，公器私用的行為不為人接受；另外，低調報導趙紫陽逝世新聞、成龍「中國電視機爆炸論」，以及在2009年6月4日的六點半新聞報導不將六四事件燭光晚會放在頭條等事件，皆引起公眾的不滿。

2009年，當無線新聞現場直播六四晚會的新聞期間，有男子在鏡頭前舉起「無線新聞，事事旦旦」的紙牌，殺了無線新聞一個措手不及。雖則無線在官方網站刪除批評無線新

聞標語的片段，但網民成功把片段上載到YouTube，使廣大網民得以分享和重溫該片段。當片段在網上熱播時，無線高層以侵犯版權為由，向包括YouTube在內的多個網站發出警告，禁播片段，此舉不單被批評是妨礙言論自由，更有違反《基本法》之嫌。從此，「無線新聞，事事旦旦」成為了示威遊行時，必不可少的口號。事件也反映了YouTube的強大威力。

面對主要傳媒在回歸後逐漸歸邊，年輕人只好以自己的方針，不受外界和權貴的壓力，自己報導新聞。民間電臺、FM101、由年輕人組成的網上電臺「青臺」、蕭若元的MyRadio、由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等人創辦的獨立媒體in-media（一個時事評論及社會運動組織的網站）等等皆有自己報導新聞，令報導新聞的渠道百花齊放、千花競艷。

意義：最大的意義是市民、年輕人、網民可以不需靠傳統的傳媒及新聞傳播渠道，已可得到他們想知的新聞和資訊，開啟了一個資訊傳播、新聞報導的新世代。他們開始在自己的博客、網頁、Facebook、獨立媒體等，報導自己的所見所聞、報導自己的新聞、寫出自己的意見和親身經歷，不想事實被已歸邊的傳媒所扭曲。

陳巧文的出現

一個平平無奇、名不見經傳的女子，在北京奧運香港區聖火傳遞期間展示藏民的「雪山獅子旗」，被部份傳媒和網民批評她支持西藏獨立，因此一舉成名，她就是港大碩士生陳巧文。事後陳巧文解釋，她根本不是支持西藏獨立，而是支持西藏人民的人權自由，支持西藏前途由西藏人民自決。事件發生後，她除了被部份市民批評為賣國外，其Facebook戶口更因此受到轟炸，她的私生活狀況、私人照片、三圍數字等資料更被起底。同樣地，也有人為她的勇敢表現和獨立思維而讚賞。小插曲是，陳巧文示威及受傳媒採訪時，多以bra top熱褲示人，有人批評她過於性感，應穿多件衣服才示威，但也有人讚她夠真我個性，也不失為一垂柳翩翩、梨雲冉冉的英雌少女。

2008年香港舉辦奧運馬術比賽期間，陳巧文再次展示「雪山獅子旗」，沒有因受打壓而對自己所信的動搖，亦沒有因受攻擊和起底而退縮。當然，她此舉再次引來別人批評她不愛國，但從此以後，陳巧文已成為了一個幾乎無人不識的社運女子。同年，她發起簽名運動，要求罷免為中共於六四血腥鎮壓事件辯護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並獲得足夠簽名啟動罷免程序，陳一諤最終被罷免。她又為歌曲《聲援曾蔭權》填詞，以另類手法諷刺特區政府施政。之後的七一遊行後留守政府總部門外、國慶遊行和警員衝突、元旦遊行衝

擊中聯辦、2010年1月15日晚包圍禮賓府等事件，陳巧文皆為當中的活躍份子。可能由於每次警員清場時，她皆需被抬走，以及她多次投訴遭警員暴力對待，故此她成為了警方的眼中釘。

2010年1月7日晚，反高鐵包圍立法會集會前夕，有4名重案組探員到陳巧文家中問話。1月9日早上，陳巧文在九龍塘廣播道港臺門外，被警方拘捕，指她涉及元旦遊行襲警案。同日下午，她獲准以500元保釋。其後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她表示不會被警方的行為嚇倒，更聲明：「即使一個陳巧文坐監，日後還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意義：不管大家喜不喜歡陳巧文，無可否認，她是目前新世代社運界中，一顆極受各界矚目的星星。不管大家對她的理念認同否，她那種不怕死、大無畏的精神，確實感染了不少後生男女參與社運的心，令到社運發展更蓬勃。

09六四20萬人集會

2009年六四前夕，曾蔭權發表無恥的「我代表港人」言論；陳一諤、呂智偉、詹培忠等人試圖以花言巧語為當年中共的「血腥鎮壓」合理化，妄想把歪理狡辯成真理，以「經濟理由」為當年中共的暴行塗脂抹粉、轉移視線，但對中共當年的血腥鎮壓和當局為何到現在也不追查六四死者的死因和數目，選擇性地不聞不問；工聯會議員潘佩璆說六四是小波

薪火相
六廿四

浪而已，現在還執着20年前發生的小波浪有甚麼意義。這些厚顏無恥的言論激發了20萬市民參與09年的六四燭光晚會。

意義：當中最具意義的是集會中多了一班為數很多很多，在89六四慘劇發生時，還是小孩、嬰兒、甚或未出世的年輕人。而「80後」一詞在當晚後，被傳媒廣泛應用，象徵了在1980年後出生的一代，熱衷於關心社會和當年89學運事件，為社運帶來了嶄新的一頁。八十後運動由當晚起，正正式式在社會大舞臺上演了。

09七一大遊行

近年的7月1日已經成為一個多彩繽紛的日子，早上有慶祝回歸的七一大巡遊，下午則有向政府表達訴求和不滿的七一大遊行。

2009年的七一大遊行，連雷曼苦主大遊行在內，有約10萬人參與，雖和03、04年相比，10萬人不算一個大數目，但09年的七一遊行卻比以往的遊行更具特色。因為09七一遊行的訴求是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不像以往要求政制改革、爭取雙普選的單一議題為主。09七一的主題是「施政失誤、貧富懸殊、還政於民、改善民生」，訴求有民生、有民主，各適其適。雷曼苦主要求政府和金管局搞好雷曼苦主的賠償、菜園村居民要求不遷不拆（當時菜園村的聲音還相當薄弱，並未

撐不畏強權 撐香港電台
還政於民
施政失誤
改善民生
貧富懸殊
71
大遊行
WALK

引起廣泛注意，但七一後，開始越來越多人關心菜園村的去向了），向遊行人士派發萬言書、關注人權團體要求釋放劉曉波、外傭團體要求外傭也納入最低工資保障之列、有市民要求撤銷強積金、年輕人不滿CCTVB、有市民要求撤回徵收膠袋稅政策、泛民政黨爭取2012雙普選、同性戀團體要求家暴條例得保障、有市民要求不要最低工資、工會要求保障工人權益（要求了那麼多年，權益還沒得到充份保障）、關注港臺前途、愛護動物人士要求不要濫殺貓狗、美孚居民要求不要起屏風樓、要求保留尖東巴士總站等等，全是09七一中，隨眼可見到的訴求，單是這裏寫出的已夠大家看得眼花繚亂！

從09七一可見，泛民政黨的影響力已今非昔比，很多人並非因泛民爭取普選的呼籲而出來，而是自覺民生問題叢生，自身利益受損，不滿政府施政才自發性行出來，所以訴求才如此多樣化。

另一個現象值得留意，就是和六四晚會一樣，多了很多年輕人遊行，多了一大批80後青年，而他們的口號和表達方式更非常創新，不像以往般老土。例如107動力的年輕人叫曾蔭權慳啲（意思應是叫政府不要胡亂揮霍）、年輕人在衣服或舉牌上寫上「勿當奴」的標語（意思應是呼籲人們不要像曾特首般不守信用和無恥）、年輕的高登網民組起反CCTVB群隊、由年輕人為主組成的投訴合唱團，以歌聲唱出對政府的不滿、貼海報，上印有曾蔭權的樣子，並寫上字句「我代表

你條毛」(諷刺曾特首的六四代表論)、通緝氣候逃犯曾蔭權的大型海報、青年人的絕食行動(改變了以往只是政黨代表絕食的專利),年輕人周諾恆和另外兩名網民繼在六四絕食64小時後,今次七一再絕食71小時。

意義:總之,焦點已由政黨、政客改到年輕人身上,今次七一證明青年人抬起頭了,他們將會擔任未來香港社運的主角。

夏韶聲事件

2009年9月26日,人稱香港搖滾之父的夏韶聲,出席由青年民建聯在文化中心外主辦的紅色搖滾音樂會,慶祝國慶60週年,以搖滾風格演繹紅色歌曲。大約晚上八時,夏韶聲和其樂隊上臺時,一班事先聲明不滿夏韶聲出席該活動的示威者,在臺下高呼「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等口號,有數名青年,包括民間電臺、同為地下樂隊主音的阿禮、黃衍仁等,衝上臺、奪麥克風高呼口號。事件擾攘了數分鐘始告平息。事後音樂會的策劃者、民建聯中央委員黎榮浩強烈譴責示威者不尊重大會和演出者,甚至連社民連主席、和夏韶聲份屬老友的黃毓民,也在其網上電臺MyRadio節目中,批評示威者的行為不適當和有欠成熟,要求他們反思,不要隨隨便便的去掃場。示威者中有幾名社民連成員,但他們是以獨立身份參與示威。

夏韶聲出席民建聯的活動，引起那麼大反應，是由於夏韶聲一向給人反對強權、具有正義感的形像。他為89民運寫了一首歌《媽媽我沒有過錯》，曾打動過無數的香港人，並激發了香港民眾對北京當局的強烈不滿。歌中唱道「人民狂怒的呼吸，埋葬鎮壓的聲音。媽媽我沒有過錯，一起繼續我與你不死的勇氣。」而他的歌曲《力量》，更成為社民連於08立法會選舉的主題曲。可能因此，被人感覺他轉變了立場，引起部份人不滿而去踩場。

事後夏韶聲對傳媒和於YouTube中解釋自己參與紅色搖滾音樂會的原因。他說過去的已經過去，中國已經改變，自己不是政治人物及很樂意參與這次音樂會。在夏韶聲的個人網站歌迷討論區，網民們對他的最新演出進行了激烈的爭辯。有批評人士說，搖滾精神是反抗極權，搖滾的音樂應是為弱勢吶喊，而不是當權者的工具；支持人士則說，夏韶聲是一個歌手，應該尊重他的選擇，而音樂亦不宜太政治化。

意義：不過事件最大的迴響是黃毓民對示威者的批評，挑起部份參與示威的人士、青年，甚至部份社民連支持者的不滿。此次事件後，黃毓民和部份社運的年輕常客出現了難以修補的裂痕，有人甚至因此退出社民連。經過此次後，可以肯定的是，日後社運最激或最前線的一批，肯定不再是社民連了（不少人一般的看法），而社民連也再難以領導和吸引這批社運份子。

保留尖碼巴士總站

政府計劃拆掉尖沙嘴天星碼頭和文化中心之間的巴士總站，改建海濱商場，引發市民誓要保留這個香港史上首個巴士總站。一班市民、網民、巴士迷、年輕人及保育人士，更組織起團體「尖碼之聲」，目的是要保護巴士站，和連帶附近的天星碼頭以至人文活動。「尖碼之聲」的成員包括保育人士何來、陳嘉朗、林鴻達、Jerry Yu、Pixy Yeung、Jacky Lim等。

「尖碼之聲」主席陳嘉朗表示，尖碼連帶的人文生活就是九龍區市民每天坐車到巴士站轉天星，放工坐天星再轉車回家，這就是他們的生活，以及外國遊客坐船再轉坐巴士遊歷，感受香港生活文化，這就是旅客想要的。

尖碼巴士總站本身還有其豐厚的歷史色彩，它見證了這80多年來，尖沙嘴火車站和天星碼頭的種種變遷。拆去尖碼巴士總站不但勢為廣東道、梳士巴利道一帶帶來交通擠塞，根據「尖碼之聲」所說，還會導致不少原本乘搭天星小輪過海的乘客因沒有了巴士總站而改搭港鐵和過海巴士，令原本已車水馬龍的紅隧帶來更沉重的負荷；而天星碼頭亦會因失去了這班乘客而功用大減，隨時在不久將來變成歷史遺物，重踏大角嘴碼頭、佐敦道碼頭和中環卜公碼頭的舊路。要求保留巴士總站的市民要的不是佈滿大型連鎖店的購物廣場，也不是重建古物後的新型珠玉樓閣，他們想要的只是古物、保育和集體回憶。

意義：「尖碼之聲」舉辦的活動，除了街頭論壇、收集簽名、開網站、在Facebook開群組呼籲市民支持外，還有不少創意性的活動，例如遊「巴士河」、舉辦攝影展等，集抗爭與娛樂於一身，不像以往的社運那麼死板，為多元化抗爭寫下新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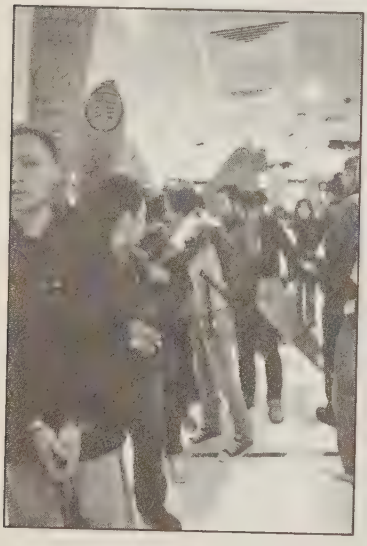
釋放劉曉波

《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在2009年12月25日，被中共政府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11年。事後基督徒兼法律學者、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解釋，因有外國領事聲援劉曉波，有可能引致當局加重對劉的刑罰。不知梁議員是試圖為中央政府辯護還是暗示國內的司法還不夠獨立，政治因素會影響到司法；但這說法和女性因穿得性感而招致色狼非禮一樣，有本末倒置的味道。梁美芬又以議會不適宜討論此問題為由，表明不投票，卻不去討論問題的核心和公義問題。立法會工程界議員何鐘泰指，有人把自己對劉曉波事件的觀點強加在別人身上，是霸權和獨裁之舉。他是否忘記誰是一言堂、政出一門、專權統治、打壓異見？他不罵霸權政府的惡行，反罵伸張正義、為不平發聲的人，對極權政府妖魔化敢言直諫之士無動於衷。他對中共把法治當作欺壓人民工具、運用權力去霸佔人民言論空間的行為選擇性視而不見。他們是否為了討好中共，不惜顛倒是非，出

賣良知，作出極其惡心的政治獻媚行為？他們的言論令人想起魯迅的一句名言：「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在此向以基督徒自稱的政客分享兩句《聖經》詩句：「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4：17)；「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6：8)。

劉曉波已不知是歷來第幾個被中共以言入罪的愛國直諫之士，12月25日原是普世歡騰的聖誕節，但有人因此把這天定為國難日，以表達對中共重判劉曉波和多年來箝制言論自由的不滿。

12月27日，21名有份聯署《零八憲章》的本港市民、網民和年輕人，如社運活躍份子金鷹、阿Wa、楊匡、阿禮、泰歷及16歲學生天佑等，因不滿異見人士劉曉波被以言入罪，



經羅湖邊境前往內地投案，他們背上皆掛有一塊仿製以前被判斬首罪犯需掛上的木牌的紙牌、又自綁雙手雙腳，以古代死囚造型投案。當他們行經羅湖橋（還未越過香港界線）時，內地執法人員突然衝至本港境內，撲向示威人士，強行扯爛示威者身上的示威紙牌，再帶走示威者，又一併帶

FREE LiuXiaobo
FREE LiuXiaobo
FREE LiuXiaobo
FREE LiuXiaobo
FREE LiuXiaobo

走兩名同行的《明報》記者。而站在一旁的本港警方，被批評為袖手旁觀，沒有負好保護香港市民人生安全的責任、沒阻止內地公安越境執法的行為。

意義：姑勿論你認同本港警方在這次事件的反應與否，此事已使部份社運人士和外界，對香港警察失去了信心，有人更狠批香港警方只懂「蝦」示威人士，但對着內地公安卻恍似害怕對方般溫馴。這可能會加重示威人士對警方的反感，令日後的示威活動中，如果警方對示威者採取強硬手段，會引起示威群眾的反彈。

2010元旦大遊行，衝擊中聯辦事件

2010年元旦，泛民發起「還我普選權」遊行，約一萬至三萬人由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遊行至西環中聯辦，大部份遊行完畢的人士在中聯辦後門對面馬路的欄杆上綁上黃絲帶後離開。其中一個引起遊行後段人士不滿的原因，是原先他們以為黃絲帶可掛在中聯辦大閘，但實情只能掛在中聯辦後門隔着六條行車線外的欄杆上、及在對面街的西區警署外遙遙示威，和原先願望不乎。

雖然遊行的主題是爭取普選，但元旦遊行秉承了七一遊行所開創的風氣，也是訴求多元化。當日清楚可見的訴求有抗議在地區興建骨灰龕、反對貧富懸殊、要求市建局改善城市規劃、反對高鐵撥款、要求釋放劉曉波、支持五區總辭等

等。而包括社民連隊伍和一班年輕人的遊行隊伍末段，則留守中聯辦後門出面，期間有示威者推撞鐵欄，及試圖衝破千名警員組成的警方防線，有推撞場面出現。約晚上七時多，末段的示威人士開始散去。

事後，民主黨和主辦單位等泛民團體跟末段的示威人士劃清界線，民主黨的張文光表示這已是遊行常態，市民會懂得分別兩者間的差別，較溫和的泛民支持者，相信不會被有關行為影響。而公民黨的余若薇指她雖不願意看到激進行為，但社會上不同人士都有不同做法，她相信今次遊行信息仍能清楚傳遞，遊行整體上亦是秩序良好。

1月6日，工聯會主席兼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在電臺節目公開表示，遊行末段發生的事令北京震驚；但他在不足6小時後否認曾發表「震驚論」，並澄清自己並沒有與中央官員討論此事，這個說法只是他個人評估；因而被外間批評他假傳聖旨、妄下判斷和缺乏公信力。

元旦遊行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當社民連主席黃毓民和警方商談遊行人士的安全時，發現陳巧文等人正衝過來，黃毓民呼籲不要搞事，長毛梁國雄亦曾阻止陳巧文衝向中聯辦門口，卻被陳巧文和約20位青年高呼「社民連抽水」，雙方因此曾發生對罵，幸沒演變成衝突。當然遠因是一些示威人士感覺到自發的遊行，有時被政黨騎劫，在不滿累積下，便發生是次事件（但我們要思考，政黨和社運是否有衝突？其

實，政黨和社運是兩樣不同的東西，不應混為一談）。事後長毛解釋是基於關懷陳巧文等人的人身安全才試圖阻止他們衝擊鐵馬和警方防線。

意義：元旦大遊行，最大的意義是以80年代出生為主的年輕人們，已變身為社運的中堅份子，按學者蔡子強所說，年輕一代已逐漸取代中產一族，成為推動民主、為低下階層發聲及表達訴求的接棒者，以及反映新一批的社運中堅份子已不再屬於泛民或社民連，他們已完完全全和大佬文化分裂，不再奉旨聽從任何泛民的領導人，而當日第一批推鐵馬的人群，正是那班不屬於任何政黨的年輕人們，當中有部份是FM101的。他們當中不少是2009年11月1日，遊行到禮賓府，要求曾蔭權下臺的數百名市民中的核心份子，那時他們已曾和警方發生衝突。元旦的衝突可謂11月1日的延續。

事件另一個訊息，是市民對特區政府已差不多徹底失望，不但認清政改話事權根本在中央，而普通民生訴求也改向中聯辦發表，而非政府總部。表示市民寧信中央，也不信唯唯諾諾的特區政府。

第四章・撐高鐵、反高鐵

高鐵事件是八十後運動的里程碑和目前最重要的一章。

高鐵事件概覽

2002年，特區政府為高鐵完成首階段規劃工作。

2008年4月，行政會議定出高鐵香港段，造價為395億。

2008年5月到11月，政府就高鐵香港段，向六個區議會及三個鄉議會進行諮詢。但由於上述議會的成員皆以親政府人士為主，又欠缺市民參與，令諮詢缺乏廣泛性。而政府提供的資料也嚴重不足夠，使諮詢出現莫大的缺憾性。所謂諮詢只是政府一貫的假諮詢手段，像當年廿三條諮詢、西九文化區的諮詢、利東街重建諮詢一樣，所謂的搜集民意，全是先召開甚麼委員會，召喚一班自己人給意見，草草地、低調地諮詢公眾一段短時間，把合聽的意見寫下，便說政府的政策得到大部份市民支持。這也說明為何政府公佈的民意和實際民意有那麼大的出入，西九、港深高鐵等全是好例子。政府假諮詢，然後裝出尊重民意的樣子，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是應該反對政府這種自欺欺人的行為。

2009年5月，政府指定在菜園村收地，菜園村將面對滅

村的局面，村民遂起來抗議。

2009年9月，傳媒報導高鐵工程造價，因建築材料價格漲昇，會由原本的395億飆昇至600億以上，但未被政府所證實。

2009年10月，有傳媒報導高鐵隧道將在大角嘴14棟樓宇底下20多米穿過，那些樓宇隨時因沉降危機而成為危樓，而這些樓宇全是無樁或短樁舊樓，令出現沉降危機大增。但之前政府和港鐵從無披露這些消息，有蓄意隱瞞之嫌，也令街坊因而錯過法例賦予的反對期。政府要強制收回地層，但不會主動作出賠償。報導又指，荃灣和葵涌也有多棟住宅受影響，包括象山村和華景山莊，而大部份人是未收過任何有關消息的。

2009年10月，由一班工程師、規劃師、建築師等專業人士組成的「公共專業聯盟」提出「錦上路方案」，聲稱造價為250億，及不用在菜園村收地，又可解決大角嘴地層問題。「公共專業聯盟」成員包括黎廣德、梁啟智、莫乃光等人。

2009年11月，政府否決「公共專業聯盟」的「錦上路方案」，又首次承認高鐵造價提昇到669億。

2009年11月29日，約3,000名市民在立法會外遮打道聚集，參加「反高鐵•停撥款」大遊行，要求立法會在表決全球最貴高鐵撥款前，「停一停，諗一諗」。

2009年12月18日，超過2,000名市民響應「反高鐵•停撥

款」大聯盟的呼籲，到立法會大樓外集會，加上泛民議員對政府高鐵方案提出多番質疑，以及多達7名功能組別議員陸續被揭發與高鐵撥款申請有利益瓜葛（其中4名議員，包括工程界的何鐘泰、地產界的石禮謙、商界的林健鋒和批發零售界的方剛更被揭發有直接的利益瓜葛，不應進行投票），議案被逼延期到2010年1月8日審議。

2010年1月5日，5位80後青年，包括學生一心、阿鳳、阿June、黃衍仁、梁穎禮在上水、大埔、元朗、觀塘、大角嘴發動五區苦行，模仿苦行僧不穿鞋的每行26步一停一跪，在地上撒下米粒，然後只用腰力，不用手支撐的站起來，呼籲港人，1月8日，站出來反對高鐵撥款申請。途中吸引了數十名市民和菜園村居民加入苦行行列，包括80多歲的婆婆。

嘉年華式大集會

2010年1月8日，數千名「反高鐵•停撥款」的市民在立法會外集會靜坐。這次集會透過Facebook召集，再在司令臺旁放三個電視螢幕，運用互聯網、Twitter現場直播立法會內的開會實況，以嘉年華形式集會，主旨是「快樂抗爭」，希望以歡愉、團結、心連心的感人場面靜坐，不像以往只得悲情和憤慨為主。是次是香港首個抗爭嘉年華，有樂隊表演、歌唱表演，及組成臨時市集，賣特色食品，真可謂前所未有的

歡愉快樂的社運模式。

在泛民議員拉布和對官員的支吾以對的答覆窮追猛打下，揭示了高鐵政府方案不少漏弊，成功阻延撥款通過。撥款決議要延遲到下一個星期。

斷食

2010年1月12日，6名青年，包括阿禮、阿June、阿鳳等，在立法會外，開始為時120小時的斷食，希望喚醒香港人關注高鐵事件及政府能撤回方案。120小時內只能喝清水，不得進食及飲用其他液體。

根據其中一名斷食者黃衍仁解釋，斷食和絕食雖同是停止進食一段時間，背後的意義卻大有不同。與絕食以悲情形式的不進食，傷害身體以引起別人關注不同，斷食背後有更深層的意義和思維。斷食指動物生病時，身體自動啟動機制，把欲望減到最低，讓身體回復原來的健康狀態，就正如香港隨着急速發展，已生病起來，人們欲望太多，以致大興土木興建一些人們未必需要的東西，原有的生活價值卻被默默破壞；希望香港也會進入斷食狀態，重新調校本身的欲望起來。

決戰前夕

2010年1月14日，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在立法會外辦三

天兩夜文化營，逾百人在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通宵紮營，白天暢遊天星皇后碼頭舊址、辦都市種植講座，晚上辦電影《三條窄路》觀賞會和說書時間。而另一批約百名以大專生為主組成的「大專苦行反高鐵」苦行隊伍，將苦行三天，希望政府能撤回方案。

2010年1月14日中午，自由黨在中環發起撐高鐵活動，有約百名青年參加，又收集市民簽名，支持政府的高鐵方案。而民建聯亦有辦類似活動。

3,000人包圍禮賓府

2010年1月15日，13,000人延續上星期的嘉年華式快樂抗爭，在立法會外集會靜坐，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107動力等團體更提供打氣吹氣棒和哨子（吹BB），置身現場仿似觀看大型球賽一樣。他們繼續透過電視螢幕和互聯網，觀看直播的立法會會議，繼續監察各議員和官員的表現。當泛民議員發問時，靜坐人士會報以呼聲支持，當官員們迴避問題或支吾以對時，會報以噓聲以示不滿。值得一提的是，當九龍西直選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發言時，包括大角嘴居民組成的關注組在內的靜坐人士，便大叫：「梁美芬出賣大角嘴！」、「梁美芬出賣九龍西！」等口號。而功能組別議員劉秀成和石禮謙，在財委會開會期間，應該身處立法會大樓內開會時，竟然被發現在文華東方酒店喝紅酒，難怪很多功能組別議員，

撤回7億高鐵

尤其是獨立和自動當選的，常被批評為不去開會和出席率奇低。集會期間曾發生一段小插曲，有數名撐高鐵市民與多名反高鐵市民對罵，需由警方勸止和請離場。而警方出動1,000人到場戒備。

同一時間，由旅遊界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主辦的旅遊界「不再沉默，齊撐高鐵」集會，在立法會旁的遮打花園舉行，有二、三百名市民和網民參與，包括名導演高志森，他更上臺說出對泛民拉布行為的不滿。撐高鐵這邊也是快樂發聲，有舞龍表演，又有性感女郎表演肚皮舞，更有6名人士剃頭髮，寓意泛民議員拉布的行為是無法（髮）無天，氣氛也歡愉熱烈。他們高呼「反對拉布、無法無天」、「青年日後靠高鐵，唔通第時去打劫」等口號。不過當中發生兩個小插曲。第一個是參與撐高鐵集會，62歲的葉女士向記者表示：「將來的高鐵走線將大有發展，當接上泛亞鐵路，可坐火車直達越南、新加坡等國家。」又批評反高鐵的80後青年是井底蛙：「係我仔女就兜巴摑醒佢。」第二個小插曲是下午三時半，苦行隊伍邊行邊跪經過遮打花園時，來到撐高鐵人士的大本營旁，3名貼上撐高鐵貼紙、約40多歲的婦女相當激動，坐在花槽邊，指罵這班青年人「對父母有冇咁孝順呀？」、「大好青年，點解有書唔讀呀？」、「你哋冇工返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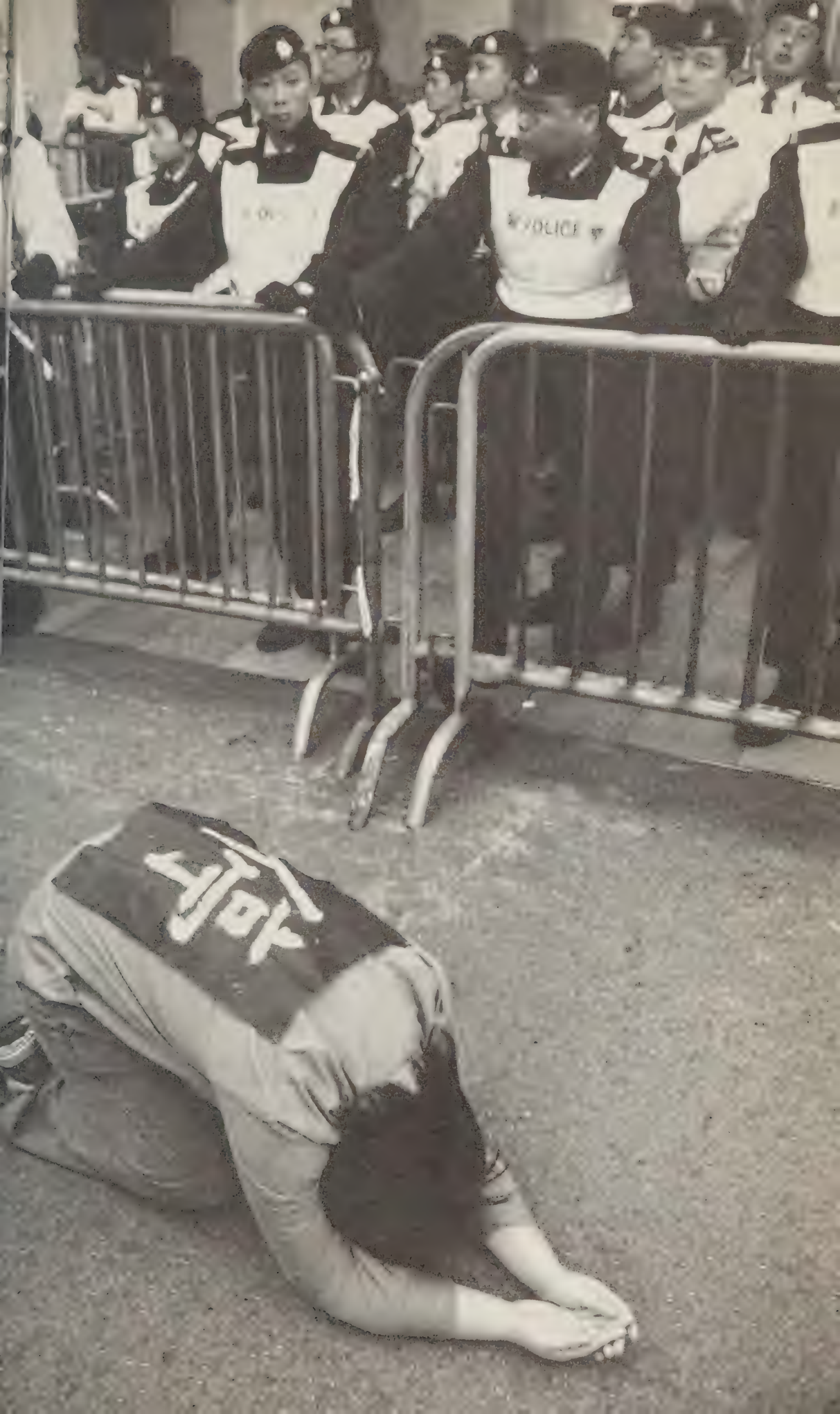
繼1月8日的6小時會議，1月15日的6小時會議也未能完成審議高鐵撥款的議案，要延至16日再開會議。當15日

的會議結束後不久，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突然呼籲集會人士遊行至禮賓府，期望能與特首曾蔭權對話，表達他們要求撤回方案的訴求。由於事出突然，警方事前沒準備大量人手在禮賓府戒備，只能在上亞厘畢道組成人鏈，企圖阻止第一批行上禮賓府的人群，但被陳巧文等示威人士成功衝破防線，走到禮賓府後門，席地而坐，和平地要求特首出來對話。最後多達3,000人在禮賓府外靜坐，人龍由禮賓府外一直坐滿至花園道的天橋頭段。期間靜坐人士除了高呼「反高鐵、停撥款」、「撤回方案」、「曾蔭權對話」等口號外，還齊齊合唱《國際歌》、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樂隊Beyond名曲《海闊天空》等。這次突襲禮賓府，有社運界人士形容是為社運史「創造傳奇一刻」。

大約凌晨十二時，於禮賓府外的靜坐人士開始和平地散去。這次3,000人包圍禮賓府，令人聯想起89年20,000人包圍港督府，聲援李卓人。

邊行邊跪邊哭的400人苦行隊伍

2010年1月16日，反高鐵停撥款大集會繼續進行，到立法會差不多表決議案時，有約萬名示威者靜坐。期間他們齊唱《國際歌》等歌曲，當唱到改編自《友誼之光》的《菜園之光》時，不少人更感動得熱淚盈眶、落下傷心淚。到了財委會會議後期，因在立法會內的泛民議員不夠問題繼續提問，


POLICE

使拉布策略快要完結，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在現場呼籲集會人士提供問題，再把問題收集，透過互聯網和SMS傳送給立法會內的泛民議員，憑着齊心和高科技裏應外合，創下這種合作模式的先河。而同日早上，數百名市民在立法會另一旁，參與工聯會和民建聯主辦的撐高鐵集會，各有各精彩，繼續發揮香港有多元意見的特色。約下午四時，撐高鐵集會那邊為免出現和反高鐵人士衝突的機會，宣佈散會。

《菜園之光》（調寄《友誼之光》）

人生於世上最緊要個家
一生種下人地情
早上落田用我雙手創豐收
晚來閒話句句温暖
＊　＊　＊
簡單的快樂
可否再續弦下半生
你的發財大路
可否不進入我家
＊　＊　＊
鄉土共發展
也可以共存
只需這路

不兜進我家

這營營樂土可不變

在中午期間，約400名反高鐵示威者，加入苦行隊伍，由立法會外苦行到禮賓府，希望特首曾蔭權能聽聽他們的訴求。由於人數眾多，連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為苦行者準備的稻米也不敷應用，苦行隊伍中有80多歲的婆婆、60多歲的長者，也有7歲及10歲的小妹妹、11歲的小孩，可謂老中青齊集。他們除了邊行邊跪的苦行外，不少人更哭了出來，邊苦行邊流淚，場面極為感人。

包圍立法會

下午五時多，在財委會表決議案前，就泛民多項動議進行表決時，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呼籲在場10,000多名人士加入苦行行列，實現「萬人宇宙大苦行」，圍繞立法會大樓慢行，象徵「一步一步、改變香港」。呼籲一呼百應，本來坐着觀看直播的人群，紛紛起來參與苦行。但同一時間，數名情緒激動的青年，試圖在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司令臺左方衝破鐵馬，欲衝入立法會大樓，但被警員成功阻止。而大會則呼籲苦行隊伍繼續向前行，不要加入衝擊行

為，而數名「四五行動」成員一度折返，欲聲援那數名青年。

數分鐘後，當苦行隊伍行至立法會正門外時，有數名十多歲的青年，包括兩名戴着「高登小丑」面具的青年衝擊及拉走鐵馬，引起「四五行動」成員及另外數名示威者加入，但同被警員成功阻止。

當苦行隊伍行至遮打道行人路，警方以安全理由，突然封鎖原本答應開放的遮打道到皇后像廣場路段，圍繞立法會和平苦行的計劃被逼打斷，引起部份在場人士不滿，約百多名示威者因此憤而拉走鐵馬，並衝出馬路，隨即與警方互拉鐵馬，並爆發衝突。其他示威人士則大叫「冷靜」及「警察冷靜」，希望雙方皆保持克制。及後有警員不下數次向示威者施放胡椒噴霧，導致多人不適，後方沒參與衝擊的示威人士即時遞上清水，讓被噴中胡椒噴霧的人清洗。也有示威人士向警員噴水還擊，一名示威者被警員按倒在地，抬離現場。衝突場面維持了十多分鐘，最後數百人於遮打道坐下示威，衝突才告一段落。而警方則退守遮打花園。香港會對出的一段昃臣道、德輔道中的電車路也擠滿過千名示威人士，加上立法會正門外有近百名示威者聚集、司令臺和皇后廣場也佈滿示威者，立法會大樓除了一部份遮打花園，差不多被示威人士重重包圍着。警方則把中環地鐵站各出口封鎖了。

傍晚約六時半，立法會財委會通過高鐵撥款，但值得一提的是，被視為建制派的九龍西議員梁美芬竟缺席投票，沒

盡一個議員應盡的責任；其實不論投支持或反對票，只要是有道理便應理直氣壯的投票，梁美芬這種騎牆的做法，選民是會看到的。之後，群眾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面對群眾，與他們直接對話。「鄭汝樺！對話！」、「功能組別可恥！」、「撤回方案」等口號的呼聲響震天。不過亦有少數示威人士叫「警察公安化」的口號，及指責警員，以示剛才有警員向示威者射胡椒噴霧。有不少示威者事後表示，警方在射胡椒噴霧前，是沒有作出過任何警告，但警方的發言人卻表示有事先警告。根據規定，警方在射胡椒噴霧前，必先作警告，警告無效才能使用。

鄭汝樺逃離立法會

立法會被示威者包圍後，鄭汝樺及多名建制派議員在晚上七時多，步上座駕準備離開，但因兩旁馬路皆被示威者們所佔領，鄭汝樺等人在座駕上等了兩小時也未能離去，只好步行返回立法會大樓內休息。在遮打道，數百名示威者手蹺着手，在馬路上坐着，高唱《團結歌》和《海闊天空》，他們都圍着保鮮紙保護眼鼻，以防警員再次施放胡椒噴霧。雖然如此，並非所有官員和建制派議員都不能離開立法會大樓，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在七時左右步行離開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葉劉淑儀、石禮謙離開時，也沒受到絲毫阻撓，只是堅決要坐車走的一群才走不了。霍震霆走出立法會

正門外停車場，沒被示威者喝倒彩，但當劉江華和詹培忠試圖離開立法會正門時，卻被示威者喝倒彩，可見示威者對建制派議員也「親疏有別」，並非一視同仁。

在鄭汝樺等人上了座駕初期，警方出動過百名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嘗試為鄭汝樺等人的車輛清場開路，把昃臣道的示威者逐一抬走，但最終也因示威者人數眾多，清場行動以失敗告終。警方出動到過百名防暴警察，直接激起部份示威者的不滿情緒，彷彿自己被當成不問因由而搞事的暴民看待。

過千名示威者在包圍立法會期間，除了手挽手的坐在地上，高呼「釋放鄭汝樺」、「鄭汝樺對話」、「曾蔭權下臺」等口號外，有部份示威者為了爭取前線警員支持和諒解，向他們釋出善意，如向警員唱《真的愛你》、《喜歡你》等歌曲，搞最靚仔警草選舉以抒緩緊張氣氛，有警員更被封上「翻版許志安」、「翻版黎明」等綽號，使之也情不自禁的偷笑起來。

通過撥款六個多小時後，在1月17日凌晨零時多，警方派出逾百名警員為鄭汝樺和留守立法會的建制派議員作出遮掩和護送開路，成功護送鄭汝樺等人從最近立法會大樓的港鐵中環站出口進入港鐵站，趕乘最後一班列車，再在金鐘站離開，轉乘私家車回家。在鄭汝樺等人進入港鐵站至前往中環站月台期間，警員一個接一個組成人牆開出通道，全程緊密護送官員及議員，警員甚至站在已落下鐵閘的港鐵站出口

通道，防止示威者攝錄官員離開過程。有市民拍到片段，當鄭汝樺等人上了港鐵列車車廂後，十多名警員打橫數列的排開，封鎖整個車卡的通道，為鄭汝樺等人騰出獨家車卡，有市民欲上前通往其他車卡，也被警員喝令折返。

在鄭汝樺等人步入港鐵車站期間，立法會議員黃宜弘被一隻尚餘少量清水的膠水樽擊中，幸而未有受傷（數日後，示威者之一，好戲量藝術總監楊秉基聲稱目睹掟膠水樽的人，懷疑該人是便衣警察，因該名人士在掟完膠水樽後，返回警員後面，在警員保護下，進入常人不可進入的立法會範圍。楊秉基又聲稱已拍下片段，並交與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相信事件會早日水落石出。聲明發出後當天，楊秉基位於旺角的好戲量辦公室被爆竊，價值4,000多元的相機並沒被偷去，但內裏的記憶卡卻不翼而飛，有白色恐怖之嫌）。在得悉鄭汝樺成功「逃離」立法會後，示威者在凌晨二時多散去。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表示，在未來仍會監察高鐵工程。

在鄭汝樺和一眾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被圍困於立法會大樓期間，有傳金融界議員詹培忠向警方現場指揮官施壓，稱已跟警務處處長鄧竟成聯絡，並說：「你15分鐘後搞唔掂（驅散示威者），你聽日聽執包袱啦！」翌日商臺節目《左右大局》表示，詹培忠被追問此事時，不承認也不否認，就如他曾表示過，泛民的「五區請辭」一旦成事，他也會辭去他的立法會議席，在港島區參與補選，和泛民鬥過，但現在他的說話不是

不了了之嗎？對於這次事件，評論員黎民觀1月22日在其《東方日報》專欄《笑罵由我》中，這樣評論：

「高鐵審議通過後，部份議員困在議事堂走不了，據說有議員『兇』警方負責人，說十五分鐘內不清場，聽日要執包袱走人。這位議員大爺不像在莊嚴的立法會內說這番話，倒像是在他大爺自己的公司裏說。

「外面警察與群眾衝突，場面雖然不太嚇人，但你以為前線警察很享受？個個都要面臨受傷的危險，捱到半夜沒得休息，你大爺一句話叫人十五分鐘內讓你回家，叫他們如何清場？把衝鋒車開出來，像坦克一樣輾過去？

「社會發生了這麼大的事，外面還有多少人在捱夜？有為自己的政治理念在爭取的，也有為維持公共秩序在辛苦工作的，你安穩坐在立法會裏，等那幾個鐘頭都很委屈了？

「香港政府不長進，我看有部份議員也好不到哪裏去。在立法會用粗口對罵，轉個身出來道歉，已經夠難看了，如今還要說出這等沒大沒小的話，只暴露他那種妄自尊大的心態。如此的立法會議員，香港人把身家性命都交託在他們手上，豈不是危危乎？

「『八十後』要過問社會事務，不能只監察政府，還要監察一下這些議員。他們有民選的，有功能組別推舉出來的，有政府指定的。有的與政府勾搭，有的作其譁眾取寵之異行，有的挾民意而遂一黨之私，盡做一些有破壞無建設的事。

「政府不濟，如有好的立法會，那還罷了，連立法會都不濟，那香港就嗚呼哀哉了。」

高鐵事件，如果簡單的分，可分為三派，一是中立派或無意見派，對興建高鐵與否都沒有所謂，甚至不多理會事態進展。第二派是撐高鐵派，支持興建高鐵之餘，還支持政府的總站設於西九的方案。第三派是反高鐵派，而反高鐵派內又可以分成很多支派，因為反高鐵派蘊含的反對原因實在太多，在此先不詳述，待會才加以分析。

撐高鐵

撐高鐵的一方是比較清楚明確的和意見也比較統一性的(相對於反高鐵一群)。首先撐高鐵的人，是百分百支持起高鐵，而他們對政府提出的西九方案，都是支持的。儘管當中不少人也認同西九方案不是完美的，有很多漏洞出現，但基於深信起高鐵對香港的長遠經濟都有益處，都選擇先支持起高鐵，再慢慢填補和修繕西九方案中的漏洞和不足。相對於反高鐵一方，撐高鐵的一群對政府的信任度較高，故相信政府的西九方案整體來說是良好的。

撐高鐵的除了是撐政府或撐西九方案外，還撐一個願景，一個能於內地接軌，不被邊緣化的願景。當然，興建高鐵與否、高鐵總站不設在西九，香港就會被邊緣化？香港便會成為孤島？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但撐高鐵的一群多數

相信，如果不起高鐵，總站不設在市中心的西九，長遠來說，於基建、於高鐵連合，香港將會落後於內地有高鐵的地方。他們相信事實勝於雄辯，當他們的願景成真，高鐵在建好後，的確為香港帶來經濟上的利益，人們就會知道當初的反對是多麼愚蠢（但這假定了所有反高鐵的都是反對興建高鐵）。所以部份撐高鐵的人會認為，那班反高鐵人士是在搞破壞，是在破壞撐高鐵一群對香港未來的願景，是存心跟他們和香港的經濟發展作對，故此，縱使撐高鐵的一群很多都會承認政府的西九方案仍千瘡百孔、準備功夫和諮詢工作都做得不好，不認同政府的做法，但都會對反高鐵的一群感到反感。故部份撐高鐵的人當中，他們「反」反高鐵的心比撐西九方案的心強烈得多，其實，有此感覺的人有可能是被政府或部份政客誤導了，因反高鐵的一方，大部份都支持起高鐵，只是造價和選址等問題上有分歧；但也不能排除他們真是認為部份反高鐵的人是無理取鬧。所以我們會發現，出席撐高鐵活動和集會的人數遠比出席反高鐵停撥款的一方少，因為撐高鐵中，很多其實是「反」反高鐵，而非全心全意支持政府和西九方案。

當然有撐高鐵的人是明白反高鐵的一群當中有些不是反對起高鐵，而是支持以錦上路方案取替西九方案，但他們仍然覺得西九方案相比下，是勝過錦上路方案。

現列出一些撐高鐵人士撐高鐵方案通過的理由：

一、為了能盡早和內地的高鐵網絡接軌，實現6小時到達武漢、10小時到達北京、和廣東各地的一小時生活圈，興建高鐵已不能再拖，儘管反對撥款的聲音非完全沒有道理。

二、當年港英政府計劃興建地鐵、興建赤鱲角的新香港國際機場，設定玫瑰園方案時（當年港英政府表示建新機場會為香港描繪一個像玫瑰園般美好的前景，所以稱新機場方案為玫瑰園計劃），因要動用超過1,500億，是當時全球最貴的機場，也遇到很大的反對聲音，但現在事實不是證明了不論興建地鐵或是新機場，都對香港有莫大好處，當年的反對不是多餘嗎？同樣地，今天反高鐵的聲音也是多餘和短視的，因深信高鐵將來會為香港經濟帶來重大利益。

如果對當年還有記憶的人，相信不會忘記，當年反對興建地鐵和新機場的聲音皆來自親中人士，甚至是中共政府。當年反高鐵反得最大聲的，是曾是香港首任特首的熱門人選羅德丞；而反對建新機場的，民建聯、工聯會不少人當年也有份，有人甚至責罵李柱銘支持港英政府，是協助港英政府把香港的財政儲備洗清光，不留半點給將來的特區政府，是漢奸所為。但今天，當時有份反對起新機場的建制派成員，竟以新機場為例子叫人不要反對起高鐵，實在是很大諷刺，難道他們忘記了他們當年怎樣反對玫瑰園方案、怎樣支持中共政府所說，起新機場會為未來的特區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不是大罵港英政府建新機

場是「你簽帳，我付鈔」的行為嗎？事實證明，港英政府為特區政府留下了約3,000億的財政儲備，那些所謂港英政府是想「洗晒」香港儲備的罪名全不成立。

三、反高鐵其中一個狠批，是西九方案每建一公里的高鐵，便要花27億，造價太貴。但其實西港線造價平均每公里51億，相比下，西九方案不算太貴。香港高鐵為免重蹈台灣高鐵覆轍，由政府出資興建，堅持在市區的西九設總站，估計即使粵港經濟增長大幅放緩，使高鐵客量急跌30%，高鐵營運初期毛利率仍達6%，5年後增至39%，毋須納稅人年年補貼。

四、高鐵建在市中心是有必要的，否則意義大失，故總站設在西九是正當的。

五、政府估算高鐵通車初期每日使用人次9.9萬，遭到質疑。但香港過往的陸路跨境旅客每10年便增加1倍，從1988年每日9.5萬人次，增至1998年22.75萬人次，至2008年的45.8萬人次，當中60%、即每日27.5萬旅客經鐵路來港，即使未計算20%額外增長的旅客量，以及大陸居民來港手續越趨簡化帶動的客量，假設旅客量維持2008年的水平，9.9萬客量絕對是保守的估算。

六、總站設在西九，可同時帶旺西九文化區。專家估計，2016年高鐵旅客在港消費達30億元，2031年更達60億元(當然信不信由你)。

七、政府已明確保證高鐵票價的競爭力，收費會與其他跨境交通工具相若，以跨境直通火車及直通巴士現時的車資水準作參照，日後香港來往深圳的高鐵票價約為45至50元、至東莞約為131元、至廣州約為180元。香港往來廣東省以外的地區，港府與大陸達成初步共識，收費以每公里0.6元計算，以香港往來武漢為例，高鐵票價是航班票價的70%至80%，可吸引不少現有陸路及航空交通的乘客轉搭高鐵。(但起在錦上路，票價保證不會因此而取消)

八、政府評估50年營運期內的直接得益達870億。

九、反高鐵那方，指出廣州市政府選擇以遠離市中心的石壁設為高鐵總站，為甚麼香港不可以採用近郊的元朗錦上路作為高鐵總站？其實，石壁與錦上路不能相提並論。廣州市政府規劃石壁時，不着眼於現在的石壁，而是日後的石壁，石壁在當地政府未來規劃藍圖中，是重要的新綜合商業發展區。而錦上路方案欠競爭力。

十、把總站設在錦上路，可能會使錦上路一帶發展為新的市中心，對當地的鄉郊會帶來破壞。

反高鐵

反高鐵停撥款那一方相對下，成份複雜很多。指的不是人們複雜，而是反對聲音繁多，反對理由眾多，各人都可以不同的理由反對政府的高鐵方案或反對撥款那麼倉促就要通

過。但必需強調，反高鐵停撥款的人中，大部份也支持起高鐵，所以撐高鐵的，不應該「反」反高鐵，以為他們全心搞破壞。根據NOW新聞在1月15日的集會做的調查，參與反高鐵停撥款的人士，超過五成是支持興建高鐵、超過八成反對西九方案、約八成支持保留菜園村，所以大多數人是反對西九方案而已，非真是反興建高鐵。

有些是徹底地反對在香港興建高鐵、有的是支持建高鐵，但反對政府於西九設立總站、有的認同興建高鐵，但反對造價過高、有的反對政府的假諮詢及準備功夫馬虎、有的反對政府在很多問題，如一地兩檢未和中方討論過，大角嘴唐樓問題及廣東道交通問題等仍未解決下，就妄想要立法會批准政府動用669億那麼多、有些是反對政府為了撥款通過而不擇手段、有的反對政府在民意極大反彈下，還一意孤行……總之，反對理由眾多，不能一一盡錄，但簡言之，就是希望政府能暫停撥款，撤回方案。

不管持的是甚麼理由，他們背後都有很多數據、條文去反駁政府的西九方案和政府那麼急就要通過撥款，以及背後是有種反對政府和制度的不公義的信念，故反高鐵人士的決心較大，從出來的人數、肯犧牲的程度，如放棄工作去全心投入反高鐵行列，犧牲時間精神體力健康去斷食和苦行等可見一斑。值得一提，有些反高鐵的，縱使不認同西九方案，也未必認同錦上路方案，所以支持錦上路方案的聲音，是比

停撥款
反高鐵
停撥款

反西九方案的為小。由於反高鐵停撥款的一群所持的理由較多，故不難發現，他們列舉的理由較撐高鐵的多，因為他們相對下，意見較多向性。現列出一些反高鐵撥款人士反高鐵方案通過的理由：

一、所謂「成由節儉，敗由奢」，669億的造價根本是太貴太奢侈。即使堅持要建高鐵，何不選用造價只需250億的錦上路方案（但也有學者和政府官員指，公共專業聯盟評估錦上路方案造價只需250億是嚴重低估了造價，並指該方案最少超過300億。如果造價真的被低估了，錦上路方案的吸引力也會大為降低。可惜政府沒有和公共專業聯盟正面交鋒，給大家一個真相只會越辯越明的機會）？

二、政府所謂的諮詢是假諮詢，是圍威喂式的假諮詢，而669億是民膏脂髓，豈可求其諮詢，胡混過關？NOW新聞在1月15日的集會做的調查，超過九成參與人士認為政府諮詢不足。反高鐵其中一個口號就是「不要高鐵，更要諮詢」，就像音樂人黃貫中所說，不是反對起高鐵，而是要求事前的諮詢功夫要更足。

今次的高鐵諮詢，就像當年廿三條的諮詢、西九文化區的諮詢、重建利東街的諮詢一樣，所謂的搜集民意，全是假諮詢，把合聽的意見寫下，便說政府的政策得到大部份市民支持，與實情不同。諮詢時，政府拒絕披露很多技術細節，令民間和被諮詢的人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料去讓專業人士審

議。例如高鐵隧道要在大角嘴14棟樓宇底下20多米穿過，那些樓宇隨時因沉降危機而成為危樓，而這些樓宇全是無樁或短樁舊樓，出現沉降危機大增，但諮詢時從無披露這些消息；建高鐵帶來的交通評估報告在立法會財委會中途才拿出來，諮詢時根本沒拿出來，理由是指區議員不懂看，十分牽強荒誕。

三、高鐵能否達到高速的效果，一地兩檢成功與否直接影響結果。但現在一地兩檢還沒跟內地談過，答案欠奉，政府就這樣申請669億撥款，是荒天下之大謬。

四、政府常說要省錢，為了省9億而不斷殺校（不少80後、90後身受其害），而建高鐵卻要669億，又不願考慮250億的錦上路方案（當然大家可質疑該造價評估是否正確），是雙重標準。

五、西九方案造價那麼高，隨時成為大白象，嚴重的物非所值。就像機鐵大白象一樣：原來興建機鐵香港站時，建有一比現實月臺大數倍，達22萬呎的備用月臺，造成很大浪費。而西九方案的準備工夫那麼差，那麼快就通過，隨時重蹈覆轍。

六、由於西九方案的諮詢和準備都成話柄，不想重演迪士尼、機場快線、落馬州支線、領匯事件的慘劇，希望政府把諮詢和準備工夫做好才申請撥款。當年政府也為迪士尼、機場快線、落馬州支線、領匯說盡好話，原來是糖衣毒藥，

現在恨錯難返。

七、669億造價，加上每年營運費達13多億，還未計算折舊帶來的損失，將會加重納稅人的負擔，尤其是未來的主要納稅人——現在的年輕人，令他們百上加斤（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現在一個年輕人要供養2個老年人，但20至30年後，一個年輕人將要供養6個老年人）。再者，高鐵方案成效成疑，故引起很多年輕人和80後、90後的反對。

八、高鐵西九方案其中一個主要賣點是打造一小時生活圈，去廣州只需48分鐘。但廣州南站的石壁位處番禺郊區，搭完高鐵再入廣州天河要再轉乘18個地鐵站，大約需時一小時，從西九搭高鐵去廣州市中心，實情是超過100分鐘。

九、高鐵香港段是地底行車，而香港到福田只有30公里，加速不久後又需減速，因此香港段平均車速只有130公里，和內地的350公里相比，根本是「假高速」。

十、政府高估客運量早有先例，故將來每天99,000的答客量是被高估也不足為奇。政府當年評估機鐵2011年每天75,000乘客，但現在只有28,000人；評估深港西部通道2011年每天有46,000車次使用，但現在只有7,000車次。

十一、假如高鐵乘客的目的地是以廣州、深圳等鄰近地區為主，用669億來興建是物非所值。政府評估85%的高鐵客量都是以深圳及廣州為終點站。

十二、高鐵顯然不能成為飛機的代替品，難以吸引長途

客。在每日3班高鐵、30班飛機到上海的情形下，高鐵明顯不能取代飛機，再者以現時內地票價計，坐高鐵到北京也要1,200元一程，與平價機票相去不遠。

十三、政府評估50年營運期內的直接經濟得益達870億，但此數字可能是誇大。中大蘇偉文教授指高鐵票價每程要收1,800元才能回本，而現在只是賣180元，客量更極有可能偏低。何濼生教授指出政府出資600多億元，要計利息成本，光是利息一年已蝕逾24億元。

十四、總站設於西九龍，將會導致九龍區大塞車，尤以本已交通擠塞的廣東道和梳士巴利道為甚。

十五、政府近年瘋狂興建跨境基建，除了廣深港高鐵外，還有港珠澳大橋、蓮塘新口岸、深港西部快線等，使跨境基建供過於求，高鐵搭客量隨時被高估及淪為政治形像工程，浪費公帑。

十六、普羅大眾根本沒機會參與高鐵規劃，城市規劃制度欠缺市民參與成份，高鐵規劃也是。

十七、高鐵西九總站需動用西九文化區大量土地，限制了西九文化區的設施建設和興建進度。

十八、如若支持高鐵方案，就等於默許政府為求達到目的而去不擇手段，即使目的是一件好事。不可因認同目的，而對政府在過程中的不公義手段及卑鄙的假諮詢不聞不問。只要政府是用不公義、欺壓弱小的方法去做事，就應該

反對。因為做人除了講求社會利益，還要講求分清是非黑白和公義對錯，而政府今次既不擇手段，也剝削了一班弱小社群，如菜園村居民、象山村居民、大角嘴舊樓居民們的利益和權利。

十九、政府根本沒有給錦上路方案一個公平機會讓市民考慮，應再諮詢一次。

二十、在社會意見那麼分歧、兩極化、對立化的氣氛下用「大石砸死蟹」的方式通過撥款（多數直選議員反對撥款，但因絕大部份功能組別的議員支持，使撥款能通過），只會破壞社會的和諧穩定。

二十一、政府常說高鐵西九方案有共識，事實是根本社會還沒有共識哪個高鐵方案較好，沒有一個方案有超過五成民意的支持，有共識的只是要建高鐵，並非西九方案本身。由政府友好智經研究中心做的調查顯示，雖有超過七成人支持建高鐵，但支持西九方案的只有四成，支持錦上路方案的有三成半，其餘的則未有意見；在財委會表決前，港大做的民意調查顯示，支持撥款的有四成七，反對撥款的有四成五。社會根本未有共識。

二十二、政府堅持不撤回方案其中一個主因，是說社會有共識。但以前07、08雙普選、2012雙普選也有共識，超過六成人支持，但政府都故意拖延。今次在未有真正共識下反以有共識為藉口，很明顯是雙重標準。

二十三、是誰決定某些人(即使數量很大),在生活上、交通上的方便快捷,比菜園村居民的家園更重要?

二十四、反對公眾無法參與決策。

其他被否決的動議

今次除了高鐵撥款的議案需由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外,泛民議員在拉布期間,也提出了數十個有關動議,但因被民建聯為首的建制派和大部份親政府的功能組別議員投下反對票,使那些動議全被否決,當中不少是有益於市民的,被否決實在十分可惜,使人歎惜。

第一個動議就是新界西議員、社民連的陳偉業提出,興建高鐵時,要優先聘用本地工人,以促進本地工人就業。建制派那邊,強調為工人的工聯會竟然投下反對票,但那邊廂,卻以保護本地工人飯碗為由,支持高鐵,實在有點言行不一。

九龍西議員、民協的馮檢基動議,大角嘴那些唐樓,如真是因工程施展而出現地沉,影響居民的樓宇安全,政府應予賠償。可是,身為九龍西直選議員的梁美芬和李慧瓊竟然投下反對票,難怪她們被人批評是出賣大角嘴。

九龍西議員、社民連的黃毓民動議,向年輕人解釋高鐵的成本、效益,以減低年輕人對建高鐵的不滿,又被建制派那邊否決而導致動議流產。

最戲劇性的一幕，就是建制派、旅遊界議員謝偉俊也提出動議，要求政府在通過高鐵議案後，要有充份補救及改善措施，以顯示重視民意的決心。可是到投票時，他自己也否決自己的動議，究竟他是精神分裂？還是自己說甚麼，連自己也不相信？抑或是故意「玩嘢」？那就不得而知了。

還有不少值得討論和支持的動議，也統統被建制派那邊否決，如新界西議員、街工的梁耀忠動議興建高鐵時要聘用殘疾人士、高鐵落成後，政府需交代每年財務狀況、殘疾人士日後享有車票半價優惠等等全被否決。建制派中人，不少常責怪泛民議員是為反而反，但今次為反而反不正是建制派的議員嗎？這些有益於民、爭議性那麼低的動議，根本不用多花時間討論就能達到共識，何需否決呢？難道真的要像毛主席教誨那樣，「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當然，並非所有建制派的議員都不認同有些動議真是有益於民，如自由黨的劉健儀事後解釋，他們反對那些動議皆因是反對泛民議員在拉布，個人認為有關動議可交由立法會內的事務委員會跟進。不過，劉健儀的說話肯定代表不了建制派，但至少應代表了自由黨的立場，因為譚惠珠在1月23日的電臺節目中，公開否認自由黨屬建制派一員，因自由黨的田北俊曾在廿三條一事中，在七一大遊行後，轉為要求政府擱置廿三條立法，故不屬建制派一員（難道譚惠珠認為田大少順應民意的行為是出賣了政府？）。

花點時間通過那些造福人民的動議真的這麼難嗎？既然建制派的議員在1月8日的財委會中建議，可在1月15至17日三整天，24小時開會審議高鐵議案（以令泛民的拉布戰術失敗，因怎拉也拉不了那麼久，不用拖到下一個星期），為何不能多花些時間去商討和通過那些動議？究竟他們是用甚麼準則去衡量民生利益呢？以自己的時間？這些動議不值得那些議員花人生中短短數小時去審議嗎？

說開為反而反，其實對於泛民的這個指控是失實的，在此不得不提點題外話。近年來，政府的法案、修訂、財委會撥款申請，泛民議員投支持票的比例超過九成。其實所謂泛民和建制派，在民生議題上的取態很接近，沒多大分別，只是政治議題上的定位和政治理念的定向有不同，才造成餘下一成法案、修訂的投票取向的分別。泛民較像民建聯的「是其是、非其非」多於所謂「為反而反」。

為反而反固然不對，但事件令人反思，保皇派的為支持而支持，又是否正確呢？不理會諮詢之不足、準備之不足、提供資料之不足；很多問題如一地兩檢、大角嘴問題、象山村問題、廣東道交通問題、遇上地質問題不知怎解決等等問題未解決；沒給錦上路方案一個公平機會、效益評估之粗疏（除了每年13.3億的營運費，折舊費是多少也不知，因此是盈利是虧損也是未知之數），對於種種問題和不正確行為不加理會便支持撥款通過，又是否理性呢？是否有點意氣用事呢？

和平？衝突？？暴力？？？

主流傳媒對於1月16日的報導，焦點盡放在那十多分鐘警民衝突的鏡頭上，有點娛樂新聞式的報導手法，只是報導收視率高的、較易吸引觀眾的噱頭，而非把事實的全部完整的、不偏頗的報導出來。對400人大苦行，大部份的和平時間和除了那百多位有份衝擊的人之外的9,000多人，報導篇幅明顯有極大的距離。這引起當天有份參與集會的人不滿，因這會使不在現場的人產生出他們全都是不和平、整天也是不理性的錯覺。

究竟他們拉鐵馬、和警員有衝突的行為，是否達到暴力程度？不守秩序的程度能否接受？不守秩序是否等同暴力，相信各人的觀點也不同。但對於有份參與拉鐵馬和衝擊的人士，他們的看法怎樣？以下節錄了一些有份參與當日衝擊行為的人的文章和訪問，和一些現場目擊者的感受，希望對大家理解他們的行為和背後動機有點幫助吧！

陳巧文於1月25日的文章《我們沒有超出正當抗爭範圍》中的節錄：

近來突然多了很多人把年輕人上街喊口號的行為定為不和平，也有人覺得不傷害他人下攀過鐵馬已算暴力，亦會有人認為跟警察鬥力推鐵馬便構成了一種不和平。我們反高鐵期間的行動並沒超越以上的三種，而我個人認為，三種也是非暴力的行動。畢竟，我們（除擲水樽的疑似便衣外）也沒有

做出侵害他人身體的事。

相反，警察在我們從沒對其使用暴力，或甚至在未有作出任何衝擊行為前，已使出推、撞、籐、叉頸、揮警棍、噴胡椒噴霧、無封路紙下用鐵馬擋路等招數，企圖阻止我們行使和平表達意見的基本公民權利，就必定超出了公僕維持秩序、協助示威請願的職責範圍。

一名同伴說過：「與敵人和平談判的前提是對方不對你動武。」

當警方用極大武力阻止我們和平請願，我們最「激進」的行動也僅是嘗試跨過鐵馬，但曾蔭權、李少光竟可把我們描繪為不擇手段的暴力狂徒，的確令人不得不佩服！

杜振豪於1月26日的文章《起義太激？抗暴又如何？》中的節錄：

反高鐵運動的參與者圍堵立法會之後，坊間一些論者認為當晚事件超出和平抗爭，社會不應接受這種暴力行為。在這些說法中，「和平」與「暴力」彷彿可以用「破壞社會秩序」(特首語) 來輕易界定。

圍堵立法會之夜，面對不民主議會的決策，眼看菜園村村民勢將家園盡毀，示威者移開或闖過警方鐵馬，要求鄭汝樺與群眾對話。其間雖然出現肢體衝突，但絕大部份示威者都沒有意圖傷害任何人身體，連直接暴力都談不上。這種性質和程度的衝突，卻竟然被某些論者批評為不能接受的「暴

力」。荒謬之處，直如譴責被強姦的受害人太過暴力，因為在反抗時抓損了施暴者的皮膚。簡言之，就是不斷強調一些似是而非的直接暴力，以轉移大眾對結構暴力的關注。

羅健熙於1月27日的文章《「衝擊」背後》中的節錄：

到高鐵撥款通過，示威人士圍繞立法會苦行，但警方攔截封路，亦沒提供替代路徑；警方曾表示可開路讓示威者前進，示威者亦承諾行人路一開便會離開馬路，警方最後卻食言了。

從過去多次遊行經驗所知，當群眾只是「叫喊」要求警方開路而沒有人衝出原本安排的那條窄窄的行車線，警方真是「睇你都傻」。我敢說，「衝擊」的心態和行為，是沒誠意、沒誠信的警方多年來「養成」！這和政府處理市民聲音很相似，政府對市民訴求不聞不問，當市民覺得遊行、請願、簽名運動已全無作用，政府就這樣「養成」了會選擇衝擊的群眾。

我們有多「暴力」？一個個血肉之軀，沒有任何武器；面對着的卻是受過嚴格訓練、配備精良的機動部隊和防暴警察，還加上比人還高的盾牌和刺眼炙痛的胡椒噴霧！我們想把阻隔的鐵馬拿走，讓我們可以在合理的位置表達訴求，小心保護自己之餘，也絕不想警員受傷！這與政府和立法會保皇黨聯手強行通過撥款，警方以襲警罪拘捕被抬走的示威者，報刊以侵害社運人士私隱的做法相比，何者更暴力？

部份有份衝擊人士於1月24日，接受《明報》訪問的節

錄：

阿豪和靈詩說：「外界混淆了暴力和衝突，我們只是想維護向前行的權利。暴力是相對的，建制施予人民多少，我們就反彈多少。」他們解釋，他們的暴力和流血都是被動而非主動的。

Jaco說：「我們是有心理準備要流血，是被動的流血，意思是就算遇到血腥鎮壓，我們也不怕。」

香港人對韓農和社運的暴力是否有雙重標準？101新青年說：「這是預設的想像差異，市民看了電視，設想韓農應該很暴力，會掟汽油彈，但他們竟然只是這樣（搶盾牌、木棍打警察）。相反，香港人認為自己人應該很斯文，所以拉鐵馬也覺得很暴力。」

金鷹和Jaco說：「我們搶鐵馬後都是放在路邊，不是襲擊警察，不襲擊肉體。有沒有暴民是這麼乖的？搶了鐵馬後乖乖坐在馬路等被警察抬走？」

以下一些是新聞界工作者，在當天現場工作後，寫下的感想節錄：

《明報》記者Ho Shuet Ying在網上的文章《別以犬儒蓋過正義（任鬧任share請自便）》中的節錄：

也有人說認為有些示威者暴力，甚至用「今次真係見識到咩係暴民」來形容，並以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比喻之。不必認真地拋書包，搬出Reign of Terror和Robespierre來，只須簡單問

一句，當中沒有人以令對方受傷為目的，哪裏稱得上暴力？何以見得是暴民？在成千上萬人聚集的場面，我想只要有百分之一是以暴力為手段和目標的，結果一定不會是現在這樣，大家安安全全回家。

甚麼是秩序，從來不是中立或不證自明，而是一種權力關係，本身而是由主辦單位／政府訂立的。而且示威者只是搬鐵馬，沒有掟鐵馬，又何來暴力？我是似乎是過份擴大暴力的涵意，正如Alex而言，將不守秩序和暴力混淆了。

大家同意讓警察擁有武器，但普通人擁有槍械是違法，既然我們賦予了警察這麼重要的特權，更加應該加倍規管他們是在甚麼情況下使用胡椒噴霧、流彈等。

有線新聞主播黃凱欣於Facebook的一篇在高鐵事件後有感而發的文章中的節錄：

我明白有市民、走在前線的行家，對部份示威者的行動感到徹底失望，而事實上部份反對者的言行的確過火。但除了鎂光燈下的激進派（傳媒朋友應該深明，部份自我感覺良好的「悲劇英雄」也是在傳媒注視下而產生的），反高鐵撥款運動中，尚有爭取公義、反漠視民意、反諮詢粗疏、反含混其辭、反一意孤行、反霸道專制、反功能組別……等等等等的核心價值。在叫停撥款的抗爭中，基於扭曲的立法會選舉機制，反對人士一開始就注定必然失敗（雖然我仍深信我的雙腳有份剎停廿三條立法）。我們一貫可以做的，只是表達不

滿、上街示威、喊喊口號或靜坐集會。在是次抗議活動中，一班在寒冬跨區苦行的年輕人，令人無法不動容；落力「拉布」的泛民議員，也突顯了現行選舉制度的畸型與無力。我明白，有人不齒以上的舉措，但面對功能組別佔半的立法會制度，對撥款議案有保留的我們還可以做甚麼呢？

將所有反高鐵撥款的人、或所有「80後」標籤為「為反對而反對」、「刁民」、「憤青」、「阻住地球轉」，就正如認為生肖運程可以概括一群同年人士一生的命運一樣荒謬。世事簡單至「今晚食乜餸」都可以有千百種不同意見，重要的是記住在簡單的反對與支持之間，尚有很多不同的訴求，很多可能性，值得討論。當然我也不會將支持興建高鐵的大眾妖魔化為「支持獨裁統治」，但今次政府的處理手法明顯是拙劣之極。在如此強烈的意見分化局面下，是否可以暫緩撥款討論，向市民進一步解釋、討論，以理服眾？

如果「權威人士」習慣對你的訴求充耳不聞、對提問嗤之以鼻，敵視一切「非官方」意見，以大家長式身份不停重複表達「香港人的心願」；假若無權主動立法的「立法會」繼續被舉手機器壟斷，你也要做好當一個「稱職順民」的心理準備。

當一個地區首長明言「我嘅意見就係所有香港人嘅意見」，應該不難明白為何此城有很多所謂「幻想被迫害」的憤青。

當然並非所有現場工作者也體諒示威者的行為，有的也

對他們的行為反感，雖然這類文章，能找到的，相對下確實較少，但同樣具有參考性。

以下是一篇一名到場採訪的新城電臺女記者，事後以個人名義發表有感而發的文章《昨晚發生的事……(2010年1月15日，財會表決高鐵撥款前夕)》中的節錄：

昨晚九時半左右，在立法會門前看到的一幕，令我徹底地對部份「反高鐵人士」反感，再跟他們行上禮賓府集會，決定從此不會再尊重他們。

眼前站在示威區內的幾名青年，突然攀過一個個分隔不同示威者的鐵馬，後面的同行者，見有人成功，有樣學樣，跟着一起又攀又跳的，警方見狀，大為緊張，即時加派人手扶穩鐵馬，防止他們衝突警方防線。

先前已成功越過鐵馬的，不滿警方阻止他們跨過最後一道鐵馬，與警方激烈推撞起來，期間不時叫囂，情況相當混亂……

老實說，他們發癲，我沒有被嚇到，依然冷眼旁觀，因為早就在預算之內，只是知道自己需要去了解，他們因何要衝出來？所以我細心聆聽他們叫的口號、訴求，那我聽到的是甚麼？

「衝過去！」、「差佬死開」、「直接對話」、「民建聯最無恥」、「仆街」、「反高鐵」、「停撥款」、「撤回方案」……

沿途看到行上禮賓府的，不只80後，50後，60後，70

後，90後，甚至2000後都有，這刻，他們是平靜的，只是沿途高叫口聲……

邊和行家吹水，邊陪那班人發癲，其實已很討厭他們的行為及做法。

十二點到了，大會呼籲大家散去，明天再續。但陳巧文等人再拿起咪高呼，要通宵留守，歡迎大家加入……

OK，你有你繼續留守的權利，即使不太滿意收工時間一再押後，老細亦說不用和他們玩通宵，但我和同事還是陪這班人癲下去，繼續在現場吹吹風、吹吹水……

這班人，打起鼓、唱起歌、跳起舞來！好聽點可說他們像很歡樂的模樣，但更貼切的，應是形容他們索了K般忽咗！

突然間，有跳舞中的四眼妹妹轉身向着我們說：「記者，一齊跳丫！一齊跳！」

我真的有點傻了眼，原本對着他們已口黑面黑的我，唯有即時別過面來，否則我真會回應他們一句：「收皮啦，八婆！」

但原來更絕的是，同事說，他剛剛也被邀請一起跳舞，但對方說的是：「靚仔，一齊跳舞啦，嚟啦！」

??！?！?！

反感到極點的我，真的沒辦法再留守下去了，正盤算甚麼時候離開，看到陳小姐一眾人突然個個拿好背包、手袋，

咦？他們不是說要通宵守候曾蔭權嗎？難道是相約去洗手間？還是因為博上鏡不成而意興欄柵？

我支持興建高鐵，但從不反對他人反高鐵，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理應容下不同聲音。大家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方法亦可各適其適，因此就算立場不同，我還是讚賞以苦行方式請願的80後，就算有人認為要抗爭，就要用激烈的手法，才可達到效果，這點我也不反對。

但我反對、反感的，是那些根本不知為甚麼要衝就先衝的示威者；那些隨意就煽動他人情緒的領導者；那些借題發揮的抽水友；那些博出位博上鏡的低能哩；那些一見警察就覺得自己被迫害的精神病患者；那些自命公民抗命就罔顧一切的刁民；那些不分是非黑白就批評記者工作的市民……

昨晚，短短幾小時，看到的遇到的，主要就是這班人，這是香港的未來嗎？如果答案是「是」的話，我真的感到很可悲！

以下是一篇一位參加撐高鐵的80後青年的感想文章：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80後元朗市民，並一直支持興建高鐵連接大陸，原因早已在BLOG上說明，今日不欲多說。看到媒體經常將反高鐵青年稱為「80後代表」，覺得很不甘心「被代表」了（沒錯他們是80後，但是不應稱為「代表」），決定走出來「撐起高鐵，撐起香港」。

一入會場，看見不少熱心網民和活動籌委，正用心籌備

這一次請願。他們雖然物資有限，只有自製道具和手舉牌，但是看到他們確是很有心。集會開始後，支持的人越來越多，每當有人上台表達撐高鐵的聲音，台下的歡呼喝采聲此起彼落。當有「六壯士」剃髮以表達「支持興建高鐵，反對拉布策略」時，更掀起集會的高潮。在此我以您們為榮！您們的頭髮，絕對不會白剃的！

可惜，部份反高鐵人士，向我們惡言相向不在話下，小弟不會計較；但他們居然向我們投擲蕉皮，這種可恥而沒公德心的行為，理應予以譴責！更值得譴責的，就是當支持高鐵撥款的議員返回議會大樓時，部份反高鐵激進人士卻阻撓他們。他們都是一人一票直選出來的，是得到選民的授權進入議會，服務市民。這種行為不但擾亂秩序和交通，而且是阻撓議員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責，更是阻撓議員反映市民的訴求。

一個真真正正自由、民主的社會，既然有反對的聲音，為何不能容納支持的聲音呢？為何他們永遠要求他人求同存異，自己卻偏偏不能做得到？投擲蕉皮、圍堵議員的行為，根本不是言論自由的表現，而是以暴易暴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建制派，還是社民連，他們都有權利表達訴求，但是理應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最後，我要感謝活動一眾支持者，您們一直以理性務實的方式，來表達撐高鐵的聲音，在此我向您們致敬！

（由於文章草草完成，故內容略有沙石，還請見諒！）

看完不同的意見後，不管大家對反高鐵集會人士的行為，是存有好感或反感、或對這些有好感，對那些有反感，用時事評論員宋立功於1月18日的文章中的兩段作總結最為適當：

苦行感人，暴行嚇人。警方與年輕抗爭者皆能保持克制應對，值得一讚。

我們也不應有部份人激進而否定他們的理念，要對事而不是對人。

警民衝突的反思

無可否認，即使涉及人數不多，維時不久，警民衝突的場面確有發生。有示威者的確拉過鐵馬和向警員衝撞，及有極少數人罵過警員，而警方也的確使用過警棍和胡椒噴霧對待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及言而無信的封鎖原本答應開放的道路，令部份示威者情緒突然激動起來。兩者的行為皆令誤會加深，對日後會面時會帶來負面影響，在雙方敵視情緒加劇下，日後的衝突可能更大。

實在說，示威不必喝罵前線警員，不必挑釁前線警員。他們只是「打份工」，只是在履行職務，也不必因受到前線警員打壓而敵視他們，警員們只是聽從上頭指令，不是存心為難示威者，除了辭工不幹外，別無選擇。而這些行為是較難

令外界接受的，當然，敵視警員的只佔少數，不少示威者也對警員伸出友誼之手，如選警草、歡迎警員加入示威行列及呼籲其他示威人士和警員冷靜等。

警方也不必仇視前線示威者，以為他們是在針對你。他們只是想表達訴求，僅此而已，並非想與警方為敵。警方在使用胡椒噴霧前，必須充份考慮清楚是否難以控制場面及有否給予足夠警告，始終對方手無寸鐵，根本難以作出大威脅。

但為何有少數前線示威者會敵視警方？衝擊行為是否無故？

隨着近年警方和示威者多了肢體碰撞，警方的處理手法逐漸升級和越趨嚴厲，且還出現故意羞辱示威者的情況，如無故對示威者剝光豬搜身，這樣只會令到示威者仇恨警員，又不能對控制場面、阻嚇示威者作出半點成效，這些行為警方應停止及對被羞辱者作出道歉。加上每次的遊行示威，警方都故意報細數（當然也有一種意見是認為那些遊行集會的主辦單位常報大數，最明顯是04七一，主辦單位說有50萬人，警方指有10萬，而多個大學的調查是指約有20到30萬）、警方深夜到陳巧文家，勸籲陳巧文父母不要參加反高鐵集會、警方秋後算賬拘捕陳巧文，種種迹象顯示，警方已逐漸成為強權政府打壓異見者的工具，執法部隊逐漸淪為政治工具，皆使人感覺到香港警察有公安化的現象出現。

順理成章，這使到一些異見者和示威者對警方充滿不信任，故才有人作出些普遍人認為是不夠理性的衝擊警方行為。是政府，是當權者害苦了警隊，成為了他們的替死鬼，令部份不滿政府的情緒發泄在警員上。市民應認清源頭在哪，應對警員多作友善之舉。

一切源頭皆來自政府的千錯萬錯

一向以來，能引起社會出現重大爭議，多只是政治議題，即使是當年維港填海的爭議，其震撼性和參與性也不及今次高鐵事件的十分之一。建一條接駁內地的基建，應是有益經濟的事，是民生事務，又不是政制問題，為何會出現如此大的反彈？相信這結果，不論是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也始料不及的。興建一條原意是有益於民的鐵路，本應無甚爭議性，但特區政府竟可把這樣的民生政策辦得一塌糊塗、令民意出現滔天巨浪般大的反彈。曾蔭權政府辦事能力中央政府的「震驚」，相信遠比元旦大遊行衝擊中聯辦後門一事大千百倍。曾蔭權政府實在有很多需要檢討的地方。

政府預計一條高鐵，本應不會出現極大反對，故所謂的諮詢只是草草了事、胡混過關、「求其做個樣」便算了，很多評估文件在諮詢期間都沒有拿出來，選址細節等沒有詳細交代、又沒向公眾解釋工程利弊，馬虎了事。且高鐵造價只是395億，成本不算高，而西九選址又接近市中心，高鐵撥款方

案應無甚爭議、無聲無息的便通過了。可是當諮詢期已完了近一年之後，還有三個月議案便要審議的時候，突有消息傳出，高鐵造價會上昇至600多億，政府之前的造價評估是嚴重低估了。

消息傳出後，不但引起輿論嘩然，還使人對政府的辦事能力投下懷疑一票。除了造價上的低估外，政府的高鐵方案在其他方面有沒有低估實情所需呢？加上政府沒即時站出來澄清公眾疑慮、又拿不出實質證據去支持自己的辦事能力，沒有做止血工夫應對，結果，就闖下了彌天大禍！

造價上的嚴重低估，引起外間調查政府在處理高鐵事件上還有沒有其他錯失，結果是越揭越多，政府被發現的漏洞接踵而來。例如高鐵工程有可能使大角嘴十多棟樓宇因地沉而變成危樓被傳媒揭發，而政府之前從無發表過有關的任何報告，這直接影響到數千市民人生安全的錯失，與草菅人命有何分別？雖則港鐵的評估顯示，施工及營運不影響沿線樓宇結構安全，通車後也不會引起強烈震盪，不過，土木及結構工程師蘇耀坤指出，相關地層約處於泥層及石層之間，施工時有機會令泥土、地下水流失，令樓宇沉降，「這批舊樓多數沒打樁，用石屎蘑起，一旦沉降有機會變危樓，最嚴重會塌樓。」加上政府公告引用《鐵路條例》雖刊載多個將被收回的地層、土地資料，但全是圖則編號，沒明確地址，使居民難以知道實情。政府這樣隱瞞，外界不震驚才怪！之後，

又被民間組織揭發，高鐵工程施工期間和落成後營運時，所帶來的噪音影響，連象山村、擎天半島、港鐵南昌站周圍多間學校等地都受波及，而政府之前是從沒向這些地方的人提及過的，諮詢的粗疏實在令人憤慨！政府為了讓高鐵火速上馬，而犧牲大角嘴、象山村、擎天半島居民的知情權和質詢權，這樣只會使當地居民出現強烈不滿的情緒而決心反對政府的議案。

跟着的是，政府被踢爆只是選擇性地披露高鐵總站對附近交通的影響，又隱瞞了改善交通工程的成本，又沒有經過地區諮詢。政府被踢爆原來一直以來都隱瞞了很多對政府方案不利的資料，行為鬼祟，惹人生厭。政府自己為高鐵方案做出了一個印象，就是彷彿不靠隱瞞事實和不去諮詢，高鐵方案才能通過，乃一「行不正、企不正」和「見光死」的方案。這樣的方案，不引起外界反對才怪！如果政府肯認真處理準備工夫和諮詢工作，根本不會搞出今天的「大頭佛」。而政府工作的粗劣，給了泛民議員拉布的機會，因從他們的發問中，確實發現了政府在高鐵工作上極多不妥善的地方。拉布雖不是君子所為，但正如謝冠東所形容，拉布平衡了政府的倉促。

被揭發的錯失一次比一次大鑊。政府被踢爆原來從沒就一地兩檢和內地有關部門達成協議，不單如此，連就有關此問題的溝通也欠奉。而一地兩檢的問題，正正是決定這條鐵

路將會是「高鐵」還是「廢鐵」的關鍵。政府這等辦事態度、這等準備工夫，效率之差，可說是世間罕有。在那麼多問題未解決下，政府就去申請669億撥款興建一條全球最貴的高鐵，不是兒戲得過份麼？那叫人民怎去支持政府呢？平心而論，此等工作成績，又怎不會帶來重大反彈呢！原本一個可造福民生的議案，因政府辦事的草率和對實況的嚴重低估，變成了一個可能令民眾受難的議案，千錯萬錯，源頭皆來自政府。

在議案表決前三個月，政府才被踢爆嚴重低估造價，又不即時站出來，要在約兩個月後才出來證實高鐵造價突由395億狂升至669億，辯稱是原材料價格上昇所致。但當造價是669億時，事情就截然不同了。造價大幅上昇，導致成本亦大幅上昇，直接影響收益和效益的多少。成本大增，收益自然大減，且造價被嚴重低估，效益因而可能嚴重被高估。此消彼長下，政府的高鐵方案是否真的能為香港帶來經濟利益，能否造福人民，便成疑問了。當疑問不能被化解，民間自然出現巨大聲音去質疑政府和要求政府先解答疑問，再去申請撥款。可是，政府沒有去解決疑問，又不多去聽應運而生的質疑聲音，這就導致民間出現了大不滿，做成今次高鐵事件的發生。罪魁禍首，原來是政府！！！

民間的專業團體除了質疑政府的辦事能力外，還建設性的提出了一個新方案讓市民去參考和選擇，那便是錦上路

方案。錦上路方案雖不像西九方案那樣直達，要左轉車右轉車，但此方案最大的賣點是造價只需約250億，比政府的西九方案便宜得多，且雖然要左轉右轉，但到達市中心尖沙嘴所需的時間，和西九方案相差無幾，到達中環更比西九方案快一點。在到達市中心需時差不多，造價卻便宜得多下，錦上路方案帶來的效益從成本角度看遠比西九方案好。當然，有兩點還需考慮，一是錦上路方案的造價估計是否準確？第二是錦上路方案的吸引力能否如西九方案般高？因這直接影響效益的評估。不論如何，錦上路方案成功引來社會焦點，帶來公眾的研究和討論，不少人在有選擇的情況下，更轉去支持錦上路方案，包括才子陶傑也在電臺節目中，多次暗示或明示傾向錦上路方案。

在這個時候，社會對於選擇哪個方案，是較難有共識的。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因為社會出現了一個認真及被廣泛討論和認可的方案，而去重新作一次真正的諮詢，使社會達到共識，令議案在低爭議的情形下才申請撥款，這樣社會自然和諧。根據英國交通工程學會成員、交通工程師王鵬英的定義，一個真正的公眾諮詢，不是要告訴市民哪個方案最好，而是要讓市民可以在沒有專業知識的情況下，分析每個方案的好處及壞處，並能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去決定政府應該怎麼做。

偏偏政府沒有這樣做，反而在不和民間團體對話下，單

方面否決了錦上路方案，連正式的讓錦上路方案給人選擇和討論的機會也沒有。政府又沒有好好和提出錦上路方案的公共專業聯盟和方案支持者溝通，令雙方的鴻溝加深，且使對方對政府產生完全不信任和不理服的態度。

錦上路方案出現後，鄭汝樺從沒跟公共專業聯盟和本土行動等團體中人會面和討論不同高鐵方案。政府根本無心化解矛盾，從沒有和不同聲音對話之心，只會讓矛盾持續下去和激起更多矛盾。政府迴避異見，不和他們對話，只會加劇對方的反對和無奈，逼使對方把行動升級來使政府聆聽他們。

政府單方面否決錦上路方案和不去與提出者溝通的做法，不但不能使西九方案更具說服力，反之令到支持錦上路方案的市民認為政府不願去聆聽他們的意見和聲音，當他們不存在。結果，他們只好自己出來發聲，而政府不但低估了支持錦上路方案的人數，誤以為不讓錦上路方案正式讓人選擇便會很少人支持；也低估了支持錦上路方案的人因而對政府不滿而站出來的決心。政府可謂一錯再錯，令自己踏入了一條不歸路。

當政府發現自己低估了反對聲音的人數和決心，其實還是有補救機會的，就是真正去和對方溝通，聆聽他們的意見。可是，政府再一次捨易取難，其回應方法，竟是藉着抹黑和製造對反對聲音的不利消息，企圖用輿論去打壓他們。

但這只會適得其反。政府抹黑和製造對反對聲音的不利消息的手法就是，把反對政府西九方案的人稱作反高鐵的人，扭曲了他們的本意，意圖使社會的中立聲音對反對政府西九方案的人產生反感。政府這樣做，根本是以分裂民眾的手法去打壓被分裂的民眾，手法極為愚笨和卑鄙，因為這會為社會帶來不同群眾間的敵視，使社會長遠處於不和諧的氣氛和局面。

政府又指不建高鐵，香港會變成孤島和被邊緣化。首先，目前香港的鐵路已能和內地和歐亞接軌，不建高鐵，香港也不會成為孤島（反而政府的短視和多個政策上的不完善，會使香港成為孤島的機會高得多）。其次，那些反對聲音根本不是反對建高鐵，又何來會令香港變成孤島呢？只是政府故意把反西九方案和反建高鐵混淆，意圖抹黑異見，硬指他們不想為香港好、不想香港長遠得到經濟發展、是暴民所為等等。若不是政府的抹黑，「反」反高鐵的一群應不會出現和成為氣候。同樣地，政府這些做法也對撐高鐵的一群不公平，因政府的誤導做法，會使部份反高鐵人士誤解撐高鐵那邊的人是對不公義不出聲、政府說好便說好、缺乏思考、凡事只顧金錢利益、有奴才思維等等，而不知道原來撐高鐵的人也有他們的理據和想法，同樣是熱愛香港。而這種對立狀況，是政府的分化政策所造成，對任何一方也不公平。是政府帶頭破壞社會的和諧，製造矛盾和火頭。

政府的不擇手段，對待異見的手法卑鄙，引起一班早

對政府假諮詢、準備工夫馬虎、隱瞞很多資料之舉不滿的人民也站出來，聲援那班被抹黑的一群。這些站出來的也包括，認為政府在很多問題仍未解決便去申請669億撥款興建一條全球最貴的高鐵是過於兒戲的人群。他們當中有些甚至是支持政府西九方案的，只是看不過眼政府的不公義、不合理行為，才站出來，要求政府撤回方案，重新諮詢，把準備工夫做好、公平對待支持錦上路方案的意見，才好再次申請撥款。是政府的不合理手段，令到一些就算不支持錦上路方案、對兩個方案對沒多意見，但對政府的事前諮詢和準備工作做得其差而不滿的人，也站出來，與支持錦上路方案的人群連結在一起。政府故意對反對聲音抹黑，指他們吃飽飯沒事找事做，是受到煽動等，這不但激起被抹黑者的憤怒，也使到部份人對他們產生誤解，敵視他們起來，令到社會分裂和不安定。不少市民明白到，在如此極端的氣氛下通過撥款，對社會只會弊多於利，為了不想社會如此不和諧，他們也站出來要求政府撤回方案，而他們本身未必對高鐵有很大意見。而一些原本對興建高鐵有保留的人群，不管是甚麼方案，見反政府之聲壯大，也使他們決心出來表達自己的聲音。是政府的千錯萬錯，造成了不同的聲音結合在一起，出來要求政府撤回方案。

其實政府若最後肯撤回方案，是會贏回掌聲和民望的，可是政府沒有這樣做，真可謂由頭錯到尾。政府以經濟為由

（又是經濟）不肯撤回方案，因高鐵越遲上馬，經濟損失越大，但這起碼有數得計，損失是有限的。但不撤回方案，所損失的卻更大，就是失去了和民眾間的互信，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威信，失去了和諧，這些都是不能估計的，損失是無限大的。以有限的損失換來無限的損失，你說這個政府愚笨不愚笨？

對政府的寄語

最後，撥款還是通過了。建高鐵雖然拉近了中港兩地的距離，但卻拉遠了政府和民間的距離。在此，筆者引述毛主席幾段說話，希望政府看了自己的老祖宗的教誨後，會有所反省。

「要聯繫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願。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願望出發。有許多時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願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群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願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和自願，就會流於徒有形式而失敗。……這裏是兩條原則：一條是群眾的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裏頭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願，由

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1944年10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1010-1011頁)

「我們的代表大會應該號召全黨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群眾。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裏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群眾之上，而是深入於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鬥爭。」(《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1096頁)

「當着群眾還不覺悟的時候，我們要進攻，那是冒險主義。群眾不願幹的事，我們硬要領導他們去幹，其結果必然失敗。當着群眾要求前進的時候，我們不前進，那是右傾機會主義。」(《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1948年4月2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1319頁)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瞭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都瞭解了。群眾是否已經瞭解並且是否願意行動起來，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

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還不瞭解的東西，群眾也一概不瞭解。許多時候，廣大群眾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群眾的領導者，卻反映了一部份落後分子的意見，並且將這種落後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後分子的尾巴。」(《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1096-1097頁)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6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901頁)

「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群眾(宣傳)，並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936頁)

「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

撐反高鐵事件對年輕人的影響

不管支持還是反對通過高鐵撥款，現在撥款已通過，木已成舟，雙方應摒除成見，合力監察高鐵進展和妥善解決菜園村、大角嘴等受高鐵工程影響的居民所面對的問題，而非繼續爭拗。

今次事件開創了一個風氣，是前所未有的，那麼多人，尤其是青少年，對於社會政策、民生議題，那麼熱切的關注和深入的討論，彷彿向外宣佈着，青年人不再對時事冷感了。沒有任何方案是無可批摘、無懈可擊的，不管撐高鐵西九方案的，還是反對的，也搖舌鼓齒、費盡唇舌的去游說對方支持自己的見解，當然，大前提是必須包容不同意見和聲音，也不要先入為主，假設對方為無知或不理性，否則一切討論也沒有意義。而很多青年人更不怕表態，表達取向，從Facebook上各撐／反高鐵的群組可知，數量之多、人數之眾是史無前例的。現在列出一些撐／反高鐵的群組名稱和成員人數（截至2010年1月28日），大家自然明瞭，不用多解：

撐高鐵群組：反反高鐵小組（3179成員）、80後支持高鐵組（555成員）、集會支持西九起高鐵（2102成員）、撐起高

鐵 • 撐起香港（31225成員）、80後，撐高鐵，反拉布！（429成員）。

反高鐵群組：我唔係反高鐵，我反高鐵走線！！！（4571成員）、為菜園－為公帑－為弱勢－為公義。刻不容緩，請各位支持1月15日再聚立法會，對抗669億西九大石壓死蟹高鐵方案！（56418成員）、細個教我仁義禮智，大個要我埋沒良知（2269成員）、延續反高鐵活動，開展新民主運動群組－2762成員、口耳相傳，我在16/01/2010參與的反高鐵和平示威！（765成員）。

透過表態、討論和爭辯，市民對高鐵工程、對基建政策、城市規劃，甚至連菜園村也認識多了，對政府的運作、立法會的組成和構造、立法的程序和規條也多了深入了解。就如TVB新聞記者方東昇在2009年8月15日的新聞說了一句：「在起高鐵之前，好多人都唔知菜園村喺邊，到依家差唔多人人都識佢，但菜園村偏偏就已經喺地面消失（應是指就快於地面消失）。」

這次事件，的確為社運界帶來了很多新血，很多參與者，尤以年輕參與者為甚，是第一次參加社會運動。根據NOW新聞在1月15日於反高鐵停撥款集會做的調查，近四成出來的年輕人是首次參與社運；當中很多是中學生，而超過五成擁有學士學位，說明多了很多大中學生或剛畢業的青年參與社運，對社會來說絕對是一個好現象。

第五章・各界訪問

黃平欣（阿Wa）

生於90年代初，大專生，活躍於社運界。

活躍於社運的她，對於透過參與社運去表達意見和爭取自己的發聲渠道表示認同，認為是盡公民責任的一種表現。當制度或任何一方面出現問題，便應發聲。她認為現在參與社運的年輕人是因看到社會上充滿着不公義的地方而走出來，幫助弱勢和別人去爭取應有的權利。而她自己則看到現有的社會制度充滿不公平，很多價值，如民主自由皆缺少，所以本着要對得住良心的宗旨，站出來為社會爭取應該有但現在缺乏的價值和東西。譬如她不希望經濟指導一切，希望發展同時能保留人與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之間的感情。

在她眼中，現在社運的模式不再像以往遊行示威般，或等着政黨領導。現在的社運已不用再靠政黨領導，且方式千變萬化，例如配合行為藝術和音樂，這是以往難以看得到。現在的新模式社運最大影響是以往agenda setting只由政府或傳媒決定，但現在參與社運的人可主動讓社會去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事情，譬如苦行可讓市民關注高鐵及多了傳媒注意，讓

外界群眾多關注這個議題，還可令市民多一點反思。年輕人付出體力、精神參與社運，可能影響不到政府，但會刺激市民的反思。

筆：80後的行動算不算激進？能否接受？

黃：激進這字眼是相對的，若和六七暴動比較，當然不算；若和以往的遊行比較，或者算吧。但現在的社運用上了很多新的方式，是一種轉變，群眾未必一下子可接受到，他們往往只見行動本身而非其背後意義，那需要較長時間消化深層意義。例如苦行，人們只見到有一班人在苦行，未必領會到其背後意義是希望勾起人們關注人和地之情。但長遠的將來，社會應可接受。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持續下去？會的話，又會維持多久？

黃：社會運動一定會持續下去，現在的社運也只是以前的延續。當社會出現不公平壓迫，一定有人走出來，只是形式、手法、人數的不同。只要一天不公義、制度不公平仍出現，八十後運動仍會繼續。而有一天終會為社會所接受。

筆：80後的活躍份子有否博出位？是否為了利益？

黃：其實他們沒有實質上或金錢上的回報和得益。可能有些人較強硬，才給外界錯覺他們是在博出位。外界可能以為他們很無聊或只是發泄，有此誤會只因不明白他們背後的動機和理念。

筆：八十後運動有否破壞社會安定及和諧？

黃：不會。參與行動的人有共識不會傷害別人和威脅他人人身安全，不會去到暴力層面。行動只是想引起群眾去了解被忽視的議題，應不會引致騷亂。

筆：你如何看現在主流傳媒對80後和社運的報導？

黃：未必一定是完全報導真相，實際是為銷量，所以取材有選擇性。那些主流傳媒可能本身不了解示威者，只用自己的角度去報導他們，和年輕人本身有差別，使報導不中肯。

筆：你目前有甚麼主要訴求？

黃：釋放所有維權人士，釋放劉曉波。因自己簽過《零八憲章》及願意和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的聲明，所以感受特別深。鼓勵了自己去關注內地受打壓的人。內地互聯網上的以言入罪事情常發生、內地的言論自由缺乏，但內地的人不會因此而放棄爭取民主自由。自己在較開明的社會下，更應該站出來。

筆：社運人士有否組政黨的需要？

黃：無需要。因為政黨最大的目的是向選民負責，行動上太多制肘。為了選票，政黨可能要做很多違背理念或良心的事。政黨多只從自身利益出發，但80後不是。如有需要，最多只是組成壓力團體，如本土行動。

筆：你個人參與社運有甚麼得着和犧牲？

黃：得着是認識了很多同伴、志同道合的人，彼此扶

持、幫助，大家有共同目標。犧牲是家人的反對，因怕自己會遇上意外；以及一些親朋的閒言閒語。但改變不了自己的決心，盡量不影響身邊人，如為身邊人帶來危害。最緊要為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問心無愧。

筆：如何爭取社會其他人對你或你們的認同？

黃：不會刻意這樣做，覺得出發點本身正確已可，即使外間不認同也不會退縮，不會為迎合外界而去做自己不相信的事和原則。

筆：行動時有否領導人？有否分工？

黃：沒有特定領導人，整個社運界由很多圈子組成。在比較小型的行動，如二、三十人參與的，可能大家比較相熟，但沒有一個是領導人。例如劉曉波事件，意識到內地打壓言論太嚴重，自己朋友便會相約出來發聲，沒有人是指揮，也沒有特定分工，只根據自己的興趣而作。如喜歡拍照的，自然去拍照；音樂方面有專長的，便專注音樂的工作；大家有默契，不用問也知誰做甚麼東西。

筆：社會缺乏向上流的機會，高學歷、低收入是否八十後運動出現的成因？

黃：不喜歡呂大樂的第四代香港人或80後等統稱。雖然很多年輕人也面對困難，但每人面對的困難也有不同，也沒有一個方法可解決社會上所有問題。每人也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意識，只歸咎於面對經濟問題是不公，沒有嘗試了解年輕

人的想法便強加己意，是不負責任。困難人人都有，不只是年輕人，現在說到好像年輕人才面對問題是不對。而收入高低根本不是重點，社會把此看成重點，只是社會價值觀太注重金錢。其實每人對錢、對收入也有不同要求，知足程度也不一樣，只講收入高低是沒有意義，只是向錢看。以收入來介定問題是不公平。

筆：以前社民連好像能代表80後，現在是否仍是這樣？還是變了？

黃：社民連不代表出來抗爭的年輕人。社民連也脫不了政黨只為本身利益而出發，重點只是着重於選票和支持度，很多時候怕失去支持而改變應有的行動。例如舉辦遊行，有時只為得到焦點。所以有些年輕人不想入政黨，不想有包袱。喜歡自發行動，有較大自由度和較少顧忌，但可能因此被社會誤解為太激進。

社民連和所有政黨皆有大佬文化，此是大問題。社運是想激發群眾，希望更多人關注自己所關注的，但在大佬文化底下，只可以迎合大佬想法。很多時大佬文化只是想群眾去支持自己聲音，為自己做勢。有時大佬硬要把自己的思想塞入新參與年輕人的腦內，以為自己的想法一定對，以及對年輕人不大信任。當行動上出現分歧，大佬只希望年輕人跟隨他們的想法，而非鼓勵年輕人堅持自己想法。

筆：你對80後這個term有何看法？

黃：80後這個term對60後、70後等不公平，忽視了他們也有需求。不想用80後這個term來標籤自己、孤立自己和其他人，不想過於分化社會不同階層。一些年紀較大的人以為自己不是80年代的人，即使認同自己的觀點，也以為不是同一班人而不走在一起。但大家根本是同一班人，只是被標籤去分化了。

後記：黃平欣是一位很有見解和很有思維的年輕女子，相信大家看了她的對答後，會對社運年輕人有較多了解，甚至改觀，包括筆者自己在內。

陳士齊博士（齋sir）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同席還有社運界前輩西門金剛先生。

齋sir認為80後氣候出現的原因，是回歸以後，香港出現再殖民地化，只是宗主國由英國變成中共而已。由董治時代開始，社會已經出現矛盾，政府向大財團、向中共利益輸送，表面上經濟有改善，實質中小企和基層市民生活情況沒有改善。因政府向地產商利益輸送，以保租金高企來保障地產商收入，造成中小企經營成本高企；租金高就自然百物騰貴，小市民生活成本高，生活困難，即使表面經濟改善也對改善生活質素沒有幫助。

在06年開始，曾蔭權上臺後，那些社會矛盾更浮於面，

利益輸送的程度比以前還利害，例如冰鮮豬肉事件（幫着大型超市去搶街市檔小販生意）、電盈事件、梁展文事件、樓市回上軌道也繼續不興建居屋及夾屋等等，利益輸送事件一件接着一件。

而80後的源頭更早至03年，當時香港還在積極討論07、08雙普選及廿三條立法問題，這些事情使年輕人開始參與社運和積極討論時事，那時公民黨成立，便吸引了很多年輕人加入，而當時也出現了很多網絡評論人，如林忌和黃世澤。當曾蔭權上臺後，社會矛盾浮於面，八十後運動便開始成形，首先是天星和皇后碼頭事件，當時出來的年輕人如陳景會、朱凱迪已經對社會有深入了解和探討。雖然當時只是小貓三、四隻，到現在聲勢浩大，是一步一步走出來，一寸一寸爭回來。這些年輕人會反思中國自古以來，資源皆有權貴去分配，但這代表對嗎？這代表以民為本嗎？他們發現香港政府只為大財團服務而非為人民服務，即使新加坡政府那麼專制，但也是為人民服務；所以年輕人便想爭取民主，來減少政府和大財團打籠通的機會，從而減少利益輸送的平臺。

但八十後運動發展至今，他們已有策略，有路線。當媒體給了他們platform，便由年輕人的網絡世界走入大眾討論區。和上一代不同，他們較勇進，有不滿便出聲，要改變不公義的決心較上一代人強；這可能與他們成長背景較西化，社會的文化和言論比以前開放有關。他們以團隊來組成關

係，有別以前是先連絡關係，再組成團體。他們不太信任政黨，所以不多加入政黨，以及發覺主流政黨的作用也不大。

80後每人意見也不同，但不會因為意見不同便成為敵人，最重要是各人也有各人道理，和而不同，保持多元化意見的特色。

齋sir認為80後的行為不算過激，而西門金剛更嫌他們未夠激。社會覺得他們激，只是因在儒家思想、封建思想下，覺得反對權力是不應該、應盡量避免，及無實權便不應出聲(如認為要走入建制才有資格發聲)。但這種想法太落伍了。因此，現在的世界只講道理是不行的，還要有行動支持，當權者才會理睬;所以聲音要夠大，要夠團結。80後應做則做，否則將來會後悔。現在是香港年輕一代再出發的時候，再次勇於投入社會。

後記：在大部份的教會因要接受資助，而選擇被「河蟹」時，齋sir還保持一士之諤諤的風格，和強權及惡勢力抗爭，身體力行基督精神，秉持真理，批判強權，以正聖道，以抗暴虐，以救萬民，是難得的基督清流。而西門金剛先生則是一位可親的社會長者，關心社會，一生為使香港變得更美好出力。

Simon Lee (掟書男)

生於60年代，也是社運中頗為活躍的份子，因在09書展

時陳志雲講座中，向着陳志雲的檯掟書以表對TVB壟斷的不滿，而被封為掟書男，和老味男、事旦男齊名。

Simon認為八十後運動的出現是一件好事，因每一個年代都有關心社會的年輕人。而80後和60後、70後不同，沒經歷過六四，少了份六四情意結，少了一份對共產黨的憎恨，及生在一個相對富裕的社會。他們對政制缺乏真正民主和平等感到不滿，從很多事件如高鐵事件看到政制的不公對社會帶來很大的傷害性。他們又意識到政府的經濟政策有偏差，只懂關心股票金融。他們的核心價值是要判斷是非黑白，對錯誤的事不能妥協，凡事要以公義為限，即使被拘捕和打壓也在所不惜。加上年輕人面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付出的努力和對社會的貢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便把不滿化為行動。

他們屬於N（network）世代，在互聯網普及下，年輕人用網上平臺發表對社會和政治的關心。當對傳媒的報導有疑惑，便會主動在網上尋找答案和真相。而Facebook於2009年的大熱，令到年輕人容易集合一班人來搞社運，而互聯網不斷普及化，社運的規模將更大。而今天的社運中，年輕人參與所佔的比率是較以前高了。

可是政府只是一班40後、50後、60後的人，連網也少上，和現今一代脫節了。這批主政的人，根本沒從適當的渠道去了解現今一代，仍舊有着以為和政黨講數便可的思維，不明白80後根本不想入政黨。政府對社運是被動的，從沒

主動去了解。而警民衝突的出現正是這樣，因警方和政府不懂如何和社運份子溝通，以為靠嚇便可以，但這只會適得其反，激發示威者的憤怒。

筆：80後的行動算不算激進？能否接受？

Simon：要看年齡層次。如中年人士打上較不接受，因可能錯覺社運等於社會出現不安定，但應主動了解這批新一代。其實，也有不少中年人支持，如學識水平較高的，便較易接受。但大多數人是沒有意見，因要廣泛得到認同不易，除非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受損，很少人會主動了解社運背後的思想和宗旨。但當政府施政出現重大錯失，80後得到的認同會很大。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演變為暴動或流血事件？有沒有機會？

Simon：現在情況看來，機會不大。政府和警方也很克制，示威者也是，中間沒有爆發點，只有零星衝突，看（2010年）1月16日，最後示威人士是和平散去便知。80後雖有怨氣，且越滾越大，但只要政府懂得抒緩人們的怨氣，便不會出現暴動。政府也不會愚蠢到不去抒緩的。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持續下去？會的話，又會維持多久？

Simon：政府缺少了要主持公義、為社會帶來公平環境的思想，所以政策上有偏差、制度不公平也故意拖延不去改善。一日政府還是這思維，八十後運動一定持續。

筆：你自己為何參與社運？有哪些考慮原因？

Simon：覺得社會有問題，要身體力行表達不滿。自己不偉大，但覺得應為自己爭取一些應得但被剝削的權利。會盡所能和時間去參與社運。如能引起其他人的共鳴和關注；或令到更多原本想行出來但沒有的人，因自己行出來而加大決心，會很高興。就如長毛也是不斷努力，才得到認同。

筆：參與社運，你有何犧牲和得着？

Simon：沒有犧牲，只是犧牲了機會成本。自己不是為財、為權才做。而社運不會即時見效，自己自願付出時間和精力，希望社會有所改變。

得着是知道世界的更多，接觸了很多不同的人，認識不同的價值觀，更清楚政府和警方的運作。

筆：你自己的宗旨是甚麼？

Simon：活在世上，應為社會做一些事，不應白白地過一生。當回顧一生中，知道自己做過有意義的事，便心滿意足，即使沒有實質得益也沒所謂。

後記：在電視看到Simon掟書、在（2009年）10月1日爬上警車聲援陶君行，本以為他只是一個魯莽的中年人。但接觸了後，才發覺他不但有原則，且出奇地分析能力高和很有思維，絕對是一個冷靜的人，所做的事不會是亂衝亂撞，而是有道理的。背後信念很強，有種為了社會，不會計較個人得失的豪邁。

李梓敬

生於80年代，青年自由黨及自由黨成員。

李梓敬在2010年1月14日早上召集了一班年輕人，其中有自由黨中人，也有非自由黨中人，捧着香港應建高鐵和反對泛民拉布的宗旨，舉辦了一個撐高鐵的活動，也是社運和表達聲音的一種方法。突顯了80後對每件事都有不同想法的特點。

筆：你怎看80後這個現象？

李：80後不是指所有80年代出生的人，80後是一個現象，指年輕人於互聯網吸取事件，然後決定自己的行動。自己雖有黨派背景，但也屬於靠互聯網吸取知識的，有獨立分析。而自己理念和自由黨相近，不會因多了知識而改變立場。會根據政治理念，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筆：你怎去看不支持政府高鐵方案／反高鐵的一批年輕人？他們是否激進？

李：80後在不同事件，有不同意見和不同的訴求方式，可能有些較激進，有些不是。不應標籤他們，應以單一事件來判斷哪些人是激進，哪些不是。

筆：八十後運動對社會有何影響？

李：令到大家對年輕人改觀，不再認為年輕人是政治冷感。只要有適當議題，尋找到表達方式和媒體，就會表達自己意見。

筆：上一代的人能否接受80後呢？

李：上一代人看80後都是根據個別事件來看。80後和80前最大分別是前者主要從互聯網吸收資訊，後者從主流傳媒。

筆：80後有否破壞社會的穩定和諧？

李：社會上有不同聲音是健康的，可使人們對社會的不同議題更關心，應不會破壞社會的穩定和諧。而自己和自由黨是標榜理性的。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演變為暴動或流血事件？有沒有機會？

李：從元旦大遊行開始，示威人士和警察開始有身體碰撞。自己不想看到演變為暴動或流血事件。但不會因政見不同而不喜歡對方，因對方也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希望能在法律框架容許下進行。

筆：你認為80後有否聆聽其他人的聲音？

李：不能代表其他人作答。但自己和自由黨願意聆聽其他人聲音。會從互聯網上了解其他聲音的理據，得悉其他人的論點。

筆：80後有否政黨化的需要？

李：不是必要，但亦可這樣做。如果80後對事情的看法和政黨吻合，不妨加入政黨，因可獲更多資訊。

筆：你認為80後每次行動是自發還是有人指使的？

李：指使很難說有。參加的人都是志同道合才出來，當然有發起人，但不代表有政黨在背後。行動出現的主因是透過互聯網來集合人，未必有人指使。

後記：感覺得到李梓敬是位對政治很有熱誠，很有heart的年輕人。是自由黨年輕一代的新希望。現落力於社區工作，致力貢獻社區。

鄺惠芳

出生於80年代，為了替大角嘴街坊和居民爭取被奪去而應得的權利，不惜辭去現有的會計工作，全心全意、不收分毫、鞠躬盡瘁的為街坊貢獻。

訪問中，鄺惠芳娓娓道來自己為何突然從一位從不多關心時政、連立法會有多少位議員也不清楚的她，怎樣因高鐵大角嘴事件，而轉去關心時政、關心社會，全心為大角嘴街坊討公道。因公司不喜歡她常請假搞為居民爭取知情權的事，便索性辭職全心投入爭取行動。在辭職前，她問了自己兩個問題：自己荷包裏的錢是否比幫助弱勢、幫助街坊重要？自己的錢是否比鄰居的利益更緊要？在清楚有答案後，便決定辭職。

2009年10月28日，鄺惠芳閱讀《蘋果日報》才得知高鐵隧道將在大角嘴14棟樓宇底下20多米穿過，那些樓宇隨時因沉降危機而成為危樓，而這些樓宇全是無樁或短樁舊樓，出

現沉降危機大增。但之前政府和港鐵從無披露這些消息：政府甚至連樓宇安全、定量危險、地質報告也不公開。而同一日大同新村居民稱民建聯葉國謙議員及政府代表、港鐵代表與大同新村業主立案法團主席會面，要求贊成高鐵興建。事後政府對外宣稱諮詢了大同新村居民的意見。

從報紙得悉事件後，她認為政府在諮詢期間從沒提過關於大角嘴問題、而刊憲期又過了數個月，居民連提出反對也不能。她認為這是剝奪了街坊（約一半是老人家）的知情權，質疑政府是否認為長者好欺負，認為長者便不需諮詢。

10月29日，九龍西民主黨涂謹申議員及林浩揚區議員舉辦高鐵對大角嘴樓宇結構安全的影響座談。10月31日，九龍西梁美芬議員與黃頌先生舉辦關於高鐵地底隧道通過大角嘴多幢樓宇地層之居民權益知多啲座談。但在此之前，不論是涂謹申或梁美芬和當區區議員也沒提過關於穿地層的事，有失職之嫌。11月1日，大角嘴受影響之樓群成立「大角嘴高鐵關注大聯盟」。

11月20日左右，開始約會民建聯李慧瓊議員，終在12月11日成功邀得她和居民會面。居民要求李慧瓊不能縱容政府的假諮詢和隱瞞行為，請求她在撥款方案投下反對票，但她回答高鐵對經濟有幫助，要投贊成票。結果令居民感到李慧瓊漠視民意，投票要跟隨黨的投票意向，把黨放在街坊利益之上。想起當李慧瓊參選時，表明會重視民生議題，請求街

坊投她一票，但現在街坊請求她投下反對票，她卻拒絕。

12月1日早上，大角嘴居民聯同菜園村及華景山莊狙擊民主黨、工聯會及民建聯。民主黨答應投反對票；工聯會則沒有議員接信（但事前說有議員可出來接信），只派秘書長出來接信；在民建聯總部，民建聯的職員更報警，又cut了電話線，不讓居民們用總部的電話打給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使居民感到很失望。

12月15日，約了梁美芬議員會面，在前一天confirm時，梁美芬也表示會面沒問題。但15日早上十一時左右，梁美芬的助理說要取消會面，居民提出更改地點，梁美芬的助理又以會面地方突然有meeting，總之不能會面。最後在本土行動的馮炳德協助下，才能於下午三時半和梁美芬會面，但給人感覺是梁美芬得悉大角嘴街坊出席下午二時半立法會門外的「1218千人包圍立法會」記招，她為避免街坊在記者面前說她拒絕會面，才在街坊發言時急急通知答應會面，並安排於下午三時半。在和梁美芬會面後，感到所謂的獨立議員，很大程度也受無形壓力和政府給予的壓力所制肘。

最後撥款通過，街坊覺得很無助無奈，有被保皇政黨和議員出賣的感覺。認為政黨常搞街坊聯誼會，給予小恩小惠，但在大是大非問題卻出賣街坊。認為政黨應把民生和居民放在首位，而非立場。

最不滿是在高鐵事件後，政府不反省自己的過錯，只是

責罵示威人士。而傳媒故意無限放大衝突鏡頭，不理會其他和平鏡頭，是新聞娛樂化的行為，對事實有欠公允，因不是詳細和公平地描述當天發生過的事，失去新聞的意義。

後記：在鄺惠芳訴說很難約到梁美芬會面時，筆者也感同身受，因筆者曾嘗試約會梁美芬議員做訪問，但得不到回覆。而另一位受訪者老味男，他於網上電臺擔任主持，也說道一些議員，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的，對於你發出的邀請，連回覆交代能否會面也欠奉，無獨有偶，梁美芬又是其中一位。《聖經 • 路加福音》16章10節上有如此記載：「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連回覆、給邀請者一個答覆的小事也不願去做的議員，想要她為你伸張正義、在大是大非上站在公義那邊，不是痴心妄想嗎？

馬愉生

出生於80年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助理，社民連成員。

馬愉生認為，在社會上，一個階層的流動停了那麼久，怨氣積聚了那麼久，而那份怨氣是從回歸後已開始積壓，且從沒被當權者解決，結果在民生問題出現不公義時，那股怨氣便爆發，所以八十後運動便出現了。從50年代發展至今，香港的規模已十分發達，因此現今一代想還原基本步，多關

注心性、環保和文化等問題。像美國在70年代也經歷過這個時期。是一個時代循環的階段，不可避免。簡單地說，80後要求除了經濟發展，還有多元化發展，而兩者之間本身並無衝突。

筆：80後的行動是否激進？能否接受？

馬：不應說我們是否接受他們，而是我們有否去接觸他們。80後不算激進，只是以行動表達不滿。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持續下去？會的話，又會維持多久？

馬：由保育運動開始發展，現在的社運組成模式已和從前的不同。現在是透過議題，才把分散的力量集合，將來也會是這樣，所以只要有議題，八十後運動還會持續。

筆：80後的成員有否博出位？是否為反而反？

馬：社會需要這些聲音來警惕政府，他們不是為反而反。應關心他們背後的反對理念。而他們不用博出位，因他們的聲音，社會會聽到。他們只是想大眾去認同他們。而他們過激的印象，是傳媒選擇性報導做出來。

筆：你認為80後有否聆聽其他人的聲音？

馬：應問有否人願意和他們溝通，有否接納彼此意見、互相尊重。但政府沒有，從施政的得失可知。其實80後是先了解政府的政策和社會聲音，才決定行動。也因此才引起別人認同。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演變為暴動或流血事件？有沒有機

會？

馬：不排除這個可能性。但只要能抒解80後的怨氣，便不會。80後是被壓迫而團結的一群，但政府從沒好好和他們溝通。政府要下定決心，想辦法解決80後的怨氣，疏導他們。

筆：八十後運動有否破壞社會的穩定和諧？

馬：應追求社會公平，在不公平時便應有改變。制度應以公平來實行，不應以錢來衡量。權利要均衡，現在既得利益者死守自己利益，而去剝削別人的利益。我們應關懷社會上權利被剝削的一群。

筆：政黨在八十後運動擔當甚麼角色？

馬：八十後運動是最根本的群眾行動。80後不因利益關係走出來，而是因個別議題而結合，強調個人的參與性，和政黨性質不同。但兩者不會有對立面，即使有政黨身份，在80後眼中只是個人，不會特別看待。

筆：八十後運動自發性的還是有人指使？有否人煽動？

馬：當了解八十後運動的組成，便不會有此錯覺。而他們怨氣大，不用煽動，也煽動不了，因沒有利益着數得到，財富不會因參加了社運而增加。80後出來只是想更多人關心社會。80後不會因遭遇不同，而理想有所改變。所以沒人能指使他們。

後記：馬愉生雖不是前線衝的一群，但多次行動也有參

與，每次參與都有新的體會，樂於見到不斷有新人加入，十分鼓舞。他認為太早把一個社會現象定性，會阻礙其發展，所以不應把80後標籤化，應以議題去評論他們每次的行動，而非用標籤來概論。

陳靜愉

出生於80年代，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幹事，修讀新聞傳播。

陳靜愉以個人身份參與社運，五一、六四、七一、元旦等大型活動皆有去。對社會人士的印象比一般組織和政黨好，因社運人士出發點較單純，為了爭取社會權益、為了弱勢爭取公平，有邏輯、有理據，真心為香港好，不像政黨常吹水。她認為八十後運動出現的原因，是不論內地或香港，社會只懂炒樓炒股，只發展GDP，漠視其他因素，形成真正的自我邊緣化。政府太刻意去殖民化，和群眾接觸少，在缺乏普選下，政府做的事和普羅大眾期望有距離，使香港成為一個被大商家壟斷、傳媒被和諧化的社會。應參考南韓的發展模式，發展高科技和多元化產業，不只是發展GDP，連人權自由、文化產業、民生保障也同時發展。

而現在社運形式、手法多元化，不只是喊口號，以快樂、開心為主。例如video、製作精美的海報、高登搞笑改圖、嘉年華、音樂等，非常具創意性。在多元化手法下，社

會較易接受。雖然爭取的東西不知何時才能爭取到，但爭取過程會令大家反思自己的生存環境、生存模式、社會的文明層次。社運不只關於爭取，還關於提高社會的文明、質素和層次。

她不喜歡80後這個標籤，因這分隔了社會其他階層和年齡層，變成只講第四代而忽略了其他階層。而年輕人爭取的，和其他階層爭取的，其實也一樣。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持續下去？會的話，又會維持多久？

陳：會。自己希望越來越多人參加，對社會的發展討論空間是好事。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演變為暴動或流血事件？有沒有機會？

陳：香港的示威和暴力根本拉不上關係。沒有人蓄意傷人，手無寸鐵，難以暴力。自己接受不了警方用剝光豬的手法去羞辱示威者和選擇性控告的行為，那是想威嚇示威者多於控制場面，是社會倒退的表現。而近年警方多了這樣做，相信與政府縱容和默許有關。

筆：你參加社運，犧牲了甚麼？

陳：很多想做的事，因要花時間和精神於社運上，便做不了。但香港的環境已很好，政府的針對不算很大，已很幸福；和內地相比，是微不足道。

筆：你認為80後有否聆聽其他人的聲音？

陳：自己有聆聽。有和不同意見的人討論，不會故意游說別人，也不會因意見不同而發火。因社運是講求民主、自由、包容，如連包容也做不到，沒資格說自己是在爭取民主自由。身邊的社運份子皆做到包容。最緊要是政府肯聽80後的聲音，不要得把口，不要為了大財團和中共去剝削大眾利益。因沒有公平機制，分餅仔也不能公平的分，有人努力工作，但連餅碎也分不到；但有人天生於特權階級，往往不用努力就能分到大大份的餅。

筆：你參與的天主教大專聯會有否定期開會討論社會問題？

陳：有定期開會，話題以時事為主，透過討論時事去了解社會，和探討弱勢面對的困難，了解社會不公義的地方。除了行動抗爭，也會有義工服務，幫助有需要的人。

筆：你參與社運有甚麼得着？

陳：對社會認知多了很多。自己以前很自閉，現在和別人溝通多了，因參與社運後，和不同人接觸、相處，令自己懂得和別人相處，也使自己變得溫和，懂得關懷別人。

筆：你有哪些關於社運的難忘經歷？

陳：六四晚會，自己有幫手叫人聯署平反六四，平時不多理會政治的人，那晚也有出來支持，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團結。而反高鐵事件，也使自己對香港的歸屬感高了。

筆：你怎看80後這個標籤？

陳：傳媒不斷用80後這個標籤，使社會忽視其他階層的需求，如中年人面對的困境。但年輕人出來，也是為了一班中年人，因是為社會整體利益出來，是為不公義出來，各階層都可受惠。

後記：陳靜愉信教和參與社運，是受到陳日君的事事關心、坦率的影響，啟發了自己去關懷社會，明白到有信仰外，也應關懷社會，為社會爭取公義，才是一個真正的教徒。最後她希望政府要明白社運的背後意義，多主動接觸，不要用高壓政策，否則會適得其反。

周澄

出生於80年代，中大文化研究系學生，入大學前已參加社運。

周澄關心經濟公義，及喜歡研究文化政治論述。欲拆解那些論述，再去重構社會應有的圖像。

大家由呂大樂的世代論開始討論80後，一個社會各界在爭奪解釋權的字眼。世代論應是指階級問題，可用政治經濟學解釋。例如為何年輕人上不到位？是因在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中變不出新的東西，舊有的勢力想維持壟斷狀況和利潤最大化，而政府沒有確立有競爭力的環境，跨代貧窮也是因此造成，有付出努力的未必得到應得回報。

香港最大的問題是過份依賴地產，而地產在香港代表了

一種暴利。邏輯是任何地方只要有發展潛力，就應用來建高樓大廈，而不是因應人的需求而去建樓。香港的地產政策是從炒樓角度去建樓，所以建來全是大同小異的豪宅和豪華商場，而不是適合普羅大眾居住的公屋，建樓只是為了迎合地產商牟取暴利的要求。香港的官僚只懂從芝加哥經濟學派去看經濟，忽略其他派別；芝加哥經濟學派和阿當史密斯的一套不一定是真理，但政府只懂從單一主義去策劃經濟，往往便出現很多經濟上的失誤和缺乏長遠視野，及與民眾疏遠起來。例如政府的保育，和大眾心目中的保育是完全兩回事；政府的發展，和大眾心目中的發展也是兩回事，而這些距離，是政府看不清實情和太短視所致。

在金融海嘯下，原本的歐美經濟體系已沒出路，資金轉而進軍亞洲新興經濟體系，包括香港；當下次經濟危機來臨，便會在這些新興市場爆發，但政府看不到，還在發國際金融中心的春秋大夢。

經濟缺乏視野便造成很多政策失誤，資源分配出現嚴重不公平，政府政策只重視有錢人，使民怨越來越深。例如金融海嘯，政府只是救市不救人、所謂的六大產業之一的醫療，只是建有錢人才能負擔的私立醫院，忽視普羅大眾能負擔的公立醫院，對公共醫療投入太少，無助改善普羅大眾現在面對的缺乏高質素的公共醫療問題、只懂從內地輸入一些只視香港為跳板，不會長期貢獻香港的專才，但不懂照顧和

分配合理的資源去培育新移民小孩成為香港未來的棟樑，因這些小孩是會紮根香港的，但政府反而不重視他們。政府缺乏視野，是造成民困和民怨的因素。所謂的世代論就是要去用理論反駁政府的錯誤。

其實政治和藝術是相通的，背後的精神是一樣的。藝術是挑戰理解生命方法的現有形式，是人對人生經歷的自我思考；政治也一樣，是從思考去改變一些事情，改變現有的生活。80後正是在思考香港應改變現有的落後生活，用長遠視野思索將來的生活應如何。

筆：你認為80後激進嗎？

周：70、80年代的學運也很激進，同一時間，和平理性的想像也出現。當硬碰硬的方法行不通時，妥協派才出現。現在的80後不激進，但政府卻用高壓政策對待，如拘捕陳巧文、威嚇陳巧文家人、以白色威嚇，一種無形暴力去對待示威者。真正的暴力是制度性和結構性的，很失望外界只懂批評示威者的激動，而不去批評制度的暴力。社運不是英雄主義，而是去對話，希望能啟發社會思考，帶動社會改變。真正激進行動只是一種模式，其背後的思想才應是被研究對象。就像馬克思沒有直接參與革命，但他提出的思想卻改變了很多人的思維，很多人因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去搞革命。所以思想的改進很重要，把焦點放在衝突場面是欠缺導向性。

筆：80後為何走出來參與社運？

周：看見社會的不公義，對此感到不滿，便出來。不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希望能給予政府壓力去改進，和使到更多人了解社會核心問題，從而激發更多人出來。

筆：你認為80後出來參與社運，是否被煽動？

周：不喜歡被煽動這說法。這說法是假定出來的那班人沒思考，很蠢。這些假定出於自己的過於自大，是很不尊重別人的行為。為何不多花時間去理解出來社運的人，便先假定了別人？是不關心別人的表現。

筆：怎去看政黨於現今社運的角色？

周：80後是自己代表自己，是自發的。但人需要彼此溝通合作，問題是怎去溝通合作，不可排除組織和政黨在這方面的幫助和角色。自己代表自己和組織不是對立的，因有時也需要政黨作政策分析，對議會進行游說，令政黨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

筆：對政府有甚麼建議？

周：政府要有民主普選，要有經濟制度的改革。宜先朝三大方向走，就是稅制改革、土地發展政策的改革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

筆：參與社運使你有甚麼犧牲和得着？

周：不敢說有犧牲，始終在香港參與社運的成本已比不少地方低。得着是學會謙卑。很多人初參與社運時，因一腔

熱血，初初會有英雄主義，但慢慢會學懂謙卑，從前人的經歷會看出自己的微小。

後記：在電視看過周澄不少的訪問片段，已感到她是一位論述力非常強，且很有理想的少女。見過面後，這感覺更強烈，不但學聯和大學界，香港也需要更多像周澄一樣的熱血論述型青年，使社運界的訊息更易帶給社會。

甄子南

一位15歲中四學生，由09年六四晚會開始參加社運，且非常頻密。包括七一、國慶遊行、11月29日保衛菜園村集會、由12月18日起的第一次反高鐵停撥款集會，到1月16日的也有參與。

甄子南說年輕人走出來，證明並非所有年輕人也是政治冷感，不只是識打機、識蒲，也會為社會時事表態，表達對社會及政府施政不滿。而他細說自己參與社運的理由，想證明給外界和保守派聽，年輕人出來是自發的，不是受人指使的、沒有受到煽動、也不是被人誤導的、更非對事件不理解。現在出來參與社運的年輕人繼承了89年民運學生們的精神，當政府倒行逆施時，便不會再沉默。

甄子南第一次自發參與是09年六四晚會，當年中共派軍隊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屠殺，但現在有些學生否認屠殺字眼（例如陳一諤），亦有學生說只有解放軍有人死，或當年

沒流過一滴血，此反映了有學生，尤其是內地學生被中共洗腦，盲目附從中共的一舉一動，不管對錯，即使有錯也是小罵大幫忙。對呂智偉歪曲事實的言論不滿，也使甄子南走出來，希望那些學生認清事實，主動了解事件的真相，了解即使有解放軍死傷，是出於學生主動還是自衛。

甄子南對政府很多施政不滿，如假自願，真強逼的校園驗毒計劃，一個不能真正打擊吸毒問題的計劃、政府施政偏袒大財團，包括紅灣半島事件，縱容地產商起屏風樓、對中央政府過於畏懼，沒有好好反映港人聲音，使雙普選一直被拖延、08年時，曾特首答應將於09年頭諮詢政改，但卻不守諾言、09年底財政預算，在退稅或其他方針，窮人也不能受惠，不是以人民利益為依歸、不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政府用人唯親，親疏有別、高鐵政府諮詢不足及霸王硬上弓。

高鐵事件，如果不是菜園村居民站出來，可能香港市民對高鐵事件還懵然不知，且政府對大角嘴居民的安危不屑一顧、對菜園村以務農渡日的意願漠視，是不合理的。但大部份功能組別議員和民建聯竟支持撥款，是政府的幫兇。現實的制度是少數人的暴政，現有的立法會結構，得到最多票數的民主派反

成為議會中的少數派，政府借不公平的立法會制度去打壓民意。

甄子南聽過別人這樣說：「在殖民時期，較少遊行示威，但現在卻諸多遊行集會，是對人不對事、是反中亂港、是針對特區政府。」但這是正常現象，因97前，港督雖由英國委任，但施政較能顧及市民需要，不會偏袒大財團，而在殖民後期，港英政府已不斷引入民主和取消委任制，但特區政府卻恢復委任制、回歸後的臨時立法會竟取消能保障工人權益的集體談判權和還原惡法，非常倒退，施政中又偏袒大財團，所以示威遊行自然多了。回歸後，廿三條、人大釋法、政府強姦民意、八萬五、不斷的假大空，人民不出來遊行示威才怪。

有些人認為市民應專心讀書或做工，但出來遊行示威和前兩者並無衝突。政府批評示威者手法過激，及傳媒的選擇性報導，皆故意忽略示威的真正和平一面。政府不應只靠互聯網和年輕人溝通，也要親身體驗，做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後記：一個15歲的學生已能對社會時事瞭如指掌，對政府的敗行如數家珍，如果大家要再說現在出來的年輕人是對社會不理解、是被誤導、是被指使甚至煽動，便先請看看這位同學的言論吧，就會發現那些指控根本就是無中生有。

老味男

出生於80後，頗為活躍的社運份子，一個自稱怕死但有良心的人。

老味男常強調自己怕死，又怕痕又怕痛，更怕坐監，所以衝就一定無自己份。例如羅湖橋事件，自己因怕被沒收回鄉證，又怕被打，所以沒有去，但對行為上衝和勇的人十分欣賞。他認為每個80後皆有獨立思考和強烈性格，雖在紀律方面因每人性格不同而有參差；及不會被大佬控制，包括他自己。

筆：你認為80後激進嗎？

男：自己不覺得激。只是推鐵馬，怎會算激？即使萬一出現暴動，自己也可理解，當然這可能性不大。因為先是政府把人推向牆角，利益被既得利益者操控，等於政府打你，又不許你喊，很諷刺。主流社會怕自己利益受損，想安逸，所以才一時未能接受80後而已。自己很認同呂大樂所寫的四代香港人的困境，形容得很貼切。

筆：你出來參與社運，是基於甚麼原因？

男：不滿社會沒有公平的平臺，讓人盡展所能去爬上去。但現在要上位只能靠擦鞋、盲目追從、違背良心，使很多人得不到應得的。希望即使上了位的人，也要有良心，在大是大非上能堅持良心。自己要求很簡單，三餐一宿已滿足。但現在連三餐一宿也有困難，努力工作也難以維生。因

政府完全傾向一面，向大商界完全傾向。自己出來是基於現實主義，不像其他同伴那麼理想，不像他們那麼崇高，但即使三餐一宿得到滿足，做人一定要有良心，不要歧視未上位的人和弱勢。

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見到別人受欺壓，怎可不出聲？做人即使有溫飽也要有良心，如果每個人都做到這樣，根本不會出現那麼多怨氣。自己不滿政府根本不明白社會問題，及見到一班人只懂附從政府，做應聲蟲，不講良心。那班人自己生活安定，便對有訴求、有困難而出聲的人說要和諧，不想他們出聲，十分自私。保皇黨正是好例子。

筆：你認為80後有否聆聽其他人的聲音？

男：政府沒有聆聽80後的聲音，衣、食、住、行、良心等五個最基本的問題也解決不到。連最基本的民生問題也解決不到，怎去聽其他意見呢？

80後願意聆聽別人聲音、不會偏聽，對弱勢關懷，除了特權階級沒良心的說話，甚麼都會聽。與其花時間去聽特權階級的說話，倒不如去關心被人看不起的弱勢一群。特權階級現在是想把着數拿到盡，想把所有社會利益也霸佔，使社會資源不能被公平分配。

筆：現在年輕人出來有甚麼因素？

男：年輕人不少是被欺壓而出來，包括我自己；以及看到不公義的事。正如自己被別人摑了兩巴，怎可不站出來？

筆：你參與社運，有否感到有任何得着或犧牲？

男：犧牲了時間去娛樂、去幫助家人和做義工。現在是用多了時間走向政府去爭取基本民權及要求政府不要偏聽。得着是從社運中能教育市民甚麼叫「衝權」，自己有甚麼公民權利，有哪些公民權利被剝奪。也透過社運令市民關心社會，多討論社會大事，充份言論自由和多元化。

筆：你對政黨有何看法？

男：自己不太相信政黨，曾很buy社民連，但後來發現政黨所能做的也很有限。但政黨能啟發市民知道自己有甚麼公民權利，教育市民自己的政治論述，再透過辯論，將理念宣揚開去，讓市民自己選擇。政黨起了引導思考的作用，讓市民自己分辨各政黨誰好誰壞。

筆：你對80後這一詞有何看法？

男：沒有標籤性。從字面解釋是80年到89年出生的人。最緊要是堅持自己的想法，不介意別人的看法。

後記：問老味男為何要當着面指罵陳志雲及在城市論壇向陳克勤飛胸圍，老味男解釋是想讓欺壓小市民的人，也嘗到被欺壓的滋味是如何難受，但強調不可做犯法行為，只可在法律容許下盡量令對方出醜。老味男是一個很坦白直率的人，有思想，每次行動都很清楚自己在做甚麼和背後的意義，非外間認為的無聊生事。

李世鴻

出生於70年代，社會界活躍人士，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助理。

李世鴻從WTO世貿示威開始投身社運，WTO可謂他參與社運的啟蒙。自從WTO後，李世鴻較少看主流傳媒報導，多看網上的新聞，如獨立媒體。因主流傳媒已多歸邊，且較少非本土新聞，明珠台除外。從網上新聞能較易瞭解每件事的真相，因報導角度沒有偏頗。主流媒體受到社會的保守氣氛和政治實況影響，對建制有偏頗，不能保持中立。即使現在的民調，很多時也是政府透過媒體去操控主流民意的工具。發現很多專業人士是為大財團服務，受它們控制而做出一些不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的事，稱「專業禍港」，只是為錢，而政制的不公義扭曲了香港的現象。

筆：你認為80後的本質是怎樣的？

李：80後的個性是為自己爭取個人潛能發展的空間，不是跟隨由特權階級支配而定下的社會大方向；爭取真正民主，社會由人民當家作主，因香港以前是由英資作主，回歸後則只是改為中資作主，從不是人民自己作主；社運人士是對社會不公義醒覺，憑着良知走出來。八十後運動是一種奪回應有權利的行動，是基本的做人態度，是正確的。人不應支配別人，也不應被別人支配，人與生俱來應是平等的，現在社運是爭取人的平等。

筆：現在有一些保守甚至極為保守的人士稱社運人士為暴徒，很暴力，你有何看法？

李：自己從不覺社運人士暴力，拿鐵馬是因為警方侵犯人民使用道路的權利，在權利被侵犯下的對應。等於有人被強姦，作出反抗，是否暴力？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演變為暴動或流血事件？有沒有機會？

李：機會大小取決於政府如何處理。特區政府的政治技巧非常低劣，只懂以鎮壓模式，包括減少言論空間去讓社會不清楚真相如何，不管模式是硬性還是軟性的鎮壓。但越打壓，就越遇到反抗。人不應做順民，每人都是獨立個體，有獨特需要，應有獨立思考。順民即是不問因由便臣服於權威。

筆：四代港人論出現後，有說法指80後都是高學歷、低收入的，你認同嗎？

李：這說法未必對。80後當中有些是自願在相對舒適的環境下生長，不太計較人工多少，夠餬口便滿足了，未必真是對向上流有野心。他們很多是對社會有理想，想改變社會現在的狀況，如想改變社會的不平等；如認為社會發展不應是這樣，只是被金融和地產主義主導，使某些想像力被扼殺。

筆：你現在有何社會訴求？

李：自己認為社會動蕩是在互動作用下產生，社會越保守，越易有股求變的勢力爆破。現在社會比70、80年代更保守，很多人無法發揮所長。社會保守是資本主義帶來，是寡頭壟斷帶來。例如大財團不斷侵蝕獨立的小商戶、超市不斷侵蝕士多與辦館；小市民做小生意也很困難，因地產主義主導下，租金過貴；領匯的出現更是趕絕小商戶。既得利益者的壟斷強到市面競爭全被它們壟斷，你看連外國的超市集團也難以進入香港市場就知，中小企更是在不斷萎縮。壟斷使香港人的選擇越來越少，社會只是被大財團支配。在沒有寡頭壟斷下，香港會有更大的空間發揮所長，而不是直接或間接地為大商家和李嘉誠打工。

筆：你參與社運，有否感到有任何得着或犧牲？

李：犧牲了陪伴家人的時間，雖捨不得，但也是值得的。因為爭取的權利是和香港所有人有關，不是為自己，爭取的是每個人做人應有的權利。得着是不斷擴闊自己的視野，對於不同人和群體的包容性大了；接觸的層面廣了，看到不同人的看法，不會強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別人和事情，對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更易處理。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持續下去？會的話，又會維持多久？

李：由天星事件已感覺到社運會不斷發展下去，是社群被政府壓逼下的必然結果。透過自己的經驗分享，告訴群眾權利在哪裏，啟發他們為自己的權利去爭取，群眾才是真正

能量所在。

筆：你怎看現時警察和示威者的關係？

李：拉鐵馬的重點是道路使用權利，不受權威壓逼和支配，並非犯法，而是警方在侵犯遊行示威者使用道路的權利。前線警員只是普通人，對社運人士有誤解也不足為奇，當然也有警員是支持示威者的。

其實群眾運動不是要使用武力，只是想對政府造成壓力。前線警員也是受到上級和政府壓力才被逼作出某些打壓行為。群眾人數不斷上昇是政府不斷打壓的結果。其實示威者沒有敵視警員，知道他們只是執行上司指令，故不會刻意挑釁警方。

筆：有保守派中人說示威者是博出位、是被煽動，你對這些說法有何意見？

李：不是博出位，是堅定爭取權利，不是做騷。也沒有人被煽動得了，是制度出現問題，人便憑着良知站出來。

筆：政黨可在社運扮演甚麼角色？

李：政黨本身是協助角色，不可能，也沒有辦法駕馭群眾，雙方是合作關係。政黨不應做領導角色，而是作為協助角色。政黨應瞭解民眾想法，在議會中替他們發聲。現時的功能組別議員因並非大眾選出，故所聽的民眾聲音也較少。

筆：你對社運發展有何展望？

李：繼續為社會的不公義發聲，對不同族群受打壓都會

站出來，因香港存在很多不公義的事。相信香港有變好的一天、會更加民主、更加進步，不單是議會民主，真正民主是越來越多人醒覺，社運正正是去感動別人，使關心社會的人成為主流。

後記：李世鴻給筆者有一種很有性格和魅力的感覺，可能這與他不羈的外表有關。他的論述，有一種很強的感染力。

梁穎禮（阿禮）

出生於80年代，音樂人，平民，社會大學學生，FM101主持，高鐵事件中六位斷食者之一。

阿禮由音樂運動開始轉而加入社運。

音樂開始了自己，喜歡左翼樂隊Rage against the machine，欣賞他們走得前、站出來反建制、反主流媒體。影響了阿禮的價值觀，思想甚麼叫搖滾。支持和平與愛，捍衛人的尊嚴。阿禮不會設定自己是怎麼樣的搖滾人，而是思考搖滾怎樣產生，不是要仿製樂隊音樂，而是要探求他們的態度，不是為做商品而寫歌。搖滾發乎於內心，是多元性的，但不會用搖滾去看世界，而是找個中庸之道。每人心內皆有反叛一面，視乎是濫用了還是被過份壓制了。音樂可影響世界，音樂可改變世界。香港的音樂可嘗試帶出多點社會訊息，不應只是追求美麗，應去感受社會，用音樂表達出社會問題。

2005年的WTO給阿禮的感覺最大，對韓農苦行、衝擊的行為感受很深，使他明白到是人的尊嚴的問題，資本主義遺害太深，剝奪了很多生命的尊嚴。阿禮沒有特定政治信仰，不過較buy民主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中的人民自己計劃發展。他是為公義而參與社運。

筆：你怎去看（2010年）1月16日的所謂警民衝突事情？

禮：警方使用胡椒噴霧，自然出現一個混亂場面，令人產生人民在搞事的錯覺。使用胡椒噴霧是想使人產生示威者無故搞事的錯覺，主流傳媒中了計，變相配合政府的抹黑手段。但人民不需要怕政府，只有無能政府才會怕人民。

警方揮動警棍，使用胡椒噴霧是主動暴力，是政府故意把那裏當成戰場，令外界對示威者產生作反的錯覺。而議會暴力則更可怕，功能組別根本是法西斯產物，由一班不吃民間煙火的人去剝削人民的選擇權，把自己觀點強加於人民身上，造成長期貧富懸殊。

筆：有人說社運是破壞社會的穩定和諧，你有何看法？

禮：其實政府和傳媒扭曲了和諧的字眼。和諧並非不出聲，知道不公義存在也不站出來不是和諧。和諧是人與人平等的溝通，但貧富懸殊那麼厲害，不同階級的人沒有平等的溝通機會，何來和諧？有平等才有和諧，而平等是要靠自己雙手爭取。

筆：四代港人論出現後，有說法指80後都是高學歷、低

收入的，你認同嗎？

禮：年輕人不是因為上不到位而出來，當然很多人都會追求向上爬，但爬不上並非使人們參與社運的原因。現在年輕人追求的是生活質素、心靈質素，而非追求資本。因為香港是自己的家，年輕人才參與社運。

筆：有保守派中人說示威者是被煽動，你對這說法有何意見？

禮：沒有人可強逼人走出來，是不想全單接受建制盲目塞入腦袋的思想，才走出來。是自願出來追求心靈上的質素。

筆：你參與社運，有否感到有任何得着或犧牲？

禮：沒有犧牲，出來是關心，是負責任，如可再選擇，只會選擇更早參與社運。自己辦民間電臺，可能會因此而入牢，失去自由，即使真是如此，也不是犧牲，因可喚醒別人。自己明白公民抗命的後果是入牢，但願意用自己的自由換來別人認清社會的不公義和不公平情況。

得着是不再寂寞，認識了一班難得的弟兄姐妹，彼此感情深厚，義無反顧的互相支持，深信自己追求的，終有一天會實現。

筆：你怎看80後這個標籤？

禮：對80後一詞不反感，但過份標籤便不太好，因沒有人能代表整個年代的人，但政府和主流傳媒全把社會問題歸

咎於80後，但真相是有了社會問題才有80後，而非80後在製造社會問題。政府的標籤造成了本末倒置。見到社會有問題走出來很自然，沒有不對。不應太着重80後這些字眼，不應從80後入手研究社運人士，因社運人士包含不同年代的人，而80後也概括不了所有社運人士。

筆：你常舉辦關於爭取開放大氣電波的活動，可否在這方面說說？

禮：開放大氣電波運動是長期抗爭。希望FM101會成為一個社區電臺。社區應由人民規劃，不應預先設下框架，現在的活化工廈政策其實是一限制創業、趕絕藝術的政策。

大氣電波是天然資源，應用作溝通，而非媒體被商人瓜分，應由民間享有。

後記：筆者自問也十分喜歡搖滾，認識也不少，但看了阿禮對音樂的態度，對他分析的搖滾精神，真的感到無地自容。也從阿禮身上看出一種大無畏的精神，為了喚醒社會，連坐牢也不會視為甚麼問題，以平常心對之，這種精神，令人肅然起敬。

金鷹（曾浚英）

出生於80年代，社運前線和活躍份子。

金鷹見證着六四、回歸、金融風暴、建華亂港、沙士、八萬五、廿三條。以往認為年輕人不關心時事，但那些社會

事件令他們反思自己的生存空間，社會究竟是怎樣？為何那麼多人燒炭？會開始問點解。從倒董運動開始，年輕人開始明白民主的重要性。年輕人發覺原來主流傳媒也不可靠，於是會透過互聯網去得悉真相。政制最大的問題是人民難以參與公共事務。在外國，人民談城市規劃、民主，其實是很普通的上，為何在香港要負上重大代價？隨時要被捕、被控甚至坐牢？謝炳德案便是一個好例子。

制度的不公，助長了一班政治特權階層。而權力使人腐化，他們只會更貪婪，不去體諒廣大市民，不會自我完善。最後衝突會出現，因妥協永無效果，是因特權階層壟斷了社會的財富和低下階層的勞動成果。金鷹反對放任資本主義，希望透過議會民主去達成社會民主主義。

筆：四代港人論出現後，有說法指80後都是高學歷、低收入的，你認同嗎？

金：呂大樂的講法較籠統，說出了些事實，說出了上一代的機遇和發展非必然，是時代巧遇。四代港人論其實是上一代人的一些反省。但呂大樂的觀念不可概括所有80後，外界和傳媒用四代論去研究80後，是捉錯用神。

筆：政黨可在社運扮演甚麼角色？

金：政黨是有存在的必要。因制度上不容許全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需要有代表，透過民主選舉選出真正的代表和透過選舉使人有政治覺醒。

筆：有保守派中人說示威者是被煽動，你對這說法有何意見？

金：肯定沒有被煽動和被指使的情況出現。如果是被煽動，根本不會甘願留守，然後被警察抬走，不會付出那麼多。其實只要論述越強，產生出意識形態，人民便會自發出來。

筆：你認為八十後運動出現是基於甚麼原因？

金：09年七一，約200人留守政府總部，要求曾蔭權對話，但不到半年，圍着禮賓府的，已迅速增加到二、三千人。這是因香港太多不公平的事情發生。政治特權階層、大財團、中央等勢力不斷干預香港事務，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官商勾結，基層永遠得不到保障，甚至是被壓逼、被剝削，民主不斷被壓，且情況越來越嚴重。這種情況其實香港人是知道的，只是選擇面對或迴避、出聲和沉默的分別，現在多了人選擇出聲面對。

曾蔭權是A字肩的人，缺乏承擔，喜歡走精面，經濟則靠攏大資本家和地產商，對香港長遠沒有全盤的發展計劃，令貧富距離不斷擴大，比董建華更差。他對政治和歷史缺乏常識，只懂狡辯，他的文革是極端民主論、六四代表港人論，反映了他的無知。

筆：你怎去看所謂警民衝突的事情？

金：當大家爭取了民主20年也無甚成果，反而越來越

保守，使更多市民認為舊有的方法已無效，引不起當權者的關注。所以行動上會改變傳統方式，包括軟性和硬性的。可能因此便多了突發事件，甚至演變成警民互相衝突的鏡頭，包括語言上和肢體上的衝突，如多人選擇了被警察抬走才散去、為了能到達示威的目的地而去移動鐵馬。但這不是因為一班人傻了，而是有很多前因，如警方阻撓民眾、不肯和民眾對話、欺騙民眾（突然無故封鎖原本答應開放的道路），民眾感到受騙受欺壓，便會對警方不信任和敵視。加上近來警方的可信程度和形像不斷下降，如警署強姦案、警務人員運用特權吃鳳姐的免費午餐、甚至派便衣混入社運行動中，情況和法西斯的特務、俄國的秘密警察分別不大，派便衣扮社運人士，再做出破壞行為，令人誤會是真正示威者所為，掟水樽事件是好例子。

社運人士不是犯罪集團，為何因政見和政府及建制派不同便要受此對待？

筆：你參與民間電臺，組成FM101，有何原因？

金：大眾傳媒其實是由一班資本家擁有，是特權階層用來控制話語權的工具。所以主流傳媒的報導手法往往出現偏差。因此決定參與開放大氣電波運動，說明媒體不一定要由特權階層擁有。因話語權是屬於大家的。

筆：你參與社運有甚麼難忘經歷？

金：09年12月尾，自己和一班朋友到內地投案，承認曾

簽《零八憲章》，應和劉曉波一樣被以言入罪。當行至羅湖橋時，被內地公安帶走，因行動前已有被扣留的心理準備，所以在背包內放定了三本書，以便在扣留時可以看書解悶。但那三本書被公安搜到，公安拿着第一本書，問我是甚麼書，我便答是一本關於托洛斯基主義的書，公安追問即是甚麼樣的書，我便答是一本關於共產主義的書，怎知公安突然把書掟在地上，然後說：「共產黨的看個屁！(按：請把語言頻道轉去普通話頻道)」想不到一個以共產政權立國的政府，下面的公安竟然對共產黨那麼反感。然後公安問第二本書是甚麼書，我答是長毛梁國雄寫的《波政不分》，然後公安們輪流閱讀那書，每位公安約看了十多分鐘，顯然對長毛的言論很感興趣。

之後到第三本書，每位公安看的時間更長了，大約每人20多分鐘，有一位年輕的公安，更閱讀了超過半小時，且看得津津有味，非常投入，那本書是鍾祖康寫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到當我被釋放時，那位公安私底下問我：「香港有沒有言禁？」我答沒有，然後那位公安微笑，從他的表情，看出了甚麼叫欣喜。此事使我感到，做香港人對中國發展是有意義的，因自己所做的事，也是為內地同胞爭取民主自由平等。讓內地同胞看到三權分立、言論自由的好處，這些正是內地同胞所渴求得到的。所以香港人更應好好珍惜，不要讓人把這些價值破壞，所以爭取民主的人不要倒退。

香港人不要太短視和唯利是圖，不要越趨保守。你看一百年前的人講革命，一百年後的人竟然說怕抗爭！如果連香港人也甘願被「和諧」，選擇迴避政治問題，這對整個中國也是損失。

筆：（2010年）1月16日的反高鐵集會，從新聞片段看到你有份企圖衝入立法會大樓，請說說有關這事的東西吧。

金：我一直認為不公義的議會應被解散，再組一個含公義的議會。我評估過衝入立法會的行為不會被認同，所以反對這樣做。但當看到有約十多人這樣做，為了對他們的獨立思考表示認同與鼓勵和啟發其他人參與，我最後也決定衝入去了。因不能排除自己衝入去後，可能激發其他人參與的可能性，而使事件成為焦點，突顯了功能組別的不公義，使社會更關注此問題，功能組別有可能因此而解散。雖然事後事與願違，但如果再選擇一次，自己也會這樣做。可能有人不認同這做法，但大家應包容不同的表達手法，只要目的不是去傷害人，便應包容。

筆：老味男形容你是最激那位，當然事實並非如此，你又不是帶頭衝入立法會大樓的，但為何你選擇走在抗爭最前線？

金：我很buy蕭若元的一句話：「首先要使每個人有獨立思考，社會上人人有獨立思考，極權專制便不能立足，民主才有土壤，才可實現。」當天轉而支持衝入立法會，就是為

對一班比自己更年輕的年輕人的獨立思考表示認同。自己走在前線，除了控訴對極權的不滿外，也希望香港人能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存空間，想激發香港人重新思考自己的社會應如何的問題。

後記：對話過後，知道金鷹的激不是激動，而是激情。他很清楚自己在做甚麼，他背後有很強的論述。他對學者沒有好好運用自己的知識和資助，反而越趨保守，思想不前進的事情很失望，也是使他走在前線的原因之一。

張思晉

出生於80年代，青年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陳鑑林助理。

張思晉也有參與遊行示威，不要誤會以為是建制派的成員就不會用遊行示威來表達意見，或對政府沒有不滿。張思晉是（2010年）1月15日的撐高鐵大集會、團體撐高鐵陣線的發起人。過往參加過的遊行示威包括反對領匯加租的遊行，反對領匯不斷踢走小商戶，應還回小商戶生存空間及照顧居民的消費力，希望領匯要有商德。他認為很多人也不喜歡80後這個標籤，因80後除了代表80年代出生的人外，某程度也給人認為是標籤着激進一代。他介定自己為理性80後，對有問題的政策會出聲，但不會作出拉鐵馬行為和衝擊，因那些行為對事件沒有幫助，是不理性的表現。他認為每個年代皆

有保守和激進的人，但現有一群激動的走出來，令一批沉默的也走出來。他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穩定發展。

筆：你怎去看有參與反高鐵停撥款集會的一班示威者或80後？

張：客觀來說，不能說全是激進的，因為當中大部份也是和平理性的。但根據觀察，當天參與反高鐵的大致可分為三批人。第一批是和平表達意見的，也是最大的一批；第二批是在行為上是激進的；第三批是不太了解事件，純粹貪玩。

筆：那你怎樣分析那三批人？他們為何站出來？你對他們各有甚麼印象？

張：第一批，即和平表達意見那批，是因沒途徑表達意見，沒人聆聽他們的聲音，故只好走出街發聲。如果有機構有渠道去聆聽他們的聲音，他們的怨氣必可減少。他們面對的生活環境之困難，政府幫不了他們。新一代人面對的困難不會比上一代人少。上流機會少了、人工少了、升職空間少了、買樓困難，加上現在沒有首置，連買居屋也要首期。但曾俊華司長的言論表示年輕人是關心會所、泳池有多大等，是不明白年輕人面對的困難和他們的心態。現在年輕人連樓也買不到，怎會去關心會所和泳池有多大？所以政府要有政策幫助他們，針對他們的需要。

第二批即行為上是激進的那批，他們的行動使社會分

化。在1月15日撐高鐵集會那晚，看到很多平時不出來的人也出來，因覺得自己的聲音被激進那邊淹蓋了，他們平時是沉默的大多數。這樣會使社會不健康，大家應和平理性的走出來商討和理論，彼此尋找共識和聆聽不同意見。

但社會需包容不同意見，因自己也追求民主和言論自由。社會必定有不同聲音，但應互相包容，不應要別人聽自己的聲音而作出激進行為。你看他們用上包圍禮賓府等字眼，是學了臺灣那邊的民進黨和紅衫軍。包圍、起義、解放香港這些用字會教壞下一代，且字眼具有煽動性。所以在大是大非上應站穩原則，對那些字眼說不，所以即使覺得可惜，因大是大非的原則，民建聯也未必參與五區總辭的補選。

那些激進行為沒有意義、不理性、對事件沒幫助，我自己是反對的。自己欣賞苦行等行為，但不欣賞拉鐵馬的行為，那只會傷到別人和自己，所以當晚出動的警員人數才那麼多，因有部份人激進會令當局緊張。萬人包圍立法會，有人企圖衝入立法會，當然警方要有維持保安的責任，和確保官員、議員的安全。激進行為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和諧。即使鄭汝樺那天出了來，也未必能在一個平等開放和公平的情況下對話。而高鐵事件後，我聽聞政府有聯絡反高鐵的主要人士對話，但沒有答覆。

第三批是那些抱着貪玩心態，對事件一知半解，被嘉年

華式的集會吸引和看到反高鐵那班人處於道德高地，便參與集會。他們對細節未必理解，當參與是學習通識教育。我希望他們去多了解事情資料才再作判斷。

筆：高鐵事件，政府有甚麼地方做得不好？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張：政府公關不力，諮詢落後。例如政府應一早解釋錦上路方案如何不行，應公平地讓人看到那方案的不足之處，而非否決了就算。且諮詢落後，渠道發放不足。你看年輕人多是上網去尋求資訊，但政府的諮詢文件還是要人去民政處索取。其實政府應在Facebook內的反高鐵群組，詳細列出西九方案的支持數據，讓人明白是甚麼一回事。當然市民也有責任去主動了解多些。政府應多做溝通工作，多讓小市民發聲。現在那麼多人走出來，另一個原因是沒有政黨能代表他們的聲音，因而自己走出來。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演變為暴動或流血事件？有沒有機會？

張：我是擔心的，你看網上有群組是叫已準備流血和革命。又看現在五區總辭，又起義，不能怪人聯想到流血事件和革命。此風氣不可長，這會使香港將來有危險，不利發展。有沒機會很難說，但情況發展下去可能會，例如菜園村收地時便有機會。

後記：張思晉是一位很友善的人，願意和人傾談。不要

以為張思晉是民建聯成員，便不會對政府有不滿。他同樣可長篇大論，細指特區政府的施政如何不足，如對樓價的瘋狂沒有政策對應、副局長事件處理得不好、曾蔭權常黑面，令人反感。他也同意曾蔭權在（2010年）1月14日的答問大會，應走出立法會大樓和斷食者會面；又認為蘇錦樑在卡片事件中的確是做錯；功能組別的確有很多不公平之處，只是難以即時廢除。最後他說出，外界誤以為民建聯常搞甚麼蛇宴，實情不是這樣，搞蛇宴多是工聯會，民建聯甚少搞，況且那只是聯誼活動，沒有問題，同樣要向區議會申請。

羅健熙

出生於80年代，民主黨成員，Roundtable成員，立法會議員甘乃威助理。

羅健熙指自己在摸索如何在政黨和社運人身份中間遊走。自06年開始從政，感覺到政黨和社運之間的距離，兩者很疏離，合作空間不大。自己參與社運又參與政黨，想拉近兩者間的距離，使人感覺到民主黨的人並非與社運如此疏離。在政黨與社會運動之間摸索，也希望能夠做到一種類似「參與行動的觀察者」或「有所觀察的行動者」，然後再透過自己有的媒界、渠道，將第一身訊息帶給公眾知道。這仍在摸索中，因為不想抽離，仍在摸索在行動時如何做到更多觀察。羅健熙承認民主黨較少主動去找現在社運的活躍團體；

給人感覺立場不夠鮮明，與民主黨定位為跨階層政黨有關。民主黨在社會政策路線上給人的印象不清晰、對新興價值和問題敏感度不足，有點慢；但民主黨是很樂意聽取不同意見。

筆：政黨在社運中可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羅：政黨可以和公民社會密切接觸和合作，政黨也是公民社會一份子。政黨不應過於理會選票問題或席位問題，不應受過多制肘而去決定應做甚麼事。政黨如想推動自己的理念，不要考慮太多制肘問題。從政的人只要合乎理念，即使民意支持度不高，也應該去做，要有前瞻性。從政的人不只是民意的傀儡，而應去提供角度讓人選擇是否跟隨自己的理念，扮演領導角色。政黨和自發人士（80後）的合作，我會覺得兩個組群對不同的人有不同吸引力。有人會因為80後的行動而被激發，然後日後自發參與行動，亦可能有人暫未有自發行動的準備（可能因為工作繁忙沒時間理解不同議題，或者沒人帶隊就沒有動力等），要靠政黨去組織；兩者可以各自做的同時，其實某程度上已經是分工合作中。

筆：你怎去看80後這個標籤？

羅：這標籤太概括性了，使80後的人有些撕裂。如沉默的人會感覺到被參與社運的一批騎劫了，便對他們產生不信任。但實情是傳媒強把80後這個標籤套在參與社運的80後身上，這些80後也是被逼的，十分無奈，很多事也被這標籤抹

殺了。80後只是貪方便的形容，和四代香港人不同。四代香港人是說在一個大環境，不同時代的人面對的不同情況。

筆：你認為社會對80後的接受度如何？

羅：接受度不算高，但在上昇當中。現在市民對80後的瞭解多了，不管支持與否；亦多了很多人認同80後的有心和熱誠。

筆：你認為八十後運動出現的原因是甚麼？

羅：80後對於現在的社會發展模式有疑惑。「拆，起、拆，起、快，快，快」，這種由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發展模式有否過時？應否繼續下去？80後有一半是在殖民地統治下成長，有一半是在特區統治下成長。當他們看見特區政府偏袒既得利益階層，不是真正聽取民意，便會發現特區政府的管治手法只不過是再殖民式的管治。而80後面對的困難和實況令人思考為何有此情況發生？是發展方向出了問題？政府的問題？80後會因其遭遇而使思考多了。

筆：社運份子當中很多也不大喜歡大佬文化，你對大佬文化有何看法？

羅：自己不多理會，不會去討好或故意接近大佬，自己是中間派。到最後選擇跟隨大佬與否，是自己決定。自己知道民主黨內有大佬文化存在。在政策層面上，民主黨是由上而下，由立法會議員帶領怎樣做，由下而上做起的渠道較少。也看出民主黨的大佬們的確和社運界有些脫節，已跟不

上不少社運事件中牽涉深入價值的事。感覺到有些大佬做了多年也不肯退下來，並非為錢和戀棧議席，而是對下一批信心不足，不放心交給他們接棒，怕他們會選輸，於是才選擇繼續留下來。

筆：有人指80後是博出位、拿着數，你有何看法？

羅：沒有着數可拿，要拿着數也不會用這些方法，冒上被控襲警、被拉被鎖被抬的風險。人們感覺有80後是博出位，是由於傳媒次次訪問也找同一班人，製造icon，使人誤會他們博出位為宣傳。其實受訪者是很被動的，包括陳巧文。不受訪又怕影響與傳媒關係，這才出現受訪者被人指是博宣傳的誤會。

筆：你是Roundtable成員，Roundtable和80後有甚麼相似之處？

羅：Roundtable為年輕人提供了發聲和討論的平臺。Roundtable和80後相似之處是內裏的成員多元化。但80後的趨勢會使政府更多聆聽Roundtable的聲音。

筆：你參與社運，有否感到有任何得着或犧牲？

羅：唯一感到可能算是犧牲的是自己畢業後已加入政黨工作，但若當初選擇做社工，在薪酬和工作穩定性上，應比現在為佳。但為追求理想，不會怕有犧牲。得着是認識了很多人，使自己的價值觀多次被衝擊，思考層面因此廣了。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持續下去？會的話，又會維持多久？

羅：要看政府的回應，如果政府繼續這樣，八十後運動會持續下去。但如政府肯改變，肯重新思考發展方向，不再偏袒既得利益者，真心聆聽市民，八十後運動的行動出現次數會大為減少。可是暫未看到政府有認真改過的迹象，這樣社運層面只會更擴闊，更多年輕人和中學生，和比80後更少包袱的90後會大量參與。政府太着重行政主導的迷思，政策只是由上而下，往往因此忽略了下層的真正需要而出現誤判，例如活化工廈因不了解基層需要而好心做壞事。所以政府真的需要聆聽民間聲音，不能像以往的其實是知會多於諮詢的假諮詢。

筆：你認為香港社會對社運的普遍看法是如何？

羅：外界雖對社運界體諒多了，但仍偏向保守。拉鐵馬被警方阻止，出現碰撞是正常的事。只要示威者不是去襲擊別人，作出人身攻擊，應多體諒。其實拉鐵馬如何算激？激在哪裏？是警方安排不當，才導致拉鐵馬的情況出現。外界應多思考雙方面的問題，不應只是指責示威者。

筆：你對警方的印象如何？

羅：自己印像在(2010年)1月8日，1月15、16日，很多警察也是身在曹營身在漢，不少警員也和示威者有接近理念，但穿上了制服後，便要執行任務和指令。我理解前線警員必須跟足指令行事。當然也有很少數的警員面對示威者是會有衝動的一面，但當他們權力比示威者強大很多時，而出

現衝動一面，帶來的傷害性會較大。而警隊最上層有妖魔化示威者的迹象，因此下達的指令會較為凶狠，如指示下層警員翻看影帶去拘捕示威者。最上層的妖魔化，會使示威者反感度上昇和對警方信任度下降，是惡性循環。警方是suppose去保衞示威人士，而非去打壓和妖魔化示威者。

後記：羅健熙和不少民主黨的二三線梯隊一樣，認為民主黨的大佬應放心退下來讓下一代接棒，民主黨爭取民主的手法也應該因應時代進步而作出改變。筆者問他為何民主黨辦的蛇宴和旅行團，收費都比民建聯或工聯會的貴？是否想賺市民錢？羅健熙解釋，因那些活動需向區議會申請撥款，但區議會內，尤其加上委任區議員，以建制派的成員為主，故此民主黨的撥款申請常不獲通過，沒有資助，那些活動便需自負盈虧，所以收費才不能像獲得撥款的建制派那邊那麼便宜。

曾健超

出生於70年代，社工，公民黨新界東支部地區發展主任。

曾健超由90年代起已參與社運，當時是學聯成員身份，見證在97年時，社運在活躍的小陽春。看到近期社運再次火紅起來，也感到鼓舞。

筆：你怎去看80後這個標籤？

曾：80後是一個新term，由09年六四晚會開始出現，因社運由那晚開始，年輕人很多。而80後出現後，70後、80前等term也相應出現了。年輕人多至十多歲的人，而年輕人這term概括不了現在那班年輕人，便出現了80後這term，但不是80後的人給自己這個標籤。如果根據呂大樂的四代論，定義可闊到75年以後出生的人，連我自己也包括在內。80後這term沒有正面或負面的意義，比甚麼激青和憤青好多了。

現在的80後很多彩、很活潑、很有理念，動員力和創意都比以前強。如高登的一群有自己的T-shirt和面具、在Facebook的動員力很強、設計很多有趣片段在網上宣傳，不同之前的年代較單向和動員力較弱。

筆：你認為80後是否激進？

曾：一定不激進。推鐵馬是激進？飛掉鐵馬才是，但沒有人那樣做。我在95年開始出來示威時，已有這些推鐵馬行為，只是抗議警方和強權用鐵馬去限制人的示威權，才會有人推鐵馬。在外國，激進是指掟汽油彈、燒車。香港的遊行不論人數多少，也很和平。1月16日那天晚上，約1,200警員對約1,700示威者，差不多一對一，又對示威者噴胡椒噴霧，示威者用塊面去承受胡椒噴霧就叫激進？被噴後又沒用武力反抗，沒人受傷，這叫激進？警方在萬人大苦行時無故封馬路和行人路，我問警察為何無故封路得不到答案，封路後，示威者向後退，靜坐在馬路上，根本不激進，但警員卻走過

來推趕第一排靜坐的人，要強行抬他們走，因而才出現數分鐘的衝突，外界是被傳媒的選擇性報導誤導了。警察不斷用攝錄機拍攝每位示威者的臉長達一、兩分鐘，希望嚇怕他們，警方是在挑釁示威者，是在搞白色恐嚇。

筆：八十後運動對社會有何影響和推動？

曾：老套的說法是為社運注入新動力，但並非如此。社會標籤他們為新人，其實不必視之為新人而排他們，只是多了一班人因時事而關心社會，希望政府改變，故不應這樣劃分新舊。這次反高鐵行動，很有聲有色，很有理據，和以前行動的習慣不同，很多元化，能吸引很多人，使不少年輕人關心和主動理解社會。例如反高鐵嘉年華時，在小吃檔吃「高鐵滾蛋」、「菜園村不遷不拆蘿蔔糕」，很有溫情，人性味濃，在細節上會令人有回憶。

多年來社運的口號很悶，很大陸，例如「還政於民」、「爭取普選」；現在的口號很有趣，例如「細個教我仁義禮智，大個要我出賣良知」、「警察請冷靜，又要威，又要帶頭盔」，不像以前「警權無限大，人權被出賣」那麼悶。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演變為暴動或流血事件？

曾：這直情是抹黑的說法。一班在60年代曾經用暴力手段的人、曾放土製炸彈的人，如曾德成，現在反過來抹黑現在的社運人士。社民連掟蕉很暴力？那麼那班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射胡椒噴霧的不暴力？政府強搶市民口袋裏的錢去浪

費就不算暴力？可是主流傳媒卻幫着政府抹黑示威者，沒有腰骨。例如《東周刊》曾點名說我煽動年輕人，原因是我戴着一條在H&M買的Barger頸巾，就叫有起義、有搞革命意圖，這根本是無故強加罪名。社會分化，是政府和傳媒一手做出來，它們用抹黑手法企圖去誤導不在現場的市民，令之誤以為示威者不好、不和平。

筆：有說法指80後出來是被煽動，你有何看法？

曾：這說法對年輕人很侮辱，當他們低B，當他們不懂思考。如果說是被煽動，那麼當國家主席來港時，一班小學生被學校要求穿着校服到街道兩旁搖着旗、不停叫歡迎、歡迎，算不算煽動？如果不是，為何只能命令得到小學生？年紀大少少已叫不動。

筆：有指80後都是高學歷、低收入，你有何看法？

曾：是一種侮辱說法，有何證據？低學歷、高收入的人就不是80後？ 80後的人全是高學歷？高收入的人就沒有良心？很多高收入的人也很關心社會，例如公民黨中不少人也是這樣。

筆：你參與社運那麼久，有甚麼難忘經歷？

曾：（09年）12月18日成功拖延高鐵撥款後，大家一起唱《人民之歌》時，自己也感動得哭了。那種團結和溫情很動人，這就是人民力量。以及在反高鐵集會，看到一個自己認識的民建聯年輕義工參與苦行行列，該青年對我說在高鐵事

件中認清了民建聯的真面目，其後更加入在Facebook內的反民建聯群組。

後記：曾健超由95年開始已出來爭取民主，雖到現在還沒有民主，有失望，但不代表灰心。談吐很溫雅的他寄語政府，問題不是出於年輕人身上，而是政府本身的錯誤，政府要糾正錯誤，而非只是去解除不滿情緒。政府不要分化市民，例如登甚麼政制向前走廣告，但政府政制方案實質並無增加民主，這只會使人更反感，就像踩着人的腳不放，卻叫人不要出聲。

何民傑

107動力召集人，西貢區區議員，獅子山學會成員。

何民傑在2007年成立107動力，107指《基本法》10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相適應。」107動力的三大宗旨是減少稅金、捍衞公帑、簡政便民。107動力是香港現時唯一的國際納稅人協會成員。透過參與納稅人維權組織去監察政府的公共開支，用多元化手法，如舉辦街頭劇、讀書會、遊行、出版刊物去帶出訊息。107動力採取支持者制度，定期在網上交流意見和通訊，吸引很多年輕人和80後加入，但特點是不會互相管制，因大家是個體，話題投機便一起討論。

107動力想有突破，不想用傳統的捆綁方式去吸引年輕人，不會成立為政黨，因政黨太多限制，定位為強而有力的民間團體，不想直接從政。

筆：你怎去看80後這個標籤？

何：一個很籠統的說法，指一班20到30歲的年輕人，關心社會，然後投入社會。和Y世代一樣，伴着互聯網和電腦成長，在89年開始啟蒙，經歷殖民地的倒三角發展，即由封閉走向開放；但回歸後，經歷特區政府的正三角發展，即由開放倒退回封閉，如恢復委任制、看不到功能組別何時取消，使80後現象出現了。

筆：你怎看現在社運的新氣象？

何：現在年輕人多了參與社運，但氣象會否持續有待不同事件出現和觀察。而80後以後會用何種的形式繼續投入政治？會否加入政黨？立法會採用比例代表制，小眾政黨也能生存。80後的新氣象隨時會促成新的政治組織。

筆：你怎看現時的政府？

何：政府一年到晚的浪費公帑惡策罄竹難書，反高鐵運動令廣大市民參與，是因669億的公帑數字出現。政府的大花筒和浪費公帑跟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有衝突。像西九文化區，政府申請撥款216億，107動力已提出質疑，但當時社會整體討論的氣氛不熱烈，除了社民連外，其他民主派議員也贊成撥款，令人失望。香港之所以一直以來出現那麼多大白象和

小白象的浪費公帑工程與政策，除了政府大花筒外，在野黨不能起好好監察作用也是主因。直到高鐵撥款，在野黨才開始醒覺。立法會以前對政府浪費公帑的項目太縱容了，把政府縱壞了，使政府有恃無恐，惡習難改。我期待年輕人關心公帑運用的情況會持續，去推動公共政策的改變。

現在香港政府是走日本政府的舊路，發展同時有太多浪費公帑的政策，如落馬洲支線、機鐵，洗腳不抹腳，走向泡沫經濟，使公共財政出現赤字，迷信政府洗錢便可解決問題，但忘記那些公帑和開支要償還的，而負擔償還的，是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的人。不斷的浪費公帑，受苦的只是下幾代。

筆：你對警方處理示威的手法有何意見？

何：107動力常示威，是小規模的，警方也很客氣，但不是合作態度。態度非常官僚，諸多制肘，常動員很多警員來監視示威者，企圖嚇怕示威者，態度不友善，警隊要檢討。警方的存在是要保障市民安全，而不是去阻嚇市民的政治參與。05年韓農的行為激烈得多，警方也沒提出過任何起訴，但今天卻用更強硬的手段去對待比當天韓農和平數十倍的示威者。究竟警察是執法還是在企圖嚇走參與示威的人？警方是要維持治安，但不能干預市民的基本人權。

警隊一年的開支達120億，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一年國防開支、人均警員的開支是全世界最高，所以市民也有責

任監察警隊。

筆：你認為80後出來的原因是甚麼？

何：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捍衞公帑，二是保育，三是反對功能組別的不義。本來三個主流各自行動，但高鐵事件把他們聯合在一起。

年輕人讀書多了，知識水平高了，更易看清政府的真面目和狡詐。政府施政之惡劣、不聽民意的態度、民主訴求被多次打壓令80後不再信任政府。除非政府真是醒覺，否則，80後、90後、千禧後會繼續出來。

後記：最後何民傑寄語80後、90後、千禧後，雖然大家也看到政府是一個失敗的父母官，但我們的醒覺要繼續，否則情況不會改變，要持之以恆；只要大家努力，逐漸的改變會使社會改變，不要使改變停下來。

何來

出生於60年代，但強調是精神上80後，本土行動成員，多次參加保育運動。

何來開始廣為人認識始於天星碼頭事件，但其實之前她已經做關於本土文化和可持續發展的事。她認為現在的都市化只偏向國際化，忽略了和趕絕了鄉郊化。政府對香港長遠需要甚麼、應行甚麼路線完全沒有概念，就連香港的本質是甚麼也不清楚，導致香港的原本居住模式不斷被破壞，連自

己的食物源也破壞了，變相下下要受制別人，使香港失去了自己的特性，市民的生活因而缺乏安全感。而保育就是要去維護生活原貌，不斷的石屎建築只是在不斷破壞生活環境的原貌。

因香港一向只是殖民統治和現在的再殖民統治，故根本不能主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氣候，以及文化。現在人民走出來，是想爭取回香港人應有的基本主導權。香港人是很被動的反政府，是政府的不斷失誤，市民才逼於無奈出來反對。而政府根本制度的缺憾，造成只需保證既得者利益便可，忽略廣大市民，貧富懸殊的加劇便是這種氣候造成的惡果。

筆：你對80後有何看法？

何：以前的社運多只衝着政治而來，但現在的有種自我治療、要解決社會問題的精神，會想盡辦法去創造解決方法。以前的社運只會找出問題，現在的80後和社運人士不但能找出問題，還能提供解決方法。

80後是在探討自己的社會應如何被塑造，已非像以往般只在仿製別人的模式。新一代的社運比以前多了多面性和持續性。

筆：你怎去看80後這個標籤？

何：80後是一個現象，把它標籤為年輕人是誤解，是把範圍壓縮了。把社會現象說成是年輕人問題，是自欺欺人。

筆：可否介紹一下本土行動是一個怎樣的組織？

何：本土行動在天星事件後成立，只是一個network或提供一個平臺讓保育人士聯絡，並非是為參與社運而成立。本土行動從沒討論過有何宗旨或一定會做些甚麼，因不想設下框架去把它限死。當然本土行動的出現也因政府沒有做好本土文化的保存。本土行動是一個精神化的組織，有着保育的基礎精神，但容貌會隨着社會和時代的轉變而相應的改變，因本土文化和社會環境是互動的。

後記：何來出來參與社運是希望喚醒人們對大自然的關注，對香港的本土性和海洋性作探討，希望香港人在學習新事物的同時，不要拋棄舊有的東西，因兩者是可以並存的，不一定要拆掉舊的才能有新的。

容樂其（Rocky）

出生於80年代，社民連副秘書長，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助理。

容樂其坦承因自己也是社運界中的活躍份子，的確見到很多參與社運的年輕人現在也不大喜歡社民連，很多社運戰友都曾是社民連成員，但退出了。社民連的確令人有種很浪漫的印象，是很有理據地去是其是、非其非的反建制，很有理念，就連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也承認社民連是香港最有理念的政黨。但多次的行動，使社民連給人一種霸道和愛話事

的錯覺和觀感。但容樂其仍和其他社運份子很融洽，有合作空間，也希望用行動使他們對社民連改觀。

筆：你對80後這標籤有何看法？

容：不太喜歡這標籤但又不覺得有大問題。但自己會懷疑背後的動機，是否政府和傳媒受了中聯辦文宣部的指示而運用這標籤去深化問題，把社會問題說作成年輕人問題，去轉移視線。

筆：80後的行動算不算激進？能否接受？

容：看哪個組成部份。建制及既得利益者不會接受，因思想保守，任何形式的變革都難以接受。自己則接受，也會說服別人接受，因80後是要求改變，不是在搞破壞。

筆：80後有甚麼政治信仰、思維和理念？

容：是很多元化的。但基本相信民主理念、公民平權、沒有人生出來應有特權、信均富，但不是共產那種，而是每人的財富照樣有差距，但應按公平準則來公平分配。自己則信奉社會民主主義。

筆：80後的運動有否破壞社會安定及和諧？

容：先要看甚麼是穩定和諧。要解決社會問題，社會才有真正和諧。現在80後和市民只是在揭示社會問題和矛盾，及出來幫助解決問題，例如協助菜園村居民以溫情手法去說服政府和外界不要拆毀他們的家園，而非叫他們用武力方法。即使最終改變不了結果，也要保留最後的美好時光。沒

有了80後，那些社會問題仍然存在。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演變為暴動或流血事件？有沒有機會？

容：擔心的，但主動權不在80後，而是在強權政府手中。警方不應過份打壓，而09年的國慶遊行，2010年頭的元旦遊行和1月16日那天，中聯辦或警方也是反應過敏，設出過多的無理限制，引發示威者不滿，示威者是被動的。若警方和政府肯多與示威者溝通，警民衝突可避免。

筆：你自己有何宗旨？

容：自己是從中華民族的民族復興作出發點。我熱愛中國文化，相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格言。但在中共領導下，太多事情做得不好，當然中共也非一事無成，要肯定中共在養活13億人、軍事科技和工業發展的成就。但社會的確存在太多矛盾和不公平，如9億工農民生活坎坷；讓一小部份人先富起來，但富起來後就死守利益、窮奢極侈，對農民子弟的生活艱難卻不理。很多地方的平民居所因土地發展而被拆，沒有人給予幫助。

自己不會打倒共產黨，但會揭示其制度的不義，如大資產階級壟斷、官商勾結的不義。我不太適合衝鋒，比較適宜用論述說服人，從文化方面入手說服人。

筆：如何爭取社會各界對你／你們的認同？

容：我採用的方法是和各界對話、講道理。即使是建

制派，也不會放過和他們溝通的機會，哪怕不完全同意他們的觀點，但也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也要明白別人的苦衷，不可下下話人無骨氣，要體諒別人的處境和天性，應互相包容。自己希望社運和社民連也是從論述方面說服人，如解釋政制的不公，會導致很多民生的政策也出現偏頗，領匯和教育改革的失敗皆是好例子。

筆：你認為80後出來參與社運，是否被指使？

容：從來不認同80後是被指使，頂多是認同別人的感召。根本沒可能受人指使。80後是覺得社會有問題，自己行出來爭取，最多是現有人把問題說出來，自己感受到和認同，便決心行出來。

筆：你對80後出來是因上不到位的說法認同嗎？

容：有些認同。但要看甚麼是上不到位。如自己想做的事被人用手段阻止，就會認同。

以自己為例，我以前是教書的，曾連續兩年被學生選為最喜愛的老師。有一次有位老一輩的教師在國民教育課對學生說四川沒有豆腐渣，是在塗毒學生和向學生說謊。於是我接着向學生說六四問題，且還是跟很多人大和政協的說法和口吻，說當年軍隊殺人絕對不應該，但某些學運領袖如柴玲一邊叫學生上前，自己卻一邊走佬的行為也不合理。但因我說了這番話，就被學校開除了。從此我開始投入社運。

年輕人上不到位，是制度偏袒一班既得利益者所致。社

會不公平，沒有公平的競爭平臺，只要親建制、懂得搞關係便可上位，有才能的卻被忽視，這不利民族復興。

筆：你參與社運有甚麼犧牲和得着？

容：很難說有犧牲，但當了社民連行委，可能因此返不到大陸。得着是對人生有另一種看法，看到很多水準遠高於自己的人，令自己奮進和對社會認識深了。

筆：政黨可在社運扮演甚麼角色？

容：自己和主席陶君行的期望差不多，認為社民連有深化論述的需要。社民連能為年輕會員提供多點培訓，教授論述，培養新一代，否則就會愧對社會。在社運中要有無私的精神去幫助別人和其他團體，而不是借幫助其他團體而為自己做宣傳。如一邊幫人，一邊拉banner宣傳自己是要不得的行為。

後記：容樂其認為現時的教育制度埋沒了很多應可成為棟樑的人，教育過於單一，只是聽書、做功課、考試，埋沒了很多學生的創意和承擔感。教育制度沒想過要為年輕人對自己想投身那個行業作出支持，而只是訓練他們成為一式一樣的人，如果年輕人做不到社會認同的行業，便會被邊緣化。教學內容和現實脱節，如生物課只講理論，不講和保育、營養學和減肥的關係。

楊秉基（Banky）

出生於70年代，好戲量藝術總監。

楊秉基也有參與社運，也有參與反高鐵集會。但他主要是以藝術、戲劇的形式參與。戲劇源於生活，參與其中就可參透生活。以藝術參與社運的形式是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去刺激社會，而社會也可刺激他們的創作。藝術不是大規模的生產或複製，而是社區文化發展，促進社區社群得到發展。

香港人視戲劇為一種消費娛樂模式，以既有思維去看街頭表演，以為是博宣傳。其實街頭表演是走入群眾，把訊息帶給人們，令人思考，注重表演者和群眾的即時交流；而走入群眾也是政府應該做的，但政府沒有。

藝術是以人性為本，不用甚麼文化區或大建築物，政府是完全不了解藝術。雖然好戲量的街頭表演方式引來很大爭議，但這不是純負面的事，因可引發人們的討論和思考，當別人作出批評，也會尊重別人的言論自由，最緊要是自己自律。也不應因為別人不認同而不去做自己認為對的事。在全球化下，跨國企業推出的東西，以模仿作為指標，香港的建築、藝術、政府政策都是受這樣的思想限制。所以楊秉基希望可以用戲來帶給人反思，如好戲量的原創劇《吉蒂與死人頭》便是想帶出這個訊息。

教育制度也一樣，政府把學校變成一間公司看待，看的

不是學業，而是學校的營運成本、收生率、開支等，是把教育商業化，看作成投資。學生學業以倒模形式灌輸，學生成為倒模式的產品，使香港變得枯竭乏味。政府把教育列入六大產業中，但教育中唯一成功產業化的便是牟取暴利的補習社，而不是教育本身。好戲量的《陰質教育》正是反映這問題。可見，要帶出聲音和意見，除了街頭抗爭，也可以用藝術形式，使社運更多元化，以不同形式去讓人思考和討論香港的社會問題。

香港沒有普選，政府不是為市民做工，只是為中央和大財團做工，忽視了青年人的真正需要，產生很多問題。民眾戲劇正是要讓被忽略的聲音帶回入社會。只有不斷做，吸引多些人參與，不用人人是專業演員也會參與，才可打破一貫的主流思想，才可將被忽視的一群和聲音去被人注意。反高鐵苦行也是一種行為藝術，發聲不一定要進攻，也可用行為藝術去讓別人感受和關心自己想帶出的訊息。民主不只是一人一票，民主是人民可透過不同平臺自己作主，運用自己的長處和特點去為社會做事。

只要出聲便可改變環境，改變社會的不公義。香港的議會充滿不公義，政府不是真正聆聽市民需要。而傳媒正在把社會兩極化，希望抹黑社運人士，使他們變得負面和令人反感，所以報導有選擇性。例如傳媒用80後一詞去分化不同年代的人。政府和建制派則不斷醜化示威者，如葉國謙指示威

人士是暴民；警方不斷限制人民的示威權利，甚至用上便衣探員去陷害示威者。這是因既得利益者怕社會改變會影響到自己所得，便透過政府、旗下的傳媒和巴結他們的建制派去嚇怕群眾。政府和建制派真正的服務對像其實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楊秉基理想中的政府是一個包容、誠實、有視野和聽多元聲音的政府，應兼顧不同的人、不同顏色、不同聲音，不應只是照顧既得利益者。他不會屈服於政府和權貴，會繼續運用自己的專長去反對不公義的政策。

後記：很感謝楊秉基為了此次訪問，怕會「訓過龍」而整晚通宵不睡來等待筆者早上到訪，連對一個小小的訪問都那麼認真，可想而知他對藝術的熱誠和認真度是如何崇高。訪問期間，他對筆者透露，原來康文署轄下的場地會優先提供給聽政府話和受政府資助的團體，這些團體多達十多個，且每次可book場地達數星期之久，加上因是受政府資助，門票可以以低於成本的價格發售。而像好戲量這些被視為不聽話、不受政府資助、以自負盈虧模式生存的團體，即使有幸book到場期，也因價格上無法競爭而處於劣勢。「人民的小事就是國家的大事」，政府在這等「小事」也親疏有別，處事不公，又怎期望在大事上站在港人一邊去造福港人呢！

周諾恆（Jaco）

出生於80年代，社運的活躍份子。

周諾恆初次參與社運是WTO那次。之前很少接觸社運，甚至不知有那一回事。以前以為政治只是由政黨搞，直到WTO一事，才發現有人會自發去抗爭示威，使自己反思在抗議中也可保留個人的自主性。雖然落場後沒有中央統籌，但感受到示威者的團結，如互相掩護免被警察的胡椒噴霧射中。這事使他開始明白甚麼叫人民的團結。

2010年1月16日反高鐵集會令他再次有此強烈的感覺，無論苦行、拉鐵馬，都是自發性的，有人自動和別人分享被人抬走的經驗，不要觸碰到警員，免被人有藉口告襲警。當晚有人對周諾恆報以微笑，說：「這些無政府狀態，大家最自動自覺。」他感到當沒有大佬去策劃去強逼自己做事，大家反而有種自發性去做事，很自律，有效率，會守望相助。所以政府過多的干預，過多的壓逼是無意義的。

筆：你怎去看80後這個標籤？

周：只是傳媒一個概括的標籤，並不全面。80年代的不算特別，每個年代也有人出來反對社會不公義或社會問題。

筆：有說法指80後都是高學歷、低收入的，你有何看法？

周：其實很多80後有正職和兩餐溫飽，包括我自己。80後不是上不到位或失敗者，發窮惡才出來，80後是為公義、

為理想，甚至倒貼錢也要走出來。

筆：80後的行動算不算激進？

周：說80後的抗爭行動是暴力或暴民或激進的那些講法才是暴力，是抹黑。肢體碰撞只是很少數，是基於警方和示威者的互信低了，警隊也是建制的一部份，但港人和政權的互信少了，和警隊的互信也自然少了，但示威者從不會針對警員的個人。且行動形式是多元化的，有軟性的如寫歌、出海報，不像以往只是拉橫額、叫口號就算，不能只是表態就算，還有嘗試用行動去突顯制度的無理。

筆：80後出來是自發性的還是有人指使？有否被人煽動？

周：現在的抗爭越來越依據自己的意識和思想，不用受人指使或煽動。乖不等於理性，人講甚麼就信甚麼，不加思考才是不理性。沒有了解80後就說80後是被指使或煽動的人才是不理性。

80後沒有大佬文化，反而是民間帶領政黨去行。現在因資訊多了，所以自發出來的人也多了。

筆：你參與社運有甚麼犧牲和得着？

周：犧牲不覺有。得着是參與其中，對很多社會的事的看法深了，距離少了；認識很多朋友和戰友，有出生入死的感覺。

筆：你對社運有何感受？

周：感受到衝權。人民不會坐以待斃，而是盡自己力量去參與公共事務。即使在抗爭議題上，很多時是失敗，但感受到參與者的意識不斷提昇。

筆：你對有人說80後是博出位、博曝光有何意見？

周：這是一種涼薄的說法。自己接觸的社運界人士，沒人有此心態。因出來抗爭並非好受的事，也沒有私利可言，沒有着數可拿。其實大家都有種安貧樂道的心態，有時甚至是貼錢參加社運，如出錢做橫額。

後記：周諾恆表示，有指他們藉受訪問去博曝光，那是無理的說法，因人們不知他們私底下推了很多訪問。筆者就親耳聽見阿禮推掉一個港臺的訪問，所以對於他們肯接受筆者的訪問，再次表示感謝。如果他們要借傳媒訪問來博曝光，推掉的應是筆者的訪問，而非港臺的訪問。周諾恆表示正義觀是從性格培養，受家人和經歷影響，如被人欺負、權利被侵犯會出聲。

譚凱邦

出生於80年代，環保觸覺主席。

譚凱邦創立了環保觸覺，一個年輕、機動性的環保團體，核心成員有十多人，且是以80後為主；以城市規劃為議題，宗旨是透過調查和傳媒發佈，希望政府和商界更着重環保及令市民對環保認知加深。

筆：你怎看80後這個標籤？

譚：80後代表多元化，80後不等於反高鐵，有對自身的環境覺醒的特質，也是不能向上流的一群。但以財政狀態去判別80後是錯的。80後喜愛互聯網世界。

筆：你和環保觸覺如何參與社運？

譚：不是常常在街頭，較注重約見及游說。教育市民環保，和學校及教育界合作，例如「321齊熄燈行動」，最高峰時有500間學校參與。反高鐵撥款一事，也有發資料呼籲老師和學生參與集會，因學校除了教知識，還應教公義。

筆：現在為何多了年輕人出來參與社運？

譚：網絡宣傳的威力。年輕人多在網絡世界吸取知識，當對身邊空間覺醒便會走出來。今次高鐵是濫用公帑，多達669億；但用1.5億進行五區公投就是浪費，所以要打壓？這是甚麼邏輯？

但不是每件有關保育和環保的事也能動員。通常到了最後關頭才多人關注，如大角嘴海輝道賣地事件，因傳媒只是在最後一刻才報導，之前市民是難以得知事件，所以不能怪為何常常最後一刻才出來反對。也反映了政府諮詢的不足。

筆：80後出來是自發性的還是有人指使？有否被人煽動？

譚：是自發性的。80後想居住的地方、自己的地方變得更美好，因香港實在太多無謂的工程，影響居住質素。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持續下去？

譚：看政府有否回應訴求，大白象基建的主導模式能否停一停及多討論，多諮詢市民意見。政府對環保的關注不足，思維只以經濟為先，不是可持續發展。要轉變為不做太多無謂的工程和基建來破壞環境。

筆：八十後運動有否破壞社會的穩定和諧？

譚：現在的只是假和諧。真正的和諧是理順合理的要求，不是打壓訴求的假和諧。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演變成暴動或流血事件？

譚：機會不大，但不排除。如果去到那個地步，必定是政府非常令人不滿。沒有人喜歡衝突，歸根究柢是政府沒有理順人民的不滿。

筆：你為何參與八十後運動？

譚：出於環保因素。對現有的空間規劃、環保和政制問題不滿，而這些問題正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但政府沒有好好解決。

後記：譚凱邦表示，像環保觸覺的壓力團體扮演的角色是監察政府和動員群眾。又批評現在傳媒報導偏頗，只有NOW和有線較好。他又強調環保觸覺是覺醒的覺，不是角度的角，但傳媒常寫錯。

陳巧文

出生於80年代，港大哲學系研究生，自發行動者，社運活躍份子。

筆：你對80後這個標籤有何看法？

陳：80後一詞來自大陸，關於一孩政策和對外開放政策，指沒有兄弟姐妹，生活較豐裕，嬌生慣養。陳一諤說年輕人不關心六四，於是有班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以80後這個標籤去回應陳一諤的言論，說明青年人也會關心六四。之後80後一詞才廣泛地被傳媒應用。有些人接受這個標籤，如80後反高鐵。我自己不想用80後這個標籤，不想以年齡把自己區分出來。以年齡來分界作用不大，應理解年輕人想以80後來強調年輕人也會關心社會。可惜被大眾傳媒濫用，變成社運好像只得年輕人，政府更因而稱為「世代之戰」，是捉錯用神，因每個年紀都有人參與社運，以世代之戰去指稱，是排擠了其他年齡層的人。例如有人會說自己不是80後，如何參與社運！標籤使別的群組誤會自己不應參與社運。用80後來概括所有參與社運的人士很不全面，不是青年的，也應參與社運。

大眾傳媒用80後來形容在前線的示威者，只是把焦點放在年齡層上。傳媒應把重點放回參與社運的人的自發性，用自發性行動者去形容現今的社運人士比80後準確。

筆：你自己有何理念和思維？

陳：自己每個行動背後都有論述支持。如反高鐵，我看到是一個關於民主的問題；土地屬於人民，應讓人民參與規劃，但人民不能。眼見很多問題是因不公益而引發出來，不民主制度不斷製造不公義的事。看到不公義便會自發出來。

筆：請說說你當初為何參與社運？

陳：父母很支持民主自由，使我關注社會大事。第一次參與大型遊行是03年七一，當時我16歲，之後年年也參與泛民安排的活動。

第一次自發辦的行動是關於西藏問題，在三一四事件後。當時自己和數位同學做了些海報去呼籲別人關心西藏的事，但當晚海報全被撕掉了，於是轉去Facebook宣傳，開event去讓人們討論，結果招來滿城風雨。

在奧運火炬傳送那天，我和數名朋友帶着雪山獅子旗在火炬到達前幾個小時已到達現場，但在火炬到達前，警方強行把我們帶走，理由是保障我們安全。

筆：你當時堅持要舉雪山獅子旗的背後意義是甚麼？想帶出甚麼訊息？

陳：我從報導看到有一位印刷商因接了一單印雪山獅子旗的生意，被拘捕了，而那位印刷商根本不是印的正是雪山獅子旗，可見內地處處封殺這塊在元朝開始已經用的旗。舉旗的背後意義是為被打壓至無聲的人發聲，希望能帶出討論，令人關注西藏問題。有西藏人像香港人一樣，只是爭取

基本權利、言論和宗教自由，但在內地竟被看成是搞獨立，於是決定聲援那些被抹黑的西藏同胞。西藏人也是中國人，也是同胞。

筆：當時有TVB的員工問你是否中國人，今天我再問一次，你會如何回答？

陳：是。很肯定的是！香港是中國一部份，當然是中國人，自己是漢人，是中國人；西藏人雖不是漢人，也是中國人，是同胞。當看到同胞被強權所逼害，怎不能站出來為同胞發聲呢？所以當時才希望人們關懷西藏的同胞。我們不可用自己的權益凌駕於別人的基本人權。

筆：那麼你愛國嗎？

陳：自己是愛國的，對內地新聞十分關心，因此才會關注西藏事件。我愛國的程度可說愛得甚至有點自私，因看到同胞受欺負時，感覺會很大，會很心痛，有切膚之痛；如果同樣是受欺負，但對方是外國人，心痛程度沒那麼大，所以說是自私。

筆：那時很多言論和人都攻擊你，你有甚麼看法和感受？

陳：當然有不高興。但有言論和人身攻擊，是一個女性行動者常遇到的問題。因人們常把焦點放在女性的身體、外表，把議題背後的理性討論都忽略了，有點遺憾。雖不認同人身攻擊，但在大層面上，也應包容這些言論，不應刪除那

些言論。我有一次被人用水樽掟，這些意圖傷害身體的行為便不能接受。

筆：你認為現在社運發展擴大有甚麼原因？

陳：可歸納為三個因素。第一，從民主規劃角度出發，從天星事件，社運前輩把這些問題帶出來給社會討論，社會意識開始增加。第二，是環境問題。政府不斷延遲民主進程，加上政策失誤，民怨不斷累積。如今次反高鐵，人民要保衞的不單是菜園村，還有要改變不公平制度的決心。第三，網絡動員普及化，很多人自發參與。

筆：你對呂大樂教授的四代港人論有何看法？

陳：不能以那些說法去概括所有人。但從中帶出了官商勾結問題，既得利益者用制度去維護自己利益，剝奪別人利益。其實很多出來的朋友都有上位機會，收入穩定，經濟問題不大，這樣都肯出來，是因看到制度的不公義，感到憤怒。當然也有人是因那些官商勾結造成的困境走出來。政府想請呂大樂作研究是不夠的，應真正面對問題，真正港人治港，盡早普選，使社會公義；把公義問題當作為經濟問題是不公平的。

筆：有人說你們是博出位、拿着數、為反而反，你有何回應？

陳：先說為反而反。對別人作出批評前，應先了解別人。很多朋友每次行動都做足資料搜集，寫足論述，有根有

據地提出反對。

再說拿着數。根本沒有着數可拿。除非當家人被滋擾、被拘捕是着數。行動是自發性的，每次事後也檢討。願花時間去爭取市民應得的權利。

至於博出位，對這指責不感到出奇。尤其是女性示威者，常被批評為博出位，與社運一向以男性主導有關。自己不是博出位，不但毫無好處，且私生活還會因此而被傳媒揭發，常有記者在家門等候，使得回到家也不能安心。但只要出來的論述有道理，應把焦點放在那裏。

筆：有人以激進來形容示威人士，你有何看法？

陳：我看到的是溫和，和其他國家的社會相比，更是溫和得好緊要。但香港是一個相對較保守的社會，可能因此才覺得激進。但有理由的激情，也可帶出進步。

筆：你怎看現在的警民衝突？

陳：很多所謂警民衝突也是假的。有時只是想官員遞信，但官員不出來接，於是留守等候官員。等不到時被警員抬走，也不會作出反抗。但因有抬走，自然有身體觸碰，之後傳媒便以衝突來形容。推鐵馬那些是近期出現，背後是爭取合理示威距離，如元旦想把黃絲帶綁在中聯辦後門，如此卑微的要求也不能，只能綁在六重鐵馬外，人們才會推鐵馬。也只是想爭取應有的示威距離。

(2010年) 1月16日那天，警方突然無理封行人路，屬於

人民的路，連封路紙也沒有，是阻礙人民的公民抗爭權利。且根本不存在鬥爭，因雙方的地位不平等，一方勢力特別強大，一方特別弱小。強大的警方用身體武力去阻止人民的公民權力的行使，那些鐵馬是在守衛一些不公義的事和不公義的議會。

筆：你參與社運最難忘的回憶是甚麼？

陳：其實有很多，如果一定要說一個，是09年11月禮賓府開放那天，我們一行三十幾人自發穿有不同示威字眼的T-shirt。展示完之後已經走了去吃飯，但吃飯期間收到消息，指女長毛同是穿着有示威字句的T-shirt，但被拒絕進內。於是我們去聲援，但最後女長毛還是不准內進，我們亦再次離開，因禮賓府的開放時間已過了，但發現警方無故把離開的行人路封了，只餘下一條給狗行的路，人根本難以從這條路出走，加上警方又沒有封路紙，於是要求警方解封那條路。那時有些朋友已經走了，只餘下自己和另外一位朋友坐下來，要求警方開路，當時正在下雨，但我們兩個還不肯離開。最後警方肯拿開鐵馬，重開行人路。這證明只要一直堅持下去，目的總會達到。

筆：1月16日，你有份企圖衝入立法會大樓，為何你會這樣做？

陳：對於衝入立法會，別人可能不認同，認為是無效，但不可以認為不可能就不做，因直接行動才能開拓可能性。

衝入立法會背後的意義，是議會制度不公，民意基礎薄弱，但港人和社會的事卻由這個議會操控；這個不公義的議會常通過不公平的法案，要用方法去阻止這個不公義的議會通過高鐵撥款這個沒有共識但政府要強行通過的議案，哪怕只是能阻止一次也好。而衝入去，令議會被逼暫停，撥款便不能通過。當時在想，如果自己真的能成功衝入去，可能會吸引更多人加入，而不是只有當初的十多個人。拉布只能暫延，只有停止撥款，才能令政府再諮詢。

自己從沒想過要傷害任何人，目的只是佔據應該是屬於人民的立法會，只想打斷會議，不會去傷害別人，因那是不對的；而人民佔據議會有另一個意義，就是宣佈議會不再只是屬於特權階級的。

筆：參與社運你有甚麼得着？學到甚麼？

陳：能參與已是得着。希望能靠人民力量去阻止政府強推一些沒有共識的議案和浪費公帑的行為。即使不成功，也要給政府帶來阻力，令其反思自己的過失，知道假諮詢和漠視民意的後果。

筆：你對爭取民主有何看法？

陳：爭取民主不單是爭取普選，而是爭取真正的民主程度開放，制度上應有途徑讓人民能有不斷參與的機會，不只是每四年的一次投票機會才能參與。

筆：你參與社運已有一段日子，你有甚麼感受？被攻擊

時有否感到難受？

陳：覺得很累，曾逼過自己不要參與社運，不要理時事。但當看到不公義的事，新聞報導不公義的事，便自然會參與社運。因勉強自己不要出來，也很辛苦。

當私生活因而被騷擾，有失落，有不開心，有擔憂，甚至有時精神有點崩潰，因連在家中也會被人偷拍。家中應是最安全、最舒服、最自在的地方，但現在連在家中也不安全。

有時看到傳媒對自己抹黑，作故事，無中生有。如有時受訪問，較好的是會刪去自己言論的前文後理，拿一兩句來斷章取義，來做新聞；較差的是有些話明明沒說過，但出來的報導是自己說了那些話，傳媒借我的名義來說他們自己想說的事；最壞的甚至是明明沒做過訪問，也可以有自己的訪問片段出現。當然有些傳媒也是好的，有些是較差，如《星島日報》和《東周刊》就不太好了。

筆：如果可以選擇重頭再來，你還會舉起雪山獅子旗，還會參與社運嗎？

陳：如可再選擇，也會這樣做，沒後悔過自己做的事，因為是對的，是應做的。但和傳媒打交道的手法，會改變。

筆：你有否想過退出？

陳：有，常想這問題，但每次最後也過不了自己。自己應為香港做點事，因香港是自己的家。

後記：陳巧文是一個很有理念和論述、思維很清晰的女子，人也很友善，從不擺架子，反而很平易近人。最後她寄語：民主自由是要靠自己爭取，不能等別人幫你爭取，人應為自己站起來。

劉方

出生於80年代，前港大學生會主席，現於理工大學進行政策研究工作。

劉方曾和前立法會議員兼人大代表蔡素玉組成保釣大聯盟，辦保釣大遊行。

筆：你對80後的種種運動有何看法？

劉：年輕人有新的想法、新的訴求、新的組織形式，是很正常的事，每一代都如此。無論支持與否，我不認為強調80後作為運動的主體是一件有益的事。有些人很快把焦點轉到例如80後運動不能代表80後所有人之類的不相關事情上。

筆：80後的行動算不算激進？能否接受？

劉：激進指的是甚麼？如果指「過火」，我們考慮的不應該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具體情境：在甚麼背景下這些人採用了這些手段？我的看法是除了極少數事件外，大家行為都是合理的。

筆：你認為80後多次的社會運動，如保衛皇后同天星碼頭、反對高鐵用近700億建於西九、保護維港反填海、爭取普

選等等，背後有甚麼動機及原因令到他們這樣做？

劉：我想不同的運動有不同的動機，很多都是開宗明義的。很多時，大家不滿的是貧富分化、財團壟斷和缺少向上流動的機會。在當下香港的情況下，他們選擇了與「發展主義」抗爭，但發展和分配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不發展不代表社會就會簡單地變得更美好。怎樣發展才合理，才公平？這個可能是更根本的問題，但反而少人討論。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持續下去？會的話，又會維持多久？

劉：不清楚。現在一切都在發展之中，運動能否成功，重點是能否獲廣大市民支持，市民是否支持又要看運動參與者的表現。

維持也不會是過去透過組織維持的方式，因為很多運動都沒有組織，反而比較成功的運動會在人們的思想上留下一點東西。

筆：參與八十後運動的人有何宗旨、理想、信仰？

劉：新的運動很多元化、非物質化、去組織化。

筆：80後的成員是否博出位？為反而反？有破壞無建設？

劉：即使有這些傾向，也不會比過去其他的運動參與者（有些後來成為政治家）差。

筆：80後的運動有否破壞社會安定及和諧？

劉：社會運動可以是不和諧的結果，不一定是原因。

筆：八十後運動會否演變為暴動或流血事件？有沒有機會？

劉：有這個可能性，希望程度不會太嚴重。

筆：你認為80後有否聆聽其他人的聲音？

劉：別人聆聽他們多少，他們也會聆聽別人多少。大家都不會質疑80後青年的聽覺，你問的其實是聽到別人意見後有沒有作出合理的反應。在這個意義上，別人聆聽他們多少，他們也會聆聽別人多少。但這種聆聽需要很高的技巧：當有人說香港不應該再發展、或者說「我就是甚麼都要反對」，我們不能從字面理解，而應該尋找他們背後更深層次的訴求。

筆：你覺得社會用80後一詞去形容那班參與社運的年輕人有否不妥？有否標籤性？

劉：不知道「標籤性」指甚麼，是否一個標籤的本質？但標籤（作為能指）有甚麼本質呢？至於有沒有不妥，至少相對於「憤青」之類的形容詞來說，「80後」尚算中性，而且，據我有限的觀察，這些年輕的社會運動參與者好像亦願意用「80後」稱呼自己。

後記：劉方是一個很健談的人，很謙虛，很有學識。也給了筆者不少支持，是一位和善的有為青年。

張錦雄（Ken仔）

出生於70年代，男同性戀者和愛滋病患者，從90年代尾開始為愛滋病患者和同志爭取權益及擔任義工，於98年創辦同志機構「香港彩虹」，2001年創辦同志基督徒團契「彩虹細胞」，03年起擔任「彩虹行動」召集人，乃「七一人民批」、「民主倒董力量」和社民連的創會成員，曾任支聯會常委，乃香港第一位公開同志身份的區議會候選人，社運界活躍份子。

張錦雄於95年確診為愛滋病患者後，決心在剩下的人生時間中，為同志和愛滋病患者做有意義的事，遂參與義工和舉行講座。後來認識了男朋友Tommy仔後，開始進行抗爭，為同志和愛滋病患者爭取權益，包括爭取男同性戀者也可捐血、在麗晶花園事件中反居民歧視愛滋病患者和進行遊行示威。由於行為被視為過激，於是另組「彩虹行動」，專注抗爭工作。

同志界的團體和泛民一樣，是多元化的，彩虹行動的定位就像泛民中的四五行動一樣，多作衝擊行動，如衝擊天主教堂事件。從01年底起，因擔任支聯會義工及彩虹行動以團體身份於03年加盟民陣，期間認識不同團體，如學聯、紫藤、單親協會和社運界人士，開始參與社運，為弱勢爭取民主、人權、性工作者權益、種族平等、工人和婦女權益等等。由以往只是爭取同志和愛滋病患者權益發展到對民生、政治和對弱勢的關注。

張錦雄認為衝擊行動有其意義，可搶回發聲權和焦點，引起社會討論和公眾的關注。因此，彩虹行動多受外界關注，所發出的訊息為外界得知，由03年起，每年不下數百次到學校舉行講座，及和內地與臺灣的同志組織、工運團體、愛滋病患者組織合作。他參與倒董，認識到民主普選和民生幸福有直接關係，認識到不是民選的特首根本不會冒險去為少數發聲。其後他參與社民連的創黨，是因認同黃毓民支持弱勢、認為民主應包括多元小眾的信念，願意和不受保守人士歡迎的小眾團體合作，如紫藤、四五行動和性學會等；以及黃毓民向他表示不會怕因和彩虹行動合作而會得失教友、一些泛民中人、明光社甚至選民支持，認為黃毓民乃一真心為弱勢和有氣量的人。

張錦雄兩次以同志身份參與區議會選舉皆落敗，但認為以同志身份參選是有長遠意義的，必定經歷選輸和遭人抹黑和醜化。但見到很多老人家和年輕人為自己拉票，感到鼓舞，自己成功吸引不少年輕人和年輕同志加入政黨和參與社運。社民連創立後，多了非同性戀者和社運界人士參與爭取同志權益的活動和同志遊行。他希望把香港的民主運動和同志運動能和內地的連結，為內地的民主和同志運動起牽頭和示範作用。

張錦雄認為中共正在不斷軟硬兼施的對香港進行干預，如誘使傳媒歸邊、滲透不同組織，使港人治港的空間不斷收

窄，把香港人推成兩批人。第一批是只顧自己利益和賺錢的，第二批是失望的一批。而失望的一批又分成兩批，包括麻醉自己、逃避現實的一批，以及參與社運、參與抗爭去嘗試改變現實、反抗被無理欺壓和嘗試改變不公義現象的一批。如果不公義的情況惡化下去，極可能出現衝突場面，但極其量是當年WTO韓農衝突那種。他又認為現在社運界一班經驗較豐富的開始出現走向社運建制派的現象，盡量避免衝突和形像被破壞，有意無意間去奪取社運主導權。但又看到有少數人是願意豁出去和願意犧牲。對於現在社運的特點，張錦雄認為社運界已不像以前有大佬可以話事，因沒人可話事和擺平甚麼，而80後是一班有動力、有創意和不怕死的年輕人。而現在社運不像以前只叫叫口號，而是多了自己報導如獨立媒體、MyRadio、OurTv等，及越來越多論述去說服外界，軟硬兼備。

後記：張錦雄預期泛民在2012年選舉前後將會來個重組，會重組成兩大派，分別是民主偏左派和民主偏右派，又期望一些沒有政黨包袱的社運界知名人士能出來參選，如陳景輝、陳巧文、葉寶琳等。張錦雄在一次主持民間電臺的節目中收到一張熱心人贊助的千元支票，那人說明是透過社民連才認識同志組織。張錦雄於是用那一千元買了些有關同志權益的書，到廣州去推廣同志權益，開始彩虹中國的活動。

曉晴

出生於90年代，現為中五會考生及香港末代會考生，古洞北村發展關注組成員。同席還有社運的新一代活躍份子馮景恆先生。

曉晴於09年暑假參加香港青少年發展協會的模擬立法會活動，從那時起開始接觸政治及學習如何閱讀和尋找政府的諮詢文件。09年11月，曉晴身為村委會會員的父親拿了一份政府諮詢文件給她看，她發現文件內問題叢生，又沒有反映村民意見。政府為了興建低密度豪宅和豪華商場，將要拆毀整條古洞北村，拆毀村民的家園。曉晴本着為村出一分力和表達年輕人聲音，故加入古洞北村發展關注組，開始社運生涯。她在關注組內的崗位是負責應付傳媒和在網上作宣傳。她希望政府不要再以不公平和不公開的手法對待村民，不想多年來辛苦經營的家園被毀。村民多年來也貢獻社會，不應有此下場，而建豪宅、商場，得益的只是地產商，以及是在破壞香港的本土文化、破壞新界純樸的田園生活。

筆：你對現時社會有何訴求？

曉：政府的官僚主義嚴重，又長期忽視窮人和基層的需要，處事親疏有別，希望政府能改之和多聽民意。希望社會變得更公開和透明，政府不要再偏幫工商界及應要取消功能組別。建制派人士應從受壓逼的人的角度看事情，而非從自身利益出發。希望社會不要再以錢去衡量一切；既得利益者

不要死霸這利益不放，因利益是屬於所有人民的，不只是屬於單一階層。

筆：你對80後這標籤有何看法？

曉：這標籤太概括，好像說所有80後都會有激進行為。但80後不代表激進，80後和示威人士只是關心社會，但傳媒卻漠視示威人士想帶出的聲音。

筆：你認為八十後運動對社會有何影響？

曉：使更多香港人關心社會的事，改變多年來不多關心與己無關之身邊事的陋習。

筆：你如何看現在示威出現的警民衝突？

曉：其實示威人士只是推推鐵馬，推完只是放在路邊，然後靜坐，是很和平的。推鐵馬是因警察無故封着原本答應開放的路。

筆：你認為80後每次行動是自發還是有人指使的？

曉：是自發性的。因看到不公義的存在、看到政府一錯再錯，難以容忍，才會有班人出來，爭取一個更美好更公平的將來。而出來的青少年皆為獨立個體，有自己思維，難以受別人指使。

後記：曉晴認為，只要肯走出來，一定會有成績，不可怕了政府權大而不出來。筆者認為政府要在古洞建無煙城，建低密度豪宅和商場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多此一舉。因香港已經商場泛濫，過多毫無特色且一式一樣的商場。古洞本身

就是一無煙的田野美景，現在把古洞北村拆毀去建一無煙城，不是荒謬嗎？古洞本身是低密度的村屋和田野組成，把村屋和田野拆毀去建同為低密度的豪宅，不是明益地產商去剝削村民嗎？既然本是無煙和地密度住宅，何必把原有家園拆毀，去建能為地產商賺錢的所謂無煙城和低密度豪宅呢？「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道理難道政府也不明白？

陳嘉朗、林鴻達

兩人皆出生於70年代，陳嘉朗為尖碼之聲主席，林鴻達為尖碼之聲聯絡人。

陳嘉朗、林鴻達兩位於訪問中，細訴如何因政府在遷拆尖沙嘴碼頭巴士總站計劃下處處隱瞞、種種荒謬手段和刻意迴避，使他們兩位普通市民，身體力行、出錢出力的投身社運，誓保有近90年歷史、香港第一個巴士總站——尖沙嘴碼頭巴士總站；以及帶出如何在社運以多元化手法去爭取和抗爭。

尖沙嘴碼頭巴士總站不但是九龍半島的交通、商業、經濟的發源點，且是淪陷期間英軍力保的佈防地點，更是香港公路網的起點，極具歷史和經濟意義。

政府於02年提出名為「露天廣場」計劃，於尖東海旁興建一露天廣場，但要拆毀現在的尖沙嘴碼頭巴士總站。05年政府進行從未介入公眾層面的所謂「諮詢」，決定實行計劃。

可是該計劃不但勞民傷財，且嚴重影響民生。如計劃實行，文化中心一帶和廣東道原本擠擁的交通將會更不勝負荷。而巴士站被拆毀後，市民要步行至文化中心外甚至步行約20分鐘到麼地道的巴士站，為每天使用尖碼總站的四萬人次帶來極大不便。且天星碼頭因失去了這班乘客而功用大減，隨時在不久將來變成一歷史遺物，重蹈大角嘴碼頭、佐敦道碼頭和中環卜公碼頭的覆轍。

政府所謂的露天廣場能否吸引遊客也成疑！該廣場不但文化和歷史特色欠奉，更不能在那裏欣賞維港景色，可謂效用有限。最令人氣憤的是政府提供的資料極為簡陋，又沒有交通數據和客流評估數據、露天廣場能吸引多少人的估計也沒有。建露天廣場不但不能帶來利益，反而拆毀了具歷史價值的尖碼總站。保育不只在講建築物的保留，而是保衛人們生活及活動的原貌，使人能感受到香港的生活和文化，而尖碼巴士站正正能反映香港人的生活原貌、文化與氣氛，政府此舉是不尊重歷史和人的生活網絡及破壞市民的方便。

於08年，政府無視九龍城和土瓜灣居民的反對，把5號巴士線的總站從尖沙嘴碼頭遷到麼地道，影響民生方便。這時陳林二人意識到要進行活動去保衛巴士總站，以免重蹈天星碼頭的覆轍，要從碼頭步行十多分鐘去新巴士總站，而建所謂的露天廣場更是毫無意義可言。於是他們成立尖碼之聲，並兩度舉行簽名活動，於數天內收到超過11,000個簽名

要求保留尖碼總站。他們更於09年4月出席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會議，提交一個以巴士總站和周邊建築物為題的研究報告，並獲得聯合國接納為關注項目。他們又於Facebook組群組，呼籲同道人於09年的七一遊行中表達保衛尖碼巴士總站的訴求，反應踴躍。因此在七一後，尖碼之聲決心繼續行動，直至能成功保衛尖碼總站。

後記：他們二人表示政府要改善香港旅遊，根本不是建甚麼無甚價值的露天廣場，而是要先解決尖沙嘴一帶嚴重缺乏旅遊車泊點的問題，每天約150-200旅遊車會在當地停泊，但只得40多個泊位。政府不去解決這問題，反而去拆毀方便市民的尖碼總站，這種施政不是倒行逆施、本末倒置麼？

方韻芝

出生於80年代，藝術工作者，和胡家欣、鄭惠森、湯舜等人組成香港投訴合唱團，以歌聲表達對社會的不滿和現狀，希望以音樂和表演的方式把城市問題帶出來並引起公眾共鳴。

08年夏天方韻芝於紐約一個藝術中心看到世界投訴合唱團的作品，以歌聲反映城市真實一面，覺得很震撼。其後她回港和其他朋友一起做資料搜尋，於旺角行人專用區和火炭等地向公眾展示其他城市的投訴合唱團片段，觀察公眾反應和介紹投訴合唱團是甚麼一回事，以及蒐集市民的投訴和邀

請市民加入。09年6月把收集回來的投訴分類並開始公開填詞工作，任何人也可參與，人數達數十人之多。於09年的七一遊行第一次公開演出，反應熱烈，之後每星期的周六也會到街頭演出。

方韻芝坦言是組織投訴合唱團開始才參與社運，09年的七一遊行是一生第一次參與遊行。以前自己不會對政府有訴求，認為政府結構建制化，難以歸邊。但現在會關注不同議題，認為參與社運能使城市中的居民對城市的問題有所醒覺。

筆：你怎樣看近期的社運發展？

方：是香港人的一個突破，告訴港人只要肯站出來，社會會有所改變。社會的運作人人也可參與，不是只由政府話事。而社運也提醒了更多人關心城市發展。

筆：你怎看高鐵事件中的警民衝突報導？

方：因主流傳媒本身有立場，報導有偏頗是意料之內。但可惜的是公眾未必能透過主流傳媒了解實況。但現在多了網上傳媒，情況會有改善。

筆：八十後運動對社會有何影響？

方：令市民不再政治冷感。尤其另類的形式如苦行和斷食，容易感動別人，和使人更易理解訴求是甚麼。

筆：參與社運後，你有甚麼得着和犧牲？

方：沒有犧牲。得着是看到社會很多不同層面和接觸很

多不同面孔。參與社運的人雖抱着不同信念，但大家同是追求理想及和平的社會。

筆：高學歷、低收入和缺乏向上流是否80後出來的原因？

方：自己和身邊的朋友根本不在乎能否升職或能否向上流，反而注重是否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實工作狀態是怎樣並不重要，生活不只有工作，還包括對理想、對公義、對自由的追求和堅持。

後記：方韻芝補充，投訴合唱團的成員大多從展覽和網上宣傳召集回來，甚麼年齡層的人也有，不用有藝術或社運背景。一班原本不相識的人，因關心社會，透過投訴合唱團而認識，一起以歌聲去表達訊息。

林子健

出生於70年代，網上電臺青臺臺長，民主黨成員。同席還有青臺行政總監張大衛先生。

林子健看出現有的教育制度只是為國家培養不准有多元思想、只懂執行命令的奴才，例如不准問問題、不准反駁教師的說話、不准出聲等等，是在打壓年輕人的聲音和獨立思考，於是便和朋友成立青臺，為年輕人提供一個發聲平臺，讓年輕人可開放言論、無拘無束的去發揮。青臺的名字是DJ快必想出來的，其標誌則是中大的同學設計出來。張大衛認

為互聯網也催生了80後的出現，使社運形式由上而下轉為下而上；張又看出80後珍惜人的價值和關心社會；80後擴闊了社運的光譜，如有些多做論述、有些做分析及宣傳、有些做社會及城市規劃、有些做衝擊、有些做軟行抗爭，如苦行、斷食。

筆：你個人有何政治信念？

林：個人信奉民主和人權。民主不只是投票，而是人民文化上的意識形態和進步。人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信任和情，不只是一個制度。

筆：你認為政黨可於社運扮演甚麼角色？

林：現在的社運界和政黨有一種疏離。是因在意識上，兩者的首要考慮點皆不同。社運界的考慮出發點是直接看事情是否應該去做，透過批判和揭露社會上的問題及公民教育去喚醒社會；但政黨卻受到選票的局限，考慮點過多，只顧選民是否支持和考慮一時之民調而不是事件是否合乎理念。如領匯上市事件，政黨只考慮股民能否賺錢，但沒想過舊式商店會遇上的難題，沒去保障小商戶利益；校園驗毒計劃上又沒想過有否違反人權和為學生立下不良榜樣，只從民調角度考慮。政黨沒有培養批判性和公民教育意識，只是功利地計較議席得失，對推動民主發展的力度不足，對香港長遠利益未必好。

當然政黨也有其貢獻，政黨和社運界既有矛盾，但也有

合作空間。

筆：身為教徒的你，認為教會可於社運扮演甚麼角色？

林：耶穌來世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強權和權貴欺負弱勢的行為，要打破強權定下的不合理規條和反對官商勾結與霸權，例如耶穌會向彼拉多抗爭、去反抗法利賽人，而彼拉多和法利賽人正是權貴和強權的象徵；又例如耶穌反抗安息日不得工作的規條，不理會反對而去為人治病，耶穌那時根本是在公民抗命，就像現在阿牛和民間電臺在進行公民抗命，和耶穌一樣挑戰不公義的法律！耶穌又為婦女爭取可進入聖殿而進行衝擊行動，是在對抗不公義行為！所以教會應擔當以靈性角度去對社會作出批判的角色，教會應去推動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應去反對霸權和反對不公義的事和規條，而非在講甚麼和諧而不去抗爭，譬如教會會去四川賑災，但卻不會對譚作人被捕出聲、不會去聲討豆腐渣工程和聲討貪官。這是在默許不公義的欺壓行為，是對政權勾結的一種。現在的教會往往為了得到政府資助而不去批判政府和親建制，是把基督精神去和強權勾結，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教會。教會應為弱勢出聲，去行公義，好憐憫。例如1989年，東歐共產政權下的教會是充當弱勢和異見人士的避難所，為異見提供發聲平臺。教會應是幫助被強權壓迫的人，但現在教會卻講甚麼和諧，對不公義默不作聲，變相欺壓弱勢。

筆：在網上搞傳媒的你，怎去看主流傳媒？

林：其實記者朋友也很無奈，因主流傳媒只是為搵食，故此不敢得罪中共、地產商等既得利益者，於是表面持平，實質是盡量不去得罪強權和討好既得利益的一班。編輯自主受到政治生態的局限。

筆：你怎看現在參與社運的年輕生力軍？

林：要多謝他們。因搞了社運多年的一批已到了一個悶局，難挑起新思維。但現在的一班年輕人因沒大佬文化，對社運帶來新刺激和新思維。他們着重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着重人權和對別人的尊重，這些是過往的社運大佬不會去想的。他們在推動思想價值觀的進步，不再以建制框架去看事情，不會只顧自身利益。

筆：你認為現在的社運聲勢會否持續下去？

林：不會，個人較悲觀。因社運在高潮後，必定面對低潮，社運是有時期性的，有高有低。但高潮出現與否要視乎政府和政治生態。社運人士應作好準備去迎接新的高潮來臨。

筆：你怎看現時的政府？

林：政府正在不斷打壓社運人士，社運界前線將會面對抹黑和保守派的打壓，像大學也在不斷被中共蠶食，大學學運已不像以前那樣。

筆：你認為現在出來的年輕人皆是高學歷、低收入嗎？

林：不是，這只是上一代人的看法，並非事實。他們出

來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保護香港價值和本土精神，突破了資本主義下的人性疏離，會跟不認識的人守望相助，建立一個真正的和諧社會。

筆：你怎看80後這個標籤？

林：80後一詞被濫用了，代入了呂大樂的社運分析，出現了很大局限。很多社運活躍人士皆不是80後。當深入討論問題時，80後一詞容易使社會出現對社運的誤解，因社運的思維不是在年齡上的分別，而是價值觀的分別。但別有用心的人把80後一詞用來分化80後和社會的聯繫及扭曲社運的面孔。

後記：林子健補充，青臺、民臺、FM101是互相合作的關係，在同一陣線，互相幫忙。他又提及耶穌掃場的故事，故事說耶穌進入聖殿、趕出殿裏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許人拿着器具從殿裏經過。耶穌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着說『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麼，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祭司長和文士聽見這話就想法子要除滅耶穌，卻又怕他，因為眾人都希冀他的教訓（《馬可福音》11章15-18節）。這個故事是說耶穌反對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反對把教會商業化及在教會進行商業行為。但現在不少教會團體為了得到政府資助而走去親近建制和選擇不政治化、不去批判政府和建制的惡行，不正是把教會商業化和以教會對政權進行交易嗎？

李雨夢

出生於90年代，中七學生，社運生力軍，80後反高鐵成員。

李雨夢第一次參與社運是09年中，參與保衛菜園村的活動，當時她為《明報》的校園記者，負責報導菜園村的事，之後一直繼續留意菜園村事件和跟進事態發展，每次反高鐵集會也有參與。

筆：你個人有何政治信念？

李：老套說法，信奉民主、自由。在09年六四時多觀察了時政，多看書和尋找資料去充實自己。期間發現中共政府比想像中專制，而香港的自由空間，近年在特區政府的統治下不斷收窄。

筆：你怎看香港的城市規劃？

李：不滿意現在香港的發展方向。自己住屋邨，樓下的屋邨商場本來充滿地區特色，但領匯接手後，變成千篇一律的商場之一，失去本身特色，商戶被大財團霸着、土地被地產商霸着。其實市民也可以參與城市規劃的過程是最好的，因市民可自主自己的城市如何發展。城市發展應多重視人性和人的生活面貌，而不是現在那樣盲目發展。市區重建欠缺完善規劃，只是在不斷破壞地區的特色、破壞地區的面貌和鄰里情，某程度上，現在的發展增加了人與人之間的陌生感。

筆：你怎看80後、90後這些標籤？

李：沒多大感覺。80後標籤由陳景輝等人創立，如80後反高鐵群組便用了80後這個標籤。可是主流傳媒用80後這標籤去模糊化社運，描繪成只有80年代出生的人才參與社運。其實每個年代的人也有參與抗爭的。

筆：你對現在的特區政府有何看法？

李：現在的特區政府只是一個屬於中央的扯線公仔，真正為民的施政措施也不多，導致貧富懸殊不斷加劇。曾班子過於着重政治化妝，卻忽略了去理解市民的真正需要。

筆：你對現時的制度有何看法？

李：香港現在行的是一個着重商界利益的制度，例如為了給地產商利益和建樓，強行清拆居民村落；塱原濕地不斷被破壞，政府不理、新界東北發展又偏袒地產商。立法會的組成極不公平，自己從高鐵事件看到功能組別的禍害，功能組別當中很多議員只是跟隨大隊的投票機器，而非真正向市民問責。

筆：你怎看近期社運時出現的警民衝突鏡頭？

李：主流傳媒把那些鏡頭無限放大，而自己在現場看到的是和平靜坐，個別傳媒的報導手法有心離間外界和示威者。警方在沒有警告下便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但警方卻有着警棍等武器。而事後警方拘捕示威者的行為、沒有搜查令便強行入屋，拉阿禮、楊匡、陳巧文又缺乏實質

證據，根本是在搞白色恐怖。但前線的示威者不會被無理嚇怕，警方此舉只會激發更多不滿。警方某程度上淪為政治工具，進行政治打壓。

筆：你怎看現在出來參與社運，和你年紀相約的人？

李：90後／年輕一代關心社會是好事，即使不參與社運，也肯去了解社會問題，是好的發展。但有不滿，不妨參與社運，那是會有成效的。即使目標未必達到，但也能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和更多人理解自己的訴求。而互聯網的推動，Facebook的出現，使資訊流通了，和召集速度快了。大家都清楚自己在做甚麼，即使反對，也是先理解事件才反對，有充份理由。

筆：你對政黨有何看法？

李：我對政黨的信任度不大，不論是甚麼派別，有時太顧自己利益。但政黨也有存在的需要，如能在議會內為市民發聲。

筆：你參與社運有何得着？

李：感受了很多以前沒有感受的事，多了解時事，不像以前不問世事，現在會主動去理解社會發生甚麼事。

後記：李雨夢希望更多人去關心菜園村的事，希望更多人去理解社會上的事。對於（2010年）年初二，她和80後反高鐵成員於車公廟為香港人求籤，是想給大家思考，每個人也可為自己、為關心的人、為自己的家園香港去祝福，而不應

假手他人，此舉不是特權階級的專利。她們是為香港求籤，而不是代表香港求籤，每個人應自己代表自己，及可為關心的人和事求福。

婷婷

出生於90年代，應屆會考生，菜園村居民。

婷婷參與社運，源於09年收到通知，家園菜園村要逼遷，後來葉寶琳、朱凱迪等進入菜園村，協助抗爭，婷婷因此加入了社運界。雖然菜園村進行了多次抗爭活動，但政府一直不樂意和菜園村居民對話，對社運界也是這樣。婷婷說根本不相信在2010年1月16日那天，鄭汝樺真的想出來對話，因這些日子以來，鄭汝樺從沒真心願意和居民溝通。鄭汝樺只是做騷式來到菜園村，第一次是在村公所外站了十分鐘便走了，第二次是在平日，大部份村民出外上班上學的時候，又沒事前通知，來菜園村走走便算，有心迴避村民，但政府卻對外界說和村民會面了四十次，十分荒謬。而政府的人員每次入村，態度也不友善，對村民不加理睬，但在1月16日後，政府人員入村，會和居民有傾有講，態度友善，給人虛偽的感覺。

筆：你現時對政府有何訴求？

婷：希望政府不要只為幫助發展商賺錢而對基層市民漠不關心。政府要逼遷菜園村，沒理會受影響老人家的身心，

太過一意孤行。政府和建制派對弱勢關懷不足，希望政府能多關注弱勢。

筆：你怎看80後／90後參與社運對社會的影響？

婷：有班80後／90後出來，可以喚醒一班對政治冷感的學生。出來的年輕人都是關心社會，有思考，但政府和部份傳媒把他們抹黑為暴民，十分離譜。當天有人推鐵馬是因警方無故封路。是政府一直不肯面對市民，不肯去溝通，才越來越多人出來，從09年12月18日的集會發展到過萬人集會，是政府不肯去溝通所致。難道對政府凡事都不問是非的支持就叫好？

筆：你怎看警方處理社運人士的手法？

婷：（2010年）1月16日那天，我看到示威者只是在靜坐，當有人指着警員便被噴胡椒噴霧，有點無理。而警方事後拘捕社運人士，只是想起阻嚇作用。警員是應去維持社會秩序和維護公義，而不應看作只是維持生計的工作，不過我和參與社運的朋友也明白警員是在打份工，不會去為難他們。有朋友私底下問過來菜園村的警員，當他們除下制服後，會否仍站在政府那邊，他們回答說不會。

筆：你認為80後／90後出來的原因是甚麼？

婷：他們本身留意時事，對政府有不滿便出來，而不是因為沒有工作而出來。出來的年輕人有自己的理想和見解，是真心關心社會和願意貢獻社會，即使沒有利益也肯出來。

他們不會政府說甚麼，自己便說甚麼。但政府和部份傳媒把年輕人抹黑成只因遭遇不好而出來，把他們描繪成背後沒理念，不滿工作際遇便出來。互聯網使年輕人更易動員，所以多了年輕人出來。

後記：熱心參與菜園村活動的婷婷，希望政府經過高鐵事件後，會有改善，不再假諮詢，能真正走入人群中去聆聽市民聲音，不要再因為要溝通的是弱勢市民，而繼續漠視他們的訴求；政府處理訴求應一視同仁，而非對某些利益階層特別照顧。筆者曾聽有些人問為何要保留菜園村？在這些人眼中菜園村不是甚麼具價值的地方，只是一些種田種菜的地方，為何要保留？其實，農村、農田是任何地方也必須的，農村和城鎮的重要性皆一樣，缺少任何一方，社會皆不能運作，就像有陽必須有陰、有光必須有暗、有黑必須有白、有剛必須有柔、有天必須有地、有熱必須有寒。正如道家講求的陰陽調和、二元對立，農田和摩登城市必須並存，社會才能調和。「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

彭義桄

出生於80年代，民間電臺行政總裁，反功能組別聯席統籌，社民連行委。

彭義桄真正參與社運是從08年立法會選舉做阿牛的義工開始。其後加入民間電臺，在民間電臺負責發射技術、管理

節目和策劃遊行、街頭論壇等抗爭運動。民間電臺啟發了很多年輕人，如FM101的一群，是信念強和認為是對的事就會做，即使是犯法，也會義無反顧的抗爭。民間電臺的公民抗命抗爭是香港史上最長久的，由05年開始至今（2010年）已有5年之久，且還在繼續下去。民間電臺也很受到市民支持，每次遊行所得捐款在泛民團體中數一數二的，當中原因是市民明白民間電臺需要很多錢去進行司法抗爭和打官司。雖然因為公民抗命，的確有非法廣播要被罰款，兩次罰款總共30多萬，但連法官游德康在判詞也表明民間電臺不是為自己利益，是為人民福祉，情操高尚；另一法官夏正民在判詞上也如此認同。

彭義桄又指出民間電臺雖和社民連相似，但是兩回事，雖有不少人，如阿牛、長毛、羅就也同是兩個組織的成員。民間電臺的信念是以公民抗民的方式去對抗不公義的法律，以及保護弱勢聲音，為小眾發聲。現在政府只發3個電臺牌照，但政府的FM頻道其實可容納100多個電臺，政府不肯開放大氣電波牌照是協助現有電臺造成壟斷，如調校頻道時，調到哪裏也是同一個臺，但在外國，一調便可成功轉臺。

筆：你有何政治信念？

彭：自己信奉社會民主主義，是通過民主程序，去讓人選擇自己信奉的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個能照顧弱勢，使社會更健康和使所有階層得益的主義。可是香港市民現在連

選擇權也缺乏。

筆：你怎看80後這標籤？

彭：自己不太喜歡用80後這標籤，因世代分隔不是這樣用的。有些人用80後去標籤激進的人，有些人把80後等同沒有工作的人。自己會用80後來形容有革命意志，但不是要流血那種，要改變社會的人，這些人甚麼年齡階層也有。

筆：現在的社運對社會有何影響？

彭：由天星、利東街到現在保衞菜園村，不斷喚醒更多人。但社運還是缺乏連續性，每次事件皆要有地標來維持，如天星鐘樓、利東街、菜園村。這也是社運的困局，只是從保衞地標走出來，沒法轉去以共同信念而走出來。但今次反高鐵有人嘗試突破困局，由保衞地標轉為要改變制度，要廢除不公義的功能組別制度。五區公投也正是這樣，要求廢除功能組別，要求制度改變，而不是純為保衞地標。

筆：政黨可在社運扮演甚麼角色？

彭：社運的核心盡量避免政黨介入，但政黨可在議會內配合，實行內外推進，因不是在搞革命，需要內外進逼。其實政黨應牽頭運動，走在民眾之前，而非等待運動出現才加入。政黨要向社運界釋出善意，少做曝光的事，多在背後以人力物力去支持。

筆：你認為多了年輕人出來是甚麼原因？

彭：很多人不滿足於社會只是顧着經濟發展，認為不應

只是單純追求金錢的價值觀，應轉而追求民主、自由。多了年輕人出來是因價值觀改變，而非沒有工或待遇不好，如我本身有穩定工作，待遇不差。

後記：彭義桄本來就讀博士生第三年，但為了參與社運，甘於放棄博士生旅程。身為社民連新一屆行委的他，認為社民連應去偶像化，雖有不少人是因支持毓民、長毛而加入社民連，但加入後，會使他們由支持偶像轉為對社會民主主義認知和實淺。

葉寶琳

差一個月便成為80後的70後，本土行動成員，反高鐵大聯盟成員。

葉寶琳成長於一個嚴格的家庭，家人着重學業。高中時開始參與學校的公共活動，是自發參與的，是自己敲老師門去要求參與，而非跟大隊的。當時家人認為她應注重學業，所以不大支持。她便問自己為何不可主宰自己的生活方式？參與公共活動、做義工又不是在幹壞事，且又能學到很多知識及獲取滿足感。那時又開始常問身份問題，多讀報和文章，會問為何中英談判中，香港沒份參與？又會到公共圖書館的資料室尋找六四的資料。為了探討自己和中國及中國人身份之間的關係，由選讀生物轉為選讀社工；其實她自己也不是太想讀社工，但沒有其他科目比社工科更能去認識社會

和基層。因緣際會下，讀社工使自己產生了批判思考。

03年，葉寶琳在網上已感受到民間的凝聚力量，那年很多個體出來組織，而不是靠政黨組織。03七一後，她希望有年輕人聲音進入議會、延續年輕力量於公民社會的參與，於是和陳景輝、張錦雄組成七一人民批，參選區議會。對當選與否其實看得不重要，參選主要是為衝擊議會文化，因真的為社區好是應去推動社區的民主規劃，而不是只說甚麼成功爭取、影大頭相、有專業形像和搞蛇宴便叫議會文化。但後來又認為這些議會文化也有其重要性，所以應在固有文化和推動社區的民主規劃作出平衡，因此宣傳時也有以自己的社工背景作宣傳。當然不及陳景輝般堅定，他是完全否定舊有的議會文化。結果葉寶琳雖得到1,200多票，但她理解到議會框架並不適合她，因自己不能完全擺脱議會的固有文化。

04年參與民陣，05、06年為民陣副召集人。她希望民陣成為一個結合民間團體和公民社會的平臺，故在籌備七一遊行時也多作不同嘗試，如05年安排同志團體行頭，希望突顯同志團體也可推動香港民主的訊息。雖然遇到不少宗教團體反對，但過程中引起多人討論和認同，到現在民陣入面已有很多同志團體成員。

在05年WTO世貿事件，她參與了獨立媒體的民間記者隊，做了很多訪問，為自己帶來了震撼。眼光擴闊了，對其他國家的抗爭者認知多了。後來有韓農被起訴，要滯留在港

一兩個月，她因有參與協助而常和韓農接觸和交談，認識到連農民也有很強的論述，認識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她其後到韓國去認識當地的工人組織，學習他們如何透過在網上發表新聞去對抗政府發佈的假消息，那些報導的器材也是工人自己做出來，媒體技術非常高，當地就連農民也一人一部電腦，很專業。她自己當時在想如何學習當地工人的組織力和社運人上的專業，如何運用互聯網等等問題。她那時感受最深的是韓國政府是會資助當地社運組織的，因韓國明白到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政府應主動鼓勵市民去監察政府和主動去向公眾問責。但香港政府不是這樣，不像韓國政府那樣面對市民。這些事件皆培養了她的論述和看法，到06年時便開始參與保衛天星碼頭活動，其後參與本土行動和不斷的保育運動，促成她現在成為前線的社運份子。

後記：葉寶琳在訪問途中因要協助菜園村居民去申請復耕牌照的事而被逼停止訪問，使筆者充份認識到前線社運份子的繁忙和無私付出。他們為了幫助弱勢，義無反顧的付出精神、體力、知識和時間。看見他們和弱勢能打成一片，看到甚麼才叫真正的和諧，非像政府口中的所謂和諧，只是逃避現實，以為不去面對弱勢就等於沒問題發生，像駝鳥一樣，以為把頭塞在泥土裏，人們便看不見牠。

第六章・八十後運動探討

80後／年輕人走上街頭運動的主因

每個人出來的原因也不同，但縱觀各方意見，這班年輕人出來的主因，可約略地歸納為數點。

一、不滿於現狀——80後不怕捱，只怕無希望，望不到曙光。80後正面對着這個困局。所謂窮當益堅，當自己生活困苦、艱難時，出來反抗政府施政紊亂失調的決心更堅定。

二、出於有公義的良心——80後信奉公平、公義應得到伸展。即使你富甲一方，富可敵國，只要你多行不義，欺壓弱小，便不會視你為偶像，反之會鄙視你，因錢和經濟不是「大晒」。這說明80後出來，並不因為潦倒不堪，而是出於良心，與處境無關。也說明為何80後要強調踢走功能組別，因為現有的功能組別制度製造出很多不公平。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80後有顆創造世界歷史的使命感和責任心。

三、沒有聲音能代表他們——自己的思想和意見被政府忽視，只好自找渠道去表達聲音和宣揚思想。傳媒開始歸邊，報紙、大氣電波傳媒統統亦然（由名嘴封咪開始），80後找不到為自己發聲的代表，只好自己為自己發聲。

四、為被欺壓的弱勢發聲——願打破現有的不公平狀況，為勢孤力弱出頭也義無反顧。除了是出於正義的本性，也有人因明白到「他朝君體也相同」的道理而出來。今日別人受壓（如菜園村、古洞北村的居民），他日受壓的隨時是自己，保衛他人也是保衛自己，亦希望社會其他人也明白這道理。

80後關心的是甚麼議題？

不但政制問題，有關民生、社會發展、城市規劃、基建規劃等議題都關心，正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而互聯網的普及，使80後更易掌握社會和世界發展的資訊，認知多了，投入度和關心度也自然多了。

是三分鐘熱度，會曇花一現？還是會不斷繼續？

從種種迹象顯示，八十後運動將會不斷持續，且會像雪球般越滾越大，使社運力量越來越大，將來出現九十後運動、零零後運動也絕不意外。高鐵事件，可能只是八十後運動規模化起來的序幕。

每次的運動，都不停的累積力量和經驗，為日後社運壯大提供了先決條件。

苦行反高鐵

80後的抗爭成本

80後出來參與社運和抗爭的成本，相對上比上幾代的人為低，故此社運中堅份子皆以80年代出生的人為主。

80後較上幾代人少包袱，生活環境相對上較富饒，較少顧忌，養家壓力較少，抗爭的機會成本較低，因此在行動上較易豁出去和更放膽，正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遇上失敗也會繼續默默耕耘。再者，在Facebook上成立群組，找到同伴，便已經可組織抗爭行動，差不多是零成本，也說明了為何大大小小的行動那麼多和頻密。

為何在曾蔭權上臺後，八十後運動才開始成熟和湧現？

這和曾蔭權的態度和處事方式有關。

曾蔭權初上臺時，大眾曾對他有重大厚望，但當一路管治下來，施政多番失誤下，大的期望便變成大失所望，也加重了年輕人對政府的悲憤。加上曾蔭權的輕佻態度和言論，如文革比喻民主論、六四扮代表論、信口開河的承諾會為普選玩鋪勁、常常板起黑面的臉孔等，都使群眾產生一種特首心底裏根本無意聆聽市民聲音的感覺，那麼想發聲的市民不越走越激才怪！

曾蔭權上臺後，給人態度傲慢、自視過高和「寸」的感覺，例如以黑面回應中學生的發問、慳電膽事件只懂怪責傳媒而毫無自省，與董建華那種謙卑、慈祥、朝七晚十一的形

像大大相反。再者，曾蔭權、曾俊華對80後的言論，更加激發八十後運動的壯大。

是否提高回80後一群的收入，便可平息八十後運動？

不少80後是因維護公義而非生活潦倒才走出來，故只提高他們的收入是不夠的。政府要從根本上、從制度上、從政策上改變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才可平息民怨。

80後當中，不少是重原則、重理念，其中有不少核心份子，更是為了能花更多時間投入社運，去爭取公義，而辭去原有的高薪厚職，有股即使乞食，腰骨也要挺直的精神。所以我們常常以高學歷、低收入來解釋他們參與社運，是不公平的。

每次行動，會否出現變數？

每個獨立個體的性格、特性也不同，總有一些是較衝動的、較激進的和愛自我表現的。因眾人立場皆不同，有些人不喜歡一致行動或不甘於聽命於別人，故每次行動，隨時出現變數，不同人以不同方式行動。

而且80後因沒有特定和特派的領袖，故有時遇到極大不滿時，行動的一致性便會出現變數。例如，2010年1月16日，反高鐵集會中，當司領台呼籲集會人士冷靜的、和平的進行感人的萬人大苦行時，有數名激動的示威者便企圖衝入

立法會大樓、有數名青年在立法會後門外，開始推撞鐵馬以發泄不滿，沒跟隨萬人大苦行。由於少數人的發難，結果引致大約百多名示威者，因警方突然封閉原本答應會開放的道路，而去衝擊鐵馬，和警員有推撞行為，而這些行為往往被外界視為過激和有暴力成份，甚至部份堅持用最和平方式表達訴求的示威者，也不認同這些行為，視之為激進。當然也有人會明白這些所謂的激進行為是被政府的惡行所激發，而寄予諒解和同情。

在眾人皆平等、沒有權威和大佬下，紀律難免沒有統一性和一致性。

80後是否受人煽動？

社會上有些人認為現在年輕人走上街頭，是受人煽動。其實，如果我們了解80後根本不用再靠政黨、政團，各政黨和泛民的關係出現分歧，被視為最激進那批和社民連的分裂（相比之下，社民連好像比他們溫和了），沒有大佬文化，不甘聽命於任何人，每人也有自己思考，就知道80後根本不是被煽動，甚至不會被煽動得了，即使有人想煽動他們也不能。

八十後運動是自發性的，不是被人在背後煽動出來的，就連中共眼中的反動派也沒此能耐。正如毛澤東所說：「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

從前，尤其是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的年代，市面訊息的流通量低，人民所吸收的資訊有限，很易被當權者操控。但現在科技發達，人們可從互聯網獲取不同資訊，吸收的途徑比以前多出N倍，所知多了，是難以被煽動，現在任何人還想搞個人崇拜，是沒可能成功的，你看就連社運界中也有反黃毓民的一群就知。

不要說被煽動，就連被利誘也沒有。參加社運，對自己本身的處境和工作根本毫無利益可言，收入絕不可能因參加了社運而增加，反之因少了上班，收入下降的機會更大。又沒有人提供蛇宴、海鮮宴、旅行團、專車接送等等福利，連利誘也沒有，何來威逼煽動？

有人說社民連有去煽動人，如果真的是，社民連辦的示威遊行不會來來去去也只是數百人而已。

80後參與社運的一群，和以往參與社運的一群，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

社運意識形態是由以往的出於反殖民（70年代到80年代頭），到爭取個人權益（80到90年代），到現在的是爭取社會整體權利。

會否演變成暴力和流血事件？

2010年元旦遊行，有人舉起「這是一個警告：我們對狗

官沒有耐性，已準備流血革命」標語，之後在Facebook有人開了個群組，名為「這是一個警告：我們對狗官沒有耐性，已準備流血革命」；加上近期的示威行動多了推鐵馬和衝擊鏡頭，實在會使不少人擔心八十後運動會否演變成流血和暴力事件。

機會當然有，但只要政府不再一意孤行，肯虛心和80後的聲音溝通，不把他們當中較激進的一派逼向死角，八十後運動演變成流血和暴力事件的機會仍很微。正所謂「有頭髮邊個想做痴痢」，如果政府知錯能改，肯改善施政，肯改變不公平的制度，上街的人只會越少。

互聯網的作用

互聯網使人們動員參加社運的成本大減，更易接觸志同道合的人來組織行動及商討對策、交換意見。互聯網的普及，讓人們更易傳達訊息和即時得知社會的情況，是令到八十後運動成長的一大養份。

當大家發現「高登用語」在80後的社運份子中的普及，有人戴着高登小丑面具參與社運，就可知一二，例如CCTVB、民主膠、膠UP等。

第七章・80後的本質和特徵

從眾多訪問、問題探討和以往多次行動，可歸納出80後／參與社運的年輕人有以下一些特點。

政治信仰多元化

由於80後是由眾多獨立個體組成，他們之間根本無可能出現一個劃一的政治信仰。當中有人信奉馬列毛主義、信奉社會主義，有人在開始追尋自己應相信哪些政治主張，有人信奉民主主義，有人信奉具中國特色的社會／資本主義，甚至連無政府主義也有追隨者，不過，很多也是沒有特定的政治信仰。

理念、思維、理想

每人也有不同的意見、理想，可謂思維、理念多元化，但從他們出來的動機，社會多次的探索（足夠嗎？夠深入嗎？），不難發覺當中有些理想和思維，皆存在於他們大部份人心中，當然肯定不是全部。

他們開始抗拒「倒模式」的發展和規劃，不想香港各區到處只是由大同小異、一式一樣的豪宅、商場、建築和基建

所組成。正如學者盧子健所說，他們是在挑戰經濟增長至上、商界主導的發展模式。倒模式、方程式化的城市規劃和發展，加強了80後要爭取自己生活空間的模式。當社會興建大量一式一樣的新建築同時，卻拆毀無數「舊」村落、「舊」建築。例如政府要拆毀尖沙嘴碼頭巴士總站，在海港城旁再建一個商場、拆掉喜帖街，改以婚姻作包裝，內涵和其他商場無甚分別的商場、計劃拆毀整條粉嶺古洞北村，拆掉低密度的鄉村去改建低密度豪宅、又計劃拆毀新界東北的馬屎埔村，石湖新村，天平村，虎地拗村，去興建豪宅和商場。這些村莊和建築，拆毀後便一去不復返，但石屎森林的豪宅和商場即使拆了也可再建。而政府這些計劃，無可避免會被批評為偏袒地產商，因為地產商可從那些將會興建好的豪宅和商場中獲得以億計的利益。偏袒行為實在太過明顯了。

80後關懷弱勢，當發現弱勢被強權欺負，會義無反顧的為他們路見不平，抗爭相助。他們不是為反對而反對，而是不滿社會不公平、利益被既得利益者無理霸着不放。

他們認為個人價值觀不應只是賺錢，而應同時負上社會責任，就像企業賺錢同時要講企業良心一樣。他們有些甚至「視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

他們信奉公義、平等、博愛，重視鄉土情。信奉公平、公義應得到伸展。

他們對由中環價值觀、西環價值觀、地產主義所壟斷

的發展模式抱有懷疑態度，不能再容許地產商主宰城市的發展。石屎森林大晒、高地價、高樓價、發展是硬道理等過往的價值觀已開始被逐步否定。就如保育人士陳景輝於2010年1月在港臺節目《香港家書》所描述，年輕人希望香港回歸城市空間政治（關心城市規劃、土地利用問題）。又如社運前輩伍建榮所敘述，他們當中有人誓要保護一些已經擁有，但即將失去的東西（如簡樸生活、綠林原野）。而文化人林沛理則表示他們是在重塑香港價值。

強調親身體驗，必須親身參與社運和去感受社會的不同事物，才能有效的反思發展和城市空間的問題。

不想香港只是成為另一個大陸化城市，希望人們反思究竟香港只應成為大陸眾多城市中的其中之一，還是保持為一個有獨特性質、獨特性格的大都會？正如林沛理所說，他們要保留香港的獨特文化身份。而不斷的大陸化，譬如傳媒歸邊、警隊有公安化的迹象，都使80後對香港能否保持其固有風格失去了安全感。

沒有約束性

由於八十後運動是由眾多獨立個體、組織所組成，沒有特定話事人、指揮者，故此參與者不用受任何人管束。各人當中，有溫和的，有怕死的，有進取的，有較激進的，紀律很難有統一性和一致性。總有一些較衝動的、較激進的在絕

望時做出衝擊行為也不為奇，如2010年元旦大遊行和1月16日反高鐵集會，就出現了某些人衝擊鐵馬的情況。

沒有大佬文化

有些80後不喜加入任何組織，不喜聽命於所謂大佬的指揮。從前是「蛇無頭不行」，任何運動和行動皆要有大佬及領袖帶領。現在則個個都是蛇頭，而參與人數也隨着不同議題或事件，而有多有少，沒有固定人數。八十後運動中，沒有大佬，沒有權威，沒有話事人，沒有一個人可代表全部人，各自代表自己。他們反對個人崇拜，講求的是人民自覺，對社會實況醒覺。

以前是政黨組織群眾，今天已變成了由個體堆積成群眾。以前行動形成，需要政黨作出呼籲、召集才行，現在根本不用那樣做。

不滿社會固有的發展模式

80後多不滿社會固有的發展模式，希望對現今和將來的社會發展多做探討，尋求最適合香港的未來發展模式。

80後不斷思考香港未來應往哪裏去、應沿甚麼方向走的問題。香港一路以來所走的路向，多只向錢看，忽略其他因素。只要GDP上昇，樓市升，股市升，即使出現資源分配不均、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等不公平現象，也在所不惜。80後

意識到，如果繼續朝着這個金錢為上的方向走，社會將越來越分化，越來越不健康。

以往發展是硬道理，但年輕人現在多思考了綠色生活的可取之處；經濟發展，不等於普羅大眾能安居樂業（只能保證大財團賺個盤滿缽滿），不等於社會文明進步，不等於大家快樂；摩天大廈、屏風樓，不一定比原野郊外和鄉村好；摩登商場不一定比市集皆（繁華高貴但陌生冷漠的購物形式VS較簡陋但親密融洽，人與人之間更密切的購物形式）；GDP增長，不等於國泰民安，不等於普羅大眾也能分享經濟成果；石屎森林（拆毀了也可重新建過）VS青山綠水（破壞了就會永久消失）；經濟發展不等於生活質素提昇；單一發展（經濟）VS多元化，多方位發展；發展VS保育……，這些都是現在多了人思考的問題。

正如2010年1月18日《明報》社評所講，香港經過數十年經濟高速發展，早已進入後物質時代，發展不再是硬道理，社會開始講求尊重土地與人民的感情，因此有些人把內地現今的發展速度，和香港直接作比較，是不公平的。內地是發展中，香港是已發展，發展中地方的發展速度必定比已發展地方的高出多倍，這是正常和應該的。香港在70、80年代已經歷過高速發展時期，現在是時候避免過渡發展而破壞社會平衡，需減慢速度，進入多元化發展的新時代。而內地在千禧年代開始的急速發展，只是香港在70、80年代已經歷過高

速發展時期的追趕和重複，兩地都有經濟急速發展的時候，只是先後問題，兩地處於發展循環的不同階段而已。所以用內地現時的發展速度和香港直接作出比較，是不合理的。

不少市民希望政府會改變重商輕民的思維，改為全方面發展才是核心價值的思維。

希望能感化別人

參與社運的人，都願意將信念傳開，去感化和以道理說服其他人，縱使他們只是社會的一小部份人。他們希望透過不斷的社會運動，去感動別人加入，令小部份人，像雪球般，堆滾成大部份人。運用人民力量，爭取信念和理想。就如毛澤東所講，「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必須感化別人，力量才更大，爭取的手法才更有效。

行動具創意，沒特定形式

每次行動皆有變化，及不時有隨機應變的情況發生。八十後運動帶給社運風氣其中一個大轉變是行動形式、抗爭手法多元化，可無限的加入創意元素。畫漫畫宣傳（如年輕漫畫家Cuson便多次以漫畫形式為社運及社民連宣傳）、舉行快樂抗爭，辦嘉年華，載歌載舞的表達訴求、舉辦音樂會，話劇和戲劇來表達訊息、辦旅行團（到菜園村參觀）、扮鬼扮馬（扮高登小丑、扮死囚）、設計草泥馬身份證等等，手法蘊

含很大創意元素。

其中一次令人難忘的創意活動，是2009年11月15日，禮賓府開放日，近30名網民，包括陳巧文、靈詩、周諾恆、阿豪、阿Wa、楊匡、Rocky等，響應早前Facebook反曾群組號召，各自身穿寫上單字的衣服，組成一句句示威標語。他們在九時許排隊入場後，即躲入廁所，換上標語T恤，然後穿上外套到禮賓府花園區旗下拍照，此時眾人突然脫去外套，拼出「不驗毒」、「當奴下臺」、「反高鐵保菜園」、「摺領匯」等標語，實行軟性示威。其間，警方和工作人員一直在旁監視。網民在花園內到處合照，前往錦鯉池時被拒，眾人其後以「不想阻市民遊園」為由離開。

在隨機應變方面，2010年1月15日晚的「即興」包圍禮賓府可謂代表作。事前沒有計劃，突如其來的一個出奇制勝，令警方初時也一籌莫展。雖然要求與特首對話的一眾包圍人士，最終也被特首請食閉門羹，但即興計劃也能吸引超過2,000人參與，可見即興的威力不可小覷。

有永不放棄的精神

從來社運都需經過漫長且艱辛的道路，從不會一蹴即就。參加社運的人，無論是50後、60後、70後還是80後，不會因失敗而意志頹喪及感到懊喪，相反會相濡以沫、互相安慰，繼續抗爭。人民一次又一次的爭取雙普選，一次又一次

的上街要求政府撤回高鐵方案，正是活生生的例子。他們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遇到挫折也不會放棄。

八十後運動的特性，和毛澤東所形容的群眾運動，正正不謀而合：「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想香港變得更美好

80後願意為社會為未來出一分力和作出貢獻。毛澤東說過，「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雖不是說80後也願意以死相諫，但80後的確有顆為人民利益出發的心，想香港變得更美好，更多人民的利益受保障。兩位80後青年，李祖喬、黃宇軒在2010年1月15日於《明報》發表的文章，說80後有「擺脫過去，走向未來」的慾望，正正反映了80後欲為香港未來的路向和發展提供意見和觀點，期望香港沿着公平、公義、公正的方向走，能照顧及平衡各界利益。

因80後於香港土生土長，有一種「這是我的城市，我要參與它的規劃和決策」的使命，希望能貢獻社會。

第八章・政府的謬誤

高壓手段和不理會[illegible]訴求只會適得其反

唐太宗問魏徵，君主怎樣才算英明、怎樣才算昏庸？魏徵回答，君主所以英明是因為能聽取各方的意見，下情能夠上達，[illegible]。君主所以昏庸是由於偏聽，只聽一方面[illegible]的說話，偏聽偏信，[illegible]。正如秦二世偏聽奸臣趙高之言、隋煬帝偏聽虞世基之言，皆導致亡國。

自天星碼頭事件開始，在多次社運事件中，有人民上街反對政府施政，反對政府的政策，政府往往第一時間不是自我反省，而是認為問題出在出來抗爭的人民身上，好像高鐵事件，政府無論事前事後，[illegible]

只懂責罵他們搞事，對他們的訴求和意見漠視不理，加劇了市民和政府間的不信任和矛盾。但政府卻沒有正面回應示威人士的訴求，認真檢討本身的缺點和不足；不去改善施政，只懂攻擊異見，聽從接近政府立場的聲音，無法認識異見聲音，對政府是百害而無一利的，是昏庸的做法。

宋仁宗時，軍事經濟上無特別成績，但因他納諫言行仁政，得到極高評價的仁宗盛治，當他去世時，萬民以至敵國的遼道宗也為他啕哭數天，京師燒暝強的煙數天不散。有次朝臣進貢了令仁宗動心的美女入宮，但諫官勸他不要親近女色，仁宗便忍痛把美女送出宮。大文豪蘇轍道聽途說，在進士考試的文章中大批仁宗圖美色、不理百姓，考官認為蘇轍無中生有，應處罰。但仁宗認為蘇轍是愛國敢言，不處罰反重用。

隋朝末年，地方豪傑竇建德在河北建立夏朝，勸課農桑、興修水利、造成境內無盜、商旅野宿，政績斐然。但他誤聽讒言處殺勇將王伏寶，朝臣宋正本切言直諫其非反被處死，自此人人為求自保都不敢進諫，竇建德勢力因而走向滅亡。

特區政府現在處理反對聲音、市民諫言的態度，多以高壓手法對待之，如無故對示威者剝光豬搜身、想盡辦法去破壞示威者形像，把他們定性為暴民、有破壞無建設的人，對政府施政毫無幫助。事實上，有些示威者的行為，如拉搶鐵

馬、和警員有碰撞，會被政府和不少群眾視為激進的表現。政府和警方對於那些激進表現，彷彿等同了暴力一樣，如保安局局長李少光一時又說下次會將應付手段升級，警務處長鄧竟成一時又說會慢慢翻看錄影帶，看有無示威人士需要被拘捕等言論可證明。唐代魏徵說過：「自古以來，臣下上書言政，言詞不激切便不能引起人主重視。狂夫之言，在於聖人決擇，君主做的應是納諫而不是向下問罪，令人不敢上言。」現在情況一樣，只是上書改作了遊行示威，而那些衝擊行為又不是以傷害他人人身安全、針對警員肉體為目的，政府不應以這樣又要拉又要打的手法對待。狂夫之舉，在於政府決擇而已。

且高壓只會引來反高壓，以為叫警方加強手段對付示威者便能解決問題，其實是加深矛盾。秦朝和元朝皆以高壓政策管治中原，以高壓手段打壓異見，結果只引來人民更大的反抗和失去民心所向，使國祚只得短短數十年便滅亡。當然政府現在以高壓手段對待示威人士，不會引來政權被推翻，但必定引來的事實，就是民望低迷，施政不順，社會不和諧。所以政府欲要社會和諧穩定，就必先檢討和改善自己對待異見的手法。不應只是高壓，應懷柔為主，也不要只偏聽親近政府立場的聲音，要多聽不同意見，即使是反對和批判聲音也要用心聽，對於反對聲音，應持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冕的虛心態度。即使政府覺得反對聲音中，有些意見不中

肯，也不應因此生惡；因若想了解施政得失，應讓人暢所欲言和自由的遊行示威、表達意見；因批評聲音講得對，有益施政，講錯了，也無損施政。在批評聲中，必定有些意見能起當頭棒喝、醍醐灌頂之效。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政府漠視市民的不滿聲音，施政自然一塌糊塗；反之施政自然暢順，民心自然歸從。政府對諫言的態度直接影響施政的好壞。

政府也不應對參與社運的人士和現在勇躍參與社運的80後／年輕人有偏見，以為他們存心跟政府作對、以為80後／年輕人是因無工做、無前途才走出來。參與社運的人只想香港變得更美好、是為了香港好才站出來；站出來的年輕人只是想參與社會，盡公民責任的去愛護和保護香港，並非無事生非。例如政府把不支持高鐵西九方案的，便定性為不支持香港發展，這種抹黑手法對解決問題有何幫助呢？縱使不認同反西九方案的人的理據，也絕不可以因此說他們不支持香港發展，因為他們是出於關心社會、愛惜香港才出來的。

政府反應跟參與社運的人合作和討論如何改善施政，不要把他們錯誤定性為破壞份子或不聽話。難道在政府眼中，乖乖坐在家中打機、看漫畫，凡事說好、不反對，凡事不問因由便支持政府的，便叫好孩子？便叫生性的年輕人？

有保守派中人甚至定性這班參與社運的80後為「逢政必反」，除了是錯誤定性，不知原來80後是「是其是，非其非」

之外，這種標籤性的做法是在分裂人民，而不是團結人民和解決問題，只會加劇矛盾，是昏庸者的做法。

唐代魏徵說過：「百姓像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治理百姓就像用爛韁繩駕馬拉車一樣，不能輕率。」政府簡單地把社運中人定性為破壞份子，不是過於輕率和欠缺說服力嗎？因為激進不等於暴力，不等於不理性，就如民建聯議員陳克勤所說，不應把年輕人標籤為「激動、不理性」，這是不可接受的；陳克勤也認為，現在沒有好的途徑讓年輕人表達。所以，政府不應消極的對抗80後和社運份子，而是積極的認識他們和深入了解。

政府不了解新一代的年輕人

從近年社運可得知，組成者和參與者的最大群組乃來自十多二十歲到二十多三十歲的青年人（即外界口中的第四代香港人、80後和90後）。參與社運的青年人數量激增，除了是因公民意識加強了，想社會變得更美好外，還因政府根本不了解他們，他們要親自出來讓政府明白他們。

其實政府和不少保守派，對於年輕人／80後都存在不少誤解。例如不少保守人士認為現在出來參加社運的80後，皆是博出位和要着數，但沒想過他們出來背後的思維和原因，以及他們的本質是如何又不知。如果80後要拿着數，可不必參加社運，直接加入建制或建制友好團體，不就着數自然來

嗎（只差在着數的多與少）？就算參加社運讓部份80後出了位，那又如何？出了位對他們根本毫無益處，不會因此而升職加薪、不會因此而多了收入、不會因此而買得起樓、不會因此而脱貧成功，反之隨時會被部份保守人士和政府標籤為搞事份子！譬如程介南發表80後示威者像恐怖份子的言論、鄭耀棠胡亂説80後在元旦的行為令中央震驚之言論等等，政府、當權者、保守派的錯判除了反映了自己的無知、自以為是和不肯去了解80後的心態，也加深了雙方的裂痕和不信任甚至敵視。

政府和部份保守人士強調80後運動的行為只會破壞社會和諧和分化社會，但事實是否如此？政府和保守人士應明白到，是因為政府的偏聽、政策討好和傾向特權階級，造成社會分化；政府故意把80後錯誤定性，才使到他們怨氣急劇大增，令到社會不和諧。並非80後和年輕人參加社運，而造成社會分化和不和諧。政府和保守派不應把80後參與社運，看作成不是理性表現、不是年輕人應做的事。這樣只會導致政府嚴重落後於民意民情。

錯誤認為凡事皆因經濟困難而起

當權者常有種以為凡事皆因經濟而起的思維，人民不滿政府，是受經濟大環境不景所致；80後站出來，是因他們上流的空間收緊了，前景暗淡了。當權者從沒好好認真思考

過，人民不滿政府，未必和經濟之周期好壞有關，反而是政府的管治手法和開明程度才直接誘因；80後站出來，未必因為自己在工作上的進昇不如意，而是他們看到社會出現很多不公義的事情而為了他人討公道站出來。

特區政府常有種思維就是，只要百姓有兩餐溫飽，收入足夠餬口，便不會對社會有訴求，便不會站出來爭取甚麼和抗爭。對於近期多了很多80後參與社運，政府也是用這種落後的思維方向去理解，因此才出現了曾俊華表示80後只是關注物質生活、關注住所會所有多大的言論；以為為80後提供更多工作與娛樂，如打band、跳街舞、唱K等便可使他們不上街，真是貽笑大方。

政府這樣其實是捉錯用神，漠視了80後關注社會的一顆心。可能是受了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影響，政府誤以為所有80後皆面對同樣困境，所以上街的動機和原因也一樣。但每個人總會有分別，怎可一概而論呢？他面對的問題，我未必面對着；我有的煩惱，他也不一定有過。人是有血有肉的生物，除了物質訴求外，必然也有精神上的訴求，但政府像是認為年輕人只有物質上的訴求。政府硬性的把所有80後都當作是同一類人，只會令大家的距離越遠。不要說80後，即使是50後、60後、70後、90後，沒有一個年代的人面對的問題也全部一樣。政府誤解80後皆是高學歷、低收入的人，以為普遍年輕人收入下降促使了80後上街，漠視了上街的年輕

人除了經濟訴求外，也有其他很多不同訴求，如要求參與自己地方的城市規劃、為弱勢路見不平、聲援有需要幫助的基層、不滿環境不斷受破壞、污染不斷惡化等。

政府以為錢是萬能，以為用錢和經濟便可化解80後的怨氣，忽略了80後對環境、保育、環保、居住環境、親情等方面的要求。不理解他們的訴求、上街動機，是百分百沒有可能解決他們的問題、訴求和抒緩80後的不滿情緒的。

後知後覺的政府

還有一點政府是捉錯用神的是，主流傳媒為了方便報導，又見社運中多了很多80年代出生的生力軍，便給了他們「80後」這一個統稱。所以我們不難發覺在高鐵事件發生後，政府加強研究年輕人問題，但忽視了其他年代出生的人和問題，如忽視了中產面對的問題、忽視了30歲以上市民面對的問題。其他年代出生的人也同樣有不滿，走上街的不只是年輕人。而沒有走上街的，不代表沒有不滿。政府應時刻的、全方位的去探討所有階層和年代的人出生的不滿和困境，不要把焦點過份集中於某一個年代的人。

譬如高鐵問題，政府把之約化為世代矛盾，是根本地錯了。因無論反高鐵或撐高鐵的，皆包含了不同世代的人，政府此舉是搞錯實情，激起了社會矛盾、階級矛盾和世代矛盾，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把問題惡化了及加深社會上的不

同矛盾，與溫總唱反調！

而且，不論內地或外國，早在十多年前已開始研究80後問題，香港特區政府現在才認真研究，不但慢了三拍，更是慢了十多年。無可否認，現在多了很多80年代出生的人對社會有訴求而站出來，政府應落力去了解他們，但政府做事應要有前瞻性，不要後知後覺。現在90後已開始陸續出來社會了，開始成年了，但政府還只是在講80後，完全無視90後的一群。難道又要等九十後運動出現大爆發，政府才懂去研究90後問題？而從高鐵集會中，已可看見很多90後開始出來了。可見政府和90後出現了極大隔膜，從校園驗毒計劃一事可知，政府根本完全不理解90後一群的心態和想法。拜託政府要加把勁，多費心思去處理90後的一群吧！不要再後知後覺，只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懂得未雨綢繆。

政府從沒真心去聆聽年輕人心聲

從這幾年開始，年輕人出來抗爭的氣候不斷成熟，高鐵事件只是一個新頁的開端，絕不是一個終結，因政府從不認真的去聆聽年輕人的話語。

早在2007年爆發了保衛皇后碼頭事件後，特區政府已承諾會去關心和聆聽年輕人。但至今（2010年）3年內，政府交出了一份怎樣的成績單？是一份和年輕人越走越遠、思想南轅北轍、多了數十倍的年輕人選擇以上街方式與政府抗爭的

成績單。為何政府越是說要去理解年輕人，出來的年輕人反而有增無減？09七一包圍政府總部的，只有二、三百人，到了2010年初包圍禮賓府的，已是二、三千人！這全因政府得個「講」，不是做事有心無力，而是根本不願去做。

政府在3年前答應會多聽年輕人的聲音，偏偏青年高峰會議，一個政府賴以去聆聽社會不同界別的年輕人聲音的主要途徑，在3年前停辦！根本政府就是講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在高鐵事件出現後，政府又再辦青年高峰會議了，在2010年3月6日復辦，但不要以為今次政府是認真的去聽年輕聲音，其實又是在做騷。

今次復辦的青年高峰會議，大部份的協辦團體也是制服團體，如童軍總會、紅十字會，而不像過去的是由各區的前線青年團體協辦，可見政府只是又一次選擇性偏聽，連聆聽對象也一早挑選過的。而且議題不是讓年輕人自由發揮，讓他們想說甚麼就說甚麼、想表達甚麼就表達甚麼，而是一早設定好了四個議題，去限制他們的發表內容，失去了由青年作主、收集青年真心話和最想表達的訴求的原意。一個良好的諮詢會議，聲音應是由下而上的傳達，而非由上而下，由上面限死了和局限了下面的人群的發言。政府這樣做可能是怕會聽到過於強烈的批評和有爭議性的議題，所以才會去局限議題，但這樣是永遠找不出年輕人問題的癥結的。政府何時才能明白「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道理呢？

再看政府為今次青年高峰會議設定了甚麼議題吧。分別就是「人口結構轉變的挑戰」、「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健康與心理質素」及「多元文化及科技融合」，合共四個。相信單看議題已嚇跑了不少年輕人吧，再者這樣像叫年輕人去考試多於發表意見。試問政府怎能從一個這樣的青年高峰會議，去抓緊年輕人的脈搏呢？

政府若不改變現有對年輕人聲音的態度，不一改故轍，只懂一定之規、一成不變，不要說對年輕人問題判斷得準確，來個毫厘不爽；反之只會不斷出現錯判，使形勢變得更嚴峻。政府不去了解80後的思想和運動成因，只會加深年輕人對政府的怨氣和使制定政策時有所偏頗。

政府高官應和年輕人真正的對話

在高鐵事件發生後，可發現政府開始留意和關注青年人聲音，除了復辦青年高鋒會議（雖則又是做騷，但至少方向正確），請學者如呂大樂去為政府研究80後的一群外，政府開始強調要和年輕人溝通和開始回應年輕人訴求，大方向值得肯定和嘉許，是有點迷途知返了。

在2010年1月14日的特首答問大會上，曾蔭權表示發展之餘，還要顧及其他因素，如保育，但亦說不會只求保育而不發展，開始平衡社會各因素。這種說法似是在說給年輕人聽，政府已聽到他們希望香港能多元化發展，改變單一經

濟發展方向的訴求。特首又首次把深層次問題，由以往定性為經濟問題，轉變到包括社會和民生問題，視野開始擴闊了（但仍不夠闊，如沒有意識到制度問題等等），總算是個好開始。當然，認清問題是不足夠的，還要知道如何去解決問題，否則問題是不會因被認清而自動消失的。

在答問大會上，特首為了顯出政府關注年輕人聲音，表示要改變傳統和年輕人的溝通方式，迎合現今青年人溝通方式的轉變，加強溝通方法和次數。雖然是遲來的改變，但總是好事。可是特首忽略了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除了要改變溝通模式和次數，最重要是改變態度。如果還是保留舊有的敵視態度、做騷心態，即使溝通方法怎樣改變，溝通次數怎樣增加，也只會是流於表面，沒有實質作用，只是假溝通。

而從特首的說話中，已露出了一些馬腳，顯示政府還保持着舊有的態度。因特首強調，大前提是必須是理性，溝通才能進行；表面看來很有道理，實質表明了只要被定性為不理性，那些聲音和意見將不會被聆聽，而何謂理性、不理性，根本是難以判斷；即使某些人真的不理性又如何？難道因此他們的意見便要被政府完全忽略嗎？如果政府濫用不理性這三個字，最後願意去溝通的，也可能只得親政府的一群；而事實上，越是反對，政府越要去聽，不多聽不同的思維，管治只會出現偏頗。即使是反對聲音，官員也應走入群眾，去化解他們的問題，研究他們的不滿出於何處，抒緩他

們的不滿和怨氣，而非一味要對方以甚麼大局為重的藉口，不讓他們發出反對聲音。

例如在當日的答問大會上，陳淑莊和梁國雄議員請求特首出去立法會大樓外，和那6位懇求政府撤回高鐵撥款申請而斷食120小時的青年，花一點時間和他們對話，聆聽他們的聲音。可是得來特首的回應就是，斷然拒絕行多幾步，走出去和這6位青年對話，說自己只在合適的場合和理性下才會對話。啊，高高在上的曾蔭權大人，請問甚麼叫合適的場合呢？難道立法會大樓外是一個不合適的場合？難道一定要在甚麼酒會、講座才叫合適場合？難道斷食120小時，也換不到已到了立法會大樓內的特首，行出去立法會大樓外去和他們對話數分鐘？花數分鐘去聆聽他們的意見？而且特首是假定了那6位青年人是不理性，試問他們怎樣不理性呢？他們又不是喊殺喊打，只是斷食也是不理性？連對話也沒有開始，又怎知他們理性不理性呢？可見特首的心態從沒改變過，恐怕說甚麼溝通，也只是做騷而已。

另一個例子是2010年1月16日，400人，有老有幼的，以苦行方式從立法會外，又跪又哭的苦行至禮賓府，只求換來見特首一面，來個直接對話的願望。可是特首還是無動於衷，沒出來接見那班和平的苦行者。禮賓府被包圍，特首不出來，這可以諒解，但連苦行者苦苦要求下也不肯出來，特首未免太狠心，有點不近人情吧！這絕不是一個領導人應有

的態度。一個真心為國為民的領導人，見到竟有人民以斷食和苦行方式來換取見自己一面，一定會自發性走出來和對方對話，可是曾蔭權偏偏沒有。這又怎叫人們相信，特首真的願意和年輕人溝通呢？鄭汝樺正因多番拒絕和反高鐵停撥款的一群溝通，才搞出大頭佛來，特首好像並沒以此為鑑。政府不改變態度，對年輕人的繼續漠視，只會逼使他們用較激烈的手法去吸引政府注意，甚至有機會因而走向極端，造成社會不穩。

希望一眾高官能明白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道理。

對政府的一些建議

面對這些問題，政府應如何對應呢？政府有甚麼需要反思呢？

一、在發展同時，應停一停，諗一諗資源分配、社會不公義和社會道德等問題，不是盲目追求經濟而忘記其他問題。

二、要認真做好諮詢工作和改善諮詢渠道。從多次諮詢出來的結果都和真正民意有那麼大的落差事，證明政府必須改善有關工作。最重要是改變諮詢的心態，不可馬虎了事。不要再假諮詢，即在諮詢後，也沒可能改變政策或方案的可能。

三、政府不要再偏聽，要明白忠言逆耳利於行之道理。要認清身邊誰是只懂討好政府的奴才或擦鞋仔，誰是願意指出政府施政有何敗筆的正直之士。

四、特首和官員應放下身段，真正走入民眾，感受民情民意。

五、切勿看輕80後的力量，以為他們是個體的、自發性的便影響力不大而加以忽視。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府若不正視他們，不去理解他們，後果難以估計。

六、和年輕人溝通，要改變固有心態，否則和他們的隔膜難以減少。

七、每個世代皆有較激進和激動的一群，政府應去嘗試探討為何他們會較激進和激動，去了解他們背後的思維動機，再設法平息他們的怒氣，而非只是一味責罵和標籤他們，又不做開解，只會徒令他們更走激進，對所有人也沒好處。正如老左派吳康民所講：「80後不是一種偶然現象，是一種時代的特徵，只可疏導，不可強壓，更不應該扣帽子。應該肯定的是青年人關心政治，關心社會的熱情，不應該激化矛盾，促成他們採取過激行動。」

八、政府要徹底改善施政，施政要以民為本，而非大財團為本。當施政謹慎有效，施政得民心，那麼還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出來抗爭嗎？

政府要改變制度的不公義

只要政府不再作出奪取市民利益和權利的事，便不會有人民出來抗爭。就像《六韜》中的記載：「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獨享）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無在，天下歸之」、「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八十後運動成氣候的原因，最大的聲音是他們不滿社會充滿不公義，除了政府政策向大財團傾斜外，制度上的不公義，製造了很多不公義現象。要改變，就要由改變制度上的不公義做起。而現有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成為了80後誓要改變的對象。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一切皆源自制度上的不公。

現有的功能組別制度和組成，不但不能促進社會的均衡參與，反而使議會出現不平衡的情況，很多順應民意的方案，也因功能組別的反對而被否決。由於立法會是採用分組投票，由全民選出的直選議員的權力和由小圈子選出的功能組別代表均等，很多普遍得到市民支持的議案如勞工要求有集體談判權、最高工時、僱主無理結業拖欠員工薪金列為刑事化、平反六四、否決九巴加價9%的申請和藍領要求和白領看齊，每年有17日法定假期等等，即使在多數直選議員支持下，也因被過半數功能組別議員反對而不獲通過。功能組別的存在就是維護少數既得利益者利益來剝削多數人利益。這

也說明為何民主派在選票上是多數，但在議會內反成為了少數。以高鐵撥款方案為例，反對撥款的直選議員合共得到的直選票數約70萬，而支持的直選議員合共得到的直選票數約46萬，但最後撥款是獲通過的。

而功能組別本身也貧富懸殊嚴重。功能組別只得20萬多選民，單是教育界就7萬多名選民選一代表，醫學界和社福界又是數萬人選一代表，但大部份界別只得數十和數百位選民就可選一代表，非常不公平，代表非常不廣泛。有集團更因有團體票的關係而握有幾十票，如某超級富豪所握有的票數，有人估計過達50票以上。即使在功能組別，每一張選票的份量也有大有小，極不公平和不均衡。

設立功能組別的原意是讓政府能多聽專業人士的聲音，但每年的立法會議員工作評估報告，做得最差的、出席率最低的、發言最少的、動議最少的，絕大部份是功能組別的議員包辦，因他們不用面對普羅大眾，只需向界別選民表態便可。但那些議員還是年復一年的如此，可見他們自恃有不公義的制度保障下，知道人們「吹他唔漲」便任意妄為，彷彿對外界的批評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使功能組別變成造成了政府的偏聽和剝奪了普羅大眾的話語權，與其設立原意背道而馳。

功能組別只是在分化社會，分化群眾，令基層敵視專業界和工商界。功能組別的存在，對任何一方也不利（除了既

得利益者要利用其來維護和霸着既得利益不放，甚至去搶奪更多利益）。立法會工程界議員何鍾泰，在諮詢業界關於政改方案的問卷中批評，政府於政改方案中，新增的5席功能組別議席，由直選區議員互選產生，把百多名委任區議員排除在外，這樣是剝削委任區議員的權利，變相把他們貶為「二等區議員」，極不公平。何鍾泰又指，委任區議員也設有地區辦事處，也是每天辛勞的為市民服務，政府怎可剝削他們的權利，令他們淪為「二等區議員」？

請問何鍾泰和所有為委任區議員抱不平的政客，每天香港皆有百萬計的市民，刻苦耐勞的工作和貢獻社會，但他們絕大部份人，在立法會選舉中只得地區直選的一票，並沒有票選功能組別之議員，請問那些市民是否在政府和不公平的制度下，被淪為「二等市民」、「二等香港人」？某些集團，因涉及的業務伸展到各行各業，如零售、物流、電訊、工商業、製造業，便可透過團體票，獲得數以十計的票數，明顯違背人人有同等票數的原則。

為何既得利益者和政客，可為委任區議員爭取權利，卻無視和繼續容許政府剝削普羅大眾的基本權利、欺負「二等市民」？

那些直選區議員，要在選舉中出錢出力、勞心勞力的去爭取選民認同、爭取選民選票，才能當選為區議員，但為何有一班人，安坐在家中，不用面對選民，等特首一個電話通

知，便可成為區議員？那麼哪些議員才是真正的「二等區議員」？不就是直選區議員們麼？

由此可見，功能組別的存在是直接把一班市民標籤成「二等市民」、「二等香港人」，和剝奪了很多人應有的平等權，製造了一班人比另一班人平等的不公義情況。

當人們出來爭取改變不公義的情況，便被一班既得利益者指責他們是在破壞社會的穩定和諧，這樣公平嗎？

現在，越來越多人看清了這種不公義的情況的影響，政府再不改變之，將後患無窮。

第九章・四代香港人PK80後

自從學者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出版後，政府和社會很多學者、傳媒都以當中所述的理論作為基礎，來研究現在80後問題。

首先，呂大樂在接受《讀書好》雜誌訪問時指出，他寫《四代香港人》的原意，是向他父母那代致敬（即第一代香港人），希望勾起第二代人對自己和父母那代的反思。可見，《四代香港人》的創作原意不是用來作為研究第四代人和80後的基礎，但包括政府在內，不少研究者皆以《四代香港人》內的理論作為研究80後的準則，是捉錯用神，會使那些研究出現先天性的不足。

事實上，如果以《四代香港人》內的理論作為研究80後的準則或基礎，是會出現不少局限的。

《四代香港人》的一些局限

一、書中提到：「第四代人在富裕的社會環境裏長大，這是事實，但這不等於說他們比任何一代都要幸福。」「第四代人有他們那一代人的煩惱。而他們可能比我們更清楚知道（同時也是最有感受），金錢、物質都不足以保證幸福、快

樂。」

——這是事實，在大部份新一代眼中，金錢、物質的確和幸福沒有必然性。但某些人因此就下定論，以為80後出來參與社運是感受不到幸福快樂所致。80後因受過多年的教育，學識水平平均比前兩代人高，亦從互聯網世界上吸收了很多在大眾傳媒和學校中吸收不到的知識。因知識多了，使命感和責任感也大了，所以願意挺身而出為社會做點事，願意出來向不公義抗爭，這和幸福快樂與否沒有必然關係。

二、書中提到：「由於家庭生育觀念的變化，平均每一個家庭的子女數目下降，形成每一名小孩由幾位成人照顧的狀況。第四代人永遠都是照顧對象，也是社會上的少數。」

——這忽視了，在出生率不斷下降下，第四代知道自己將來要一個人照顧數名長輩，壓力和責任很大；也使第四代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大了，因為從小就知道自己這一代，將來支撐社會的難度將會比上一代高。

三、書中提到：「是這一些家長願意放下事業，全職照顧孩子，每天接送，這一刻送孩子學習游泳，那一刻上小提琴課。但也是他們以多元化發展之名，令孩子們學會了各種各樣之後，卻少了一種發自內心，自我追求的熱情。」

——相信大部份中產或以上背景出生的80後，看了這段，一定感同身受。但是否真的因此少了一種發自內心，自我追求的熱情？這就值得商榷。因為其實一種發自內心的熱

情，一直存在心裏，只是被壓抑住了。當長大了，可自由地或相對小時候有較大自由空間去釋放那股熱情時，就會爆發出來。而一些年輕人選擇把那股熱情爆發在社運內，希望用熱情去推動香港變得更美好。同時，上引的說法也忽視了，第四代港人中，也有一班是成長於貧窮背景下，他們的父母根本沒多餘錢去讓他們參加興趣班，或為了餬口，沒有時間和精神去為子女編排課外活動。而這群父母為了餬口而沒時間管束自己的80後，因平常生活難以依賴父母，獨處時間較多，生活空間較大，相對上較早熟和較獨立，思想亦可能因此較為獨立，甚至一些人會比較反叛。這些人當中，不少會願意參與街頭抗爭。

四、書中提到：「我們信任年輕一代嗎？我們相信他們在離開了成年人的監督後還會要求自我提升嗎？現在，成年人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反映出一份不信任。」

——說成年人不信任第四代，其實第四代也未必信任成年人。所以在研究80後時，除了從成年人不信任第四代人的角度出發，也不要忘記從第四代人不信任成年人世界的角度。

80後活躍於社運，很大程度上是因年輕人不信任成年人世界，多於成年人不信任第四代人。不少參與社運的80後都是不信任中環價值觀、不信任向大財團傾倒的經濟主義、不信任第二代人把關及多次誠信破產的政府及不信任由第二代

人操控的特權階級。

五、書中提到：「第四代人要滿足別人對他們的期望。他們要面向世界、面向大中華、要兩文三語、要有提高進入名牌大學機會的社會服務參與、要懂餐桌禮儀（幫助日後見工面試）、要懂bluffing、要很多很多。一切都是為了應付現實的需要和成年人的要求。當然，可以想像，成年人卻總嫌他們不夠成熟，而且天天投訴。」

——成年人固然對年輕人諸多要求，但在研究80後時，也不可忽略年輕人對社會、對價值觀都有要求。因自己有要求才會站出街頭來，別人對他們有要求、有投訴，是不會直接逼令他們走出來的，始終年輕人會明白上一代對下一代有要求是正常的。

六、書中提到：「對於他們的未來，周邊的成年人有很多意見，也有很多想法、建議。事實上，周邊的成年人可能較第四代人本身更有意見和有更多想法、建議。在第四代人表達自己想法之前，周邊的成年人已經結束討論。」

——這的確會使部份80後感到沮喪，對上一代產生隔膜，於是便出來發聲，以免自己的聲音被人掩蓋。但80後出來還有是為社會爭取公義、路見不平的目的。而當參與社運時，有成年人和上兩代人參與和支持，那種沮喪和隔膜便會開始溶化。

總結，如若只用《四代香港人》內的理論作為研究80後

的準則，是會有局限性的，況且呂大樂從沒表示過此書要成為準則。因單靠《四代香港人》內的理論作為基礎，便會有第四代香港人是因面對高學歷、低收入的處境，向上流動機會十分缺乏，不滿在工作和報酬上的待遇才出來參與社運的錯覺；以及產生80後只是為自己的錯覺，但實際上，80後的宗旨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正如陳景輝所說：「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同樣『捉錯用神』，認為書中提及新一代的不滿和示威源自他們要上位、增加薪酬和改善工作待遇是誤導。」「『80後』關注城市的命運和香港的未來，他們走出來是因為『見到香港真正重要的地方』。」80後是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不可只以經濟和就業情況去妄判他們的動機，以為他們只關心上位和就業狀況。如果真的只是關心那些問題，就根本不會出現那麼多圍繞不同議題的抗爭行動。80後不但是為自己，也是為社會，為別人。有些參與社運的年輕人如陳景輝、朱凱迪等，是自願做多份兼職，辭去正職以騰出多些時間參與社運。所以不少年輕人根本不多關心上不上位，反而關心社會是否得到公義保障更多。

呂大樂的欠缺機會論，不能概括80後出現的原因。只要是大是大非問題，人民自然會出來，不管自己的經濟狀況是好是差，不管當時社會是否繁華，例如89六四時，香港出現的社運就是好例子。生活環境遭遇與是否參加社運，沒有必然關係。

年輕人出來社運，不只是因為對社會有不滿、對上一代有隔膜、對自己遭遇不高興，也有是因為對社會有要求，自己有思想、有信仰、有價值觀，希望改變社會走錯方向的核心價值，希望自己的出來會令社會和大眾重新思考香港應如何走下去、未來的路如何走等問題，是出於一顆愛香港、愛國愛民的熱誠之心。80後出現，並非只因遇到經濟不景、政治不公、或出於反叛心理；也有很多是出於80後本身的純真、堅毅和熱誠，要為弱者和被欺壓者（不管相識不相識）伸張正義，要為社會建立公平的秩序。就好像公共事務顧問盧子健所形容：「80後出現並非針對自身狀況的不滿，而是不滿社會不平等。」

政府託呂大樂研究80後？

在80後問題被炒的熱烘烘的近期，政府為了多認識80後，委託對80後有認識、研究80後問題有權威性的學者呂大樂對80後議題進行深入研究，包括80後年輕人特質、他們面對的問題和想法等，期望找出問題的根源，尋求具體解決方法。同一時間，有聲音出現，希望呂大樂不要變成第二個劉兆佳，而Facebook也有此群組出現。

當政府要委託呂大樂研究80後的消息傳出後，從呂大樂在公開場合的言論和文章看，的確有點令人擔憂。但實情是政府的確曾找過呂大樂，但並未得到回應。呂大樂也表示

過沒有受到有關邀請。大家不應用猜度之心去幻化出一些不是事實的指控。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呂大樂會成為第二個劉兆佳，也不要說甚麼呂大樂會變質，成為政府打手或被政府收賣等，這些幻想既不負責任，也毫無根據可言。

話說回來，如果只是託呂教授去作研究，也不能化解政府對年輕人的誤解，因呂大樂其實也把自己的想法局限於建制的框框。

2010年1月9日，呂大樂出席新城電台節目指出，社運忌「潔癖」須與建制談判；自古的政治運動難免與建制談判，「過份政治潔癖不是長遠方法，某程度要建立互信」。呂大樂這種說法，是忽略了80後意識到當權者和特權階級根本無心聆聽他們的聲音，所謂談判只是門面工夫和做騷；80後是因認清妥協是無甚效用才會上街。例如主流民主派由過往到現在也沿用妥協及與建制談判的方法，但根本無甚效用，最有效反而是03七一大遊行，該遊行是沒有跟建制談判和沒有妥協的餘地。那次遊行，成功使開明的田北俊轉向，也促成董建華腳痛落台。自此，80後感覺到最有效的反而是人民力量，希望再次藉運動引發強大的人民力量而使當權者和建制中人醒覺或反省。

呂大樂：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

2010年1月，呂大樂於《信報》刊登文章，題為《衝擊立

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很大迴響，討論呂教授對1月16日有份參與反高鐵停撥款集會和包圍立法會的示威者之指責，是否正確呢？筆者沒資格批評或否定呂教授於文章中的言論，也不是要為當天的示威者辯護，但文章中某些觀點，是值得大家拿出來討論的。在此希望讀者不要因為筆者對文章內容有些地方提出質疑，便認為筆者認同呂教授口中的衝擊行為。

呂：如果「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也不算是衝擊立法會，而整個過程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和平的抗爭，那我相信我們已經改變了一貫對社會秩序的定義與理解。

呂教授所指的圍堵行動，乃當天的包圍立法會行動。包圍立法會，即萬人在立法會外繞成圈子，把立法會包圍。那次行動，其實只是在政治上衝擊立法會，寓意衝擊立法會內的不民主制度，而非physical上要衝擊立法會內任何的人和物，那怎會是超出了和平的抗爭範圍？難道在一個自由經濟體系社會中，包容不了這些從沒超出和平的抗爭範圍的手法？

呂：假如今天我們可以接受以真民主之名，來衝擊被視為不代表民意的立法議會，他朝到另一種主張的群眾舞動他們的政治旗幟，來圍堵一個由民主派（或自己所支持的政黨）取得多數的議會時，我們便無話可說。

示威者衝擊的不是立法議會。事實是，群眾從來沒有

破壞立法議會內的規條和程序。他們衝擊的，是不公義和扭曲民意的制度，衝擊的是一隻無形之手，一隻破壞公義之魔爪，而非實體的、有形的立法會，如立法會建築物和會議的進行。

呂：讀者可以批評我這一類人對議會政治抱着一份愚忠，竟然可以接受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度底下，玩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在批評者眼中的愚忠，我視之為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

示威者從來也沒有否定過議會的規範和秩序。如果真是否定議會的規範和秩序，何需多次在立法會大樓外，坐下聆聽和從大螢幕觀看議會內的開會實況、議員和官員的對答？由此可見，他們根本是百分百肯定了議會的規範和程序。他們要求對話、要求撤回方案，並非強制性要推翻結果，只是不滿現時議會的畸形制度。那何來破壞民主的規範和倫理？

呂：如果「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也不算是衝擊立法會，而整個過程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和平的抗爭，那我相信我們已經改變了一貫對社會秩序的定義與理解。

無可否認，因包圍立法會導致電車路封路，要行經電車路的車輛被逼改道，的確給司機和乘客們增添了麻煩，和破壞了行車路的秩序。但為何當天的群眾要走出或霸佔馬路呢？是否因為警方突然封路，示威人士不能沿着行人路作萬人苦行，才被逼走出電車路呢？而警方為何突然封鎖了原本

答應開放給示威者的道路呢？是否發現有部份示威者不守秩序，有機會對立法會大樓內的人士的安全構成威脅，而重重鐵馬也未必阻擋得了，所以要封路？但警方由始至終沒好好交代原因。在未清楚事件真相前，不宜把破壞了秩序的責任全推向示威者。

其次，當天包圍立法會的行為，究竟衝擊了立法會的甚麼呢？衝擊了立法會的制度？衝擊了立法會的「公正」？衝擊了立法會的「平等」？衝擊了立法會的「威信」？包圍是否等於衝擊？若果當天最後的包圍立法會模式，是原定的萬人大苦行，這又是否衝擊呢？在沒弄清立法會被包圍，是被衝擊了甚麼的時候，指責圍堵行動是衝擊立法會，未免有點流於口號化。認不認同圍堵行為是一回事，圍堵是否等於衝擊立法會又是另一回事，不宜混為一談。

呂：就算特區政府如何令人討厭，我們也不可以因此放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

目前最大的問題，正是議會沒有真真正正的議會民主，更不用說真正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吧。現時的議會還處於假借民主之名和軀殼，而實質是假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才會招來那麼大的反抗聲音。

呂：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相信這段說話不會引來大爭議，的確規範與秩序是可保障到大家，應給予維持和尊重。但當天示威者們的行為是否如呂教授所說，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如果示威者的目的真是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他們當天不會手挽手，唱着歌，躺臥在地上，和平地等候警察們抬走吧？如果單憑少部份示威者出現搶鐵馬的行為，及那十多分鐘的警民衝突片段，就說示威者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是否有點以偏概全？而事情又是否已達到暴動那種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的情況呢？

呂：我也聽到一種意見，表示圍堵立法會的行動，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是快樂及和平的抗爭，只有少部份人會較為衝動，嘗試一些較多衝撞的動作。而電子新聞所看見的鏡頭，是傳媒的誇大與扭曲，並不反映整個行動的全貌。持這種看法的參與者視整個過程只是個人表達情緒與意見的過程，因此也不怎在意社會大眾對事件的回應。但現實是，社會大眾不會區分那百分之九十八與另外的百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就算整個行動自稱不以嚴謹組織為特色，大眾也不會因此而覺得那百分之二的額外動作或部份人士一時衝動的舉動，與大會無關。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況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呂教授要譴責的，應是部份傳媒們新聞娛樂化的報導手法，而非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大會。現在的社運模式，根本就是組織鬆散、沒特定領導人、所有參與者皆人人平等、沒人可特別的有話事權。他們不是政黨，沒有大佬文化，大會根本無權也無法限制任何個體的參與行為和要求所有個體聽聽話話。聽不聽從大會指示，全是出於個體的自發性。大會是根本無資格和阻止不了那百分之二的行為或少部份示威者的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但說大會阻止不了便等於認同了那些行為，未免有冤枉別人的味道吧。那些行為與大會有關連嗎？大會叫過人們那樣做嗎？大會的出現不是要號令群眾，而只是提供資訊給志同道合的人士和參與集會／嘉年華的與會者，和一個開放平臺讓他們發聲。大會根本不會強逼自發性參與者去做任何事。

呂：參與者會問：既然如此，那為甚麼社會輿論（有明顯政治立場的除外）並沒有紛紛出言譴責？現在我們所見到的「輿論真空期」，不是因為廣大市民一致支持圍堵立法會的行動，而是特區政府民望低落，暫時沒有社會力量會願意站在它的一方。特區政府的政治孤立狀態，令輿論未有必要表態。但這並不等於它們對行動沒有看法。它們知道特區政府持續弱勢，反對行動一定會走向升級，只要爆發暴力衝突，便可改變輿論的導向，界定行動為非理性的反社會破壞行為。

首先，這是假定了反對行動一定會走向升級。當然，絕不可以排除這個可能性和機會。但如果反對行動升級，導致原因不應是特區政府持續弱勢，而是特區政府持續冥頑不靈，言而無信，不願和異見聲音溝通（只是口惠而不實，3年前已說會聆聽，但原來得把口講）。其次，輿論是否真的無表態？沒站在政府一方？看那些選擇性報導的主流傳媒，已可知道答案，更有傳媒加入醜化示威者（有雜誌以偷拍陳巧文日常生活的走光／性感照作封面故事）的行列，以增加大眾對他們的反感。

呂：或者參與者會追問：那為甚麼社會輿論都讚美所謂「80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呢？我想那恐怕只反映出近年香港人都變得偽善了。

這種說法是否定了示威者背後的理想和熱誠，只會和他們越走越遠。這是只見過火行為，而不見其背後理念。這種說法就等於不可以「不認同過火行為，但認同其背後理念」，這是甚麼邏輯？始終行為和背後理念是兩回事，應予分開看。就如不認同政府於高鐵方案的諮詢手法，不等於不認同其高鐵方案。同樣邏輯，難道不認同政府於高鐵方案的諮詢手法的人，贊同高鐵方案的內容是偽善嗎？

呂：最後，問題是：不再採取和平行動又如何？作為一種選擇，這當然只有參與者才能決定。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假設了主辦／協辦單位不會採

取和平行動來抗爭。就等於有人問：呂大樂成為了政府打手又如何？這種假設性問題，意義不大。去評論一件事，應以客觀事實去作討論，而非先把某些人和事假定為一些負面的人和事，然後再去做討論，否則意義不大。

呂：經過圍堵立法會之後，特區政府及警方均很難繼續以同樣方式來維持秩序。他們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持另一種意見的市民會認為市中心秩序失控而警員未能有效執法，需要交代；二是警隊內部也必然有意見認為長期如此下去，前線警員將難以判斷如何執法。

政府和警方難繼續以同樣方式來維持秩序，就等於警方要把行動升級。警方要把行動升級，就代表警方之前的方法無效。但事實是否如此？呂教授的說法對警方難免有欠公允。2010年1月16日那天的確是出現過警民衝突，但最後警方也能成功控制場面，而且過程並不算太艱難。在出動了警棍和胡椒噴霧之後，警方迅速控制了場面，拉鐵馬的行為再沒發生。之後群眾只是在地上坐下，最後更是和平散去。而不少議員和官員，如陳家強、葉劉淑儀、謝偉俊等，也可一早順利的離開；即使鄭汝樺最後也能安然離開，警方根本是把場面控制得很妥當，看不到警方有着未能有效執法的地方。況且，香港警察訓練有素，而前線警員是執行上級命令的，怎會難以判斷如何執法？看來是呂教授太低估香港警員的質素和執行命令的效率了。同樣地，呂教授的說法對示威

者也有欠公允。他根本是把警民衝突的所有責任推給那班示威者。以呂教授對社運的研究、學識之淵博，根本不可能不知道前線示威者和警員欠缺互信的原因。其實到了今天的局面，雙方也有責任，只是指責單方面，不但不公平，且是把問題過於簡單化。

呂：兩種壓力均會促使有關當局要向參與行動的群眾發出信息（例如事後發出告票），使他們知道日後若然公然移動鐵碼、衝擊現場都不可能是全無風險的行動。

只可說句，此言差矣。難道現在移動鐵馬是全無風險的行動？最低限度，移動鐵馬的人要面對被噴胡椒噴霧的風險、被警員用警棍打的風險、甚至事後或當時被警察拘捕的風險。怎可張着眼睛說瞎話，說成全無風險的呢？

誠然呂大樂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學者，但從他的文章和言論，不難發覺其實他還是用第二代人的思維去看第四代、往往用建制的框框去限死了第四代。結果，出來的言論和第四代人所想的有偏差和距離，現再以呂教授於《讀書好》雜誌訪問中的一些言論舉例。

呂：在主流位置的反對力量（反高鐵那班，如何芝君、陳景輝），是否可以在建制之下，夠膽和建制派開火？但是現在我看不到很多。要進入當中，用可以和他們對話的方式去對抗。

為何一定要從政入建制才可對話？為何要如此局限？建

制已有權力，為何不開放權力向外對話？而事實上，也不是一定要入建制才能和建制對話，甚至開火；只是視乎建制內的人願不願意聆聽建制外的聲音及和建制外的人對話，而這正正是呂教授口中在主流位置的反對力量所爭取的。他們只是想表達意見，聲音被聽到，就這麼簡單，而非要開火，要入建制。

為何還要用建制的框框限制第四代呢？第四代正是不信任現在的建制框框，因內裏實在有太多不公義的地方和太污穢。

呂：應該多給年輕人機會，如果我是領導公民黨的，面對一個這樣的政制，就無謂戀棧，就給一些比陳淑莊還年輕的人去試試，看看有甚麼改變。如果公民黨願意走這一步，我認為會有新的生命。

同樣應給不願走入建制的年輕人機會，因為在建制外，也可以有新的生命力的。

呂：第三、第四代根本沒有一個身份，沒有一套獨立想法。

其實，只要多接觸他們，就不難發現他們很有獨立思考，且每個人的思考也不同。如果他們沒有獨立思考，就不會那麼多人出來撐／反高鐵，且每每能長篇大論地支持自己的見解。

2010年2月8日，呂大樂於《明報》的文章《我的「昔日情

懷」》中有幾個觀點，如不回應，是不吐不快。

呂：假如當晚發生的是由親中和建制派搞出來一模一樣的行動，來衝擊一個以泛民為大多數的議會，我可以接受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呂大樂這個觀點的出發點和根本道理是錯得很緊要、根本是以一個似是而非的假設，來抹黑2010年1月16日晚發生的事情。

那天立法會被包圍，不是因為哪個派別佔據議席的多數，不管是泛民還是建制派是多數，而是因為立法會制度的不公義，令到民意和選票的大多數，在議會內反而成為少數，但佔民意極少數的特權階級卻成為議會內的大多數。現在的立法會制度就是一個這樣的扭曲民意去維護特權階級利益及剝削普羅大眾利益的制度，所以立法會才會被包圍、才會被「衝擊」。是高鐵撥款事件，引發市民認清現在制度的醜惡面目，令他們選擇以包圍和「衝擊」立法會的不義，來突顯制度的邪惡；此與哪個派別是多數沒有關係。如果制度是完善和公義的，選民的票數取向及民意在立法會議席中能真實反映出來（如取消功能組別，只保留一人一票的直選），不管哪個派別被選為多數，不論是泛民或是親中派，只要是真實反映、是公義的，沒有人會包圍和衝擊它。所以那天的行為，是衝着顛倒真實的不公義制度，和哪個派是多數無關。呂教授的比喻和假設，完全不合理。

呂：但行動的組織者會為行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大小事情，負上全責。因為要負上全責，如何保證行動能有秩序地進行，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對於沒有跟從早前集體決定而鹵莽行動的，會劃清界線。有人批評我這類想法是列寧主義思想，不合時宜，更有打壓個別參與者的個人自發之嫌。年輕朋友對組織化的行動甚為抗拒，作為他們的選擇，我無話可說。我想指出的問題是：在動員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怎樣從推展運動的角度來估計社會大眾對整個社會運動的一舉一動的看法。

現在根本沒有人是因個人喜好而動員社會運動，即使是呂大樂所不認同的推鐵馬、衝入立法會行為，也不是出於示威者的個人喜好，而是出於背後的理念。看看金鷹和陳巧文如何為當天有份企圖衝入立法會大樓的行為解釋、看看羅健熙、阿禮、李世鴻、曾健超等人是怎去解說推鐵馬的行為為何發生，就知道那些行為不是參與者的一時魯莽行為，而是經過深思熟慮，背後有份理念和思想去支持。一來呂大樂是假定了那些自己接受不了的行為是魯莽行為，不了解和忽視了那些行為出現的原因是來自反壓逼和反無理打壓；二來是假定了那些行為是出於個人喜好或一時衝動，而不了解和忽視了行動背後的理念和思維。正是那些理念推動他們這樣做，希望藉此啟發其他大眾，根本不是出於個人喜好。儘管不認同那些行為，也不應為那些行為設下不是事實的假定。

呂：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自己的主觀感受或提出的解釋，而是大部份市民如何看待種種行動和動作。

所以我們更應幫助他們澄清事實，而非落井下石或強加罪名。

呂：如果組織者堅信需要統一行動的形式與步伐，清楚界定整個運動的性質，不怕犯上「政治不正確」的罪名，敢與企圖騎劫運動的部份參與者劃清界線，那就算在行動的過程中發生了阻止不了的衝擊行動，運動也不因此而被轉移焦點。

參與者都是自發的，只因對議題的認同而集合，但仍屬不同個體。他們本是獨立個體，又何須劃清界線呢？根本是無界線可劃，因他們不是屬於同一組織／團體／政黨。是外界和主流傳媒把所有焦點放在那些推鐵馬和警民衝突的鏡頭，行動者是不能選擇的、是被逼成為焦點。但現在竟說他們企圖騎劫運動，則是天大的抹黑。

呂：說搬開鐵碼不是挑戰警權，而是因為它們阻礙群眾的行動，那是強辯。說當時的衝擊行動沒有任何意圖，純粹表達情緒，別無其他，我也覺得難以接受。

呂大樂應親身和有份進行衝擊的人士交談，就會知道他們拉鐵馬的原因，不是純為表達情緒或因為鐵馬阻礙了他們，而是對警方無理違反承諾、用鐵馬和強權去限制他們的

基本公民權利的行為，而作出反抗。

呂：在我看來，這些說話都是講大了：認為這是一個令人覺得絕望的制度，所以只有徹底否定才有希望，這些講話的策略含義只可能是以不同的形式來否定現存有限度的議會民主。我認為這條路線是危險的。

根本沒人徹底否定制度，如果真是徹底否定制度，包括企圖衝入立法會的十多位人士和曾推鐵馬的過百位人士，會連日在立法會大樓外，坐下聆聽和從大螢幕觀看議會內的開會實況、議員和官員的對答？由此可見，他們根本是百分百肯定了議會的規範和程序。

80後label

用第二代人的思維去看新一代，用建制的框框去限死新一代，只會對認識新一代產生局限。其實80後這個標籤，本身也有很多局限和不妥之處。因為請記着，80後要帶出的討論／問題，不是世代、年齡或階級問題，而是所有人也會面對的公義問題，是判斷是非黑白的問題，是反省仁義道德的問題；把焦點放在「80後」一詞表面的數字，把問題看成世代問題般討論，是大錯特錯的。

80後和每個年代的人一樣，有眾多不同聲音，用一個80後標籤去概括所有不同的80年代出生的人，並不公平，且容易引起社會對80年代出生的人出現誤解和把他們和其他年代

的人對立起來。例如傳媒廣泛用80後去指稱反高鐵的一群，給一些人的印象是，只要是80年代出生的人便反高鐵、反高鐵的人中，只有80年代出生的人。但其實很多80年代出生的人是支持政府的高鐵方案，而反對政府高鐵方案的人群中，也有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所以有報章廣告這樣寫道：「高鐵是為50後，60後，70後還是80後而建？」可見，80後這個標籤的確使人對80年代出生的人帶來不必要的誤會。

傳媒以80後一詞去標籤參與社運的年輕人，會使那些不參與社運的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和並非80年代出生的社運參與者，感到聲音被80後騎劫了，便容易對那班80後產生敵視感，但偏偏80後也是被動地、無奈地被傳媒授予這個標籤。

而簡單一個80後標籤，是不能概括當中所有人的特性。80後也有其他年代的人，有激情的，有溫和的；有行動派，有默默支持派、有智謀派；有衝的，有看的；有中產，有基層，總之就是包羅萬有。所以用「80後」去標籤和概括一班出來參與社運的年輕人，會出現不少局限，便是過於簡單地把很多不同特性、持有不同價值觀、不同想法的人歸納為同一種人。

當研究「80後」這標籤時，不要忘記其背後所帶出的社會公義問題，不要把問題視作其中一代香港人面對的問題或簡化為世代問題。

第十章・我們的80後

八十後運動帶來的貢獻、正面影響和推動

政府開始意識到要重視年輕人聲音

其實早在皇后碼頭事件，政府已表明會聆聽青年人的聲音，但實質效果強差人意，與政府一貫「講一套，做一套」的辦事方式有關。但高鐵事件出現，政府痛定思痛，有決心聆聽年輕人意見的迹象。青年高峰會議重辦、特首在答問大會高調宣佈會改善與青年人溝通的方法、考慮成立網上聽證會、找學者如呂大樂來研究80後的看法等例子皆是好的證明。甚至乎有政府部門，如運輸及房屋局，有意在Facebook設立戶口，及舉辦網上論壇，方便和網民溝通。不過還是那句，千改萬改，如若態度照舊，也只會是口惠而實不至。

但願政府汲取教訓，真心真意履行聆聽青年人聲音的承諾。

成功爭取

80後的出現和熱情，使社會一改年輕人對時事、對政治冷感、只懂吃喝玩樂的印象，知道他們是會認真討論時政，

關心社會和周邊發生的事和物。而80後的熱情投入，也溶化了一些普遍政治冷感的市民改為關心時政。在爭取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等事件，那班年輕人曾被主流傳媒和社會批評為行為太激，但同時卻引起了社會廣泛討論天星和皇后碼頭事件，使市民主動探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增加了市民對時事的關注度。高鐵事件更不用多說，在80後大力推動反撥款或支持撥款的行動和爭論，幾乎連平日不接觸新聞的人，也對高鐵事件略知一二，帶起社會討論高鐵的熱潮，就像討論受歡迎電視劇的劇情那般熱烈。

八十後運動能使更多市民關心時政，是因為他們能使社會對政府政策有較深入和較容易的理解。他們會找出政府提出的政策方案內的缺點和不足之處，再清晰地列出來，讓公眾容易明白和討論，同時又會提出自己的意見甚至方案來讓公眾參考和引發公眾跟進與討論。促進了社會對政府政策、議案和公共事務的討論。雖則未必能令到更多人支持他們的見解，但最少能刺激社會的認知度。如高鐵事件，80後的熱心參與，使香港人重新思考當前的生存狀態、發展方向及制度問題，也使人民意識到人人皆有權利推行運動。

80後的出現也開始喚醒市民對環保、保育、人際關係的意識，多了人關心社會多元化發展，使部份人明白到，社會發展，不只得經濟，還有其他範疇需要兼顧。80後絕對可以像國內的鳥巢一代一樣，為社會帶來正力量，令身邊人也關

心社會起來，使更多人勇於在網上甚至真實中發表己見，這從網上討論區，天天也有網民熱烈討論時事，天天也有網民寫評論，Facebook每天也出現為時政表態的新群組可見。

「人心齊，泰山移」，80後的力量和團結，使政黨和政客也聆聽他們意見，甚至受他們影響，對某些事的取向也改變了，轉為接近80後的取向。例如民主黨決心反高鐵撥款、公民黨決定加入五區公投運動、高鐵撥款在80後的努力下，幾次被逼延期再議、獨立議員梁美芬在高鐵撥款投票時棄權（當然投票前，她那種支持高鐵撥款的言論和姿態，人們已看到了，即使棄權，也難以混淆視聽）及政府作出讓步（雖然十分輕微），那些輕微讓步包括讓菜園村村民申請賠償的期限，在2010年1月16日事件後，宣佈延長一個月、答應為大角嘴受影響的業主提供專業諮詢意見和承諾繼續和菜園村居民保持溝通。

為抗爭手法注入了新元素和創意

從多次八十後運動的事件中，可見社運的抗爭形式層出不窮、日新月異，有快樂抗爭出現、嘉年華、戲劇表演形式、用漫畫做宣傳品（就連財爺曾俊華也採取這種宣傳手法）、現場直播立法會開會實況和同時作出講解；苦行、斷食等等和平且具創意的抗爭模式，令抗爭更具正能量，比起以往的抗爭手法多了無限的創意性，加入了快樂元素，不再一

味的悲情，使公眾較容易接受，從而令到更多人參與社運。

也為號召人們、徵集同路人的方法加入新元素，與科技和互聯網結合了。創造了多方向網絡交織互動的發動，使互聯網成為輔助和帶動社運的工具，使召集同路人時一呼百諾。為日後的社會運動帶來新的模式和通訊方法。

激發90後對社會及未來發展的關注

八十後運動為90後、千禧後營造了一個年輕人事事關心、熱愛社會、關心社會、關心時政的氣氛和生活環境。為90後、千禧後開了一條大量年輕人勇躍參與社運的先例，為90後、千禧後參與社運提供了經驗和借鑒，為他們開通了道路，使90後、千禧後更易自發性行出參與社運的第一步，為以後的社會運動帶來了承先啟後的作用。

為弱勢社群向強權爭取權益帶來了正面支持和更大更團結的力量

80後的年輕人，很多是因路見不平，不滿弱勢被長期欺壓，即使自己不是被欺壓的一份子，也願意為了被欺壓的人走出來，為他們討公道和伸張正義。弱勢不再是孤伶伶的，除了基層政黨、工會，還有一大班自發的獨立個體青年人和他們站在一起，團結一致。

改變了新聞報導由主流傳媒壟斷的局面

由於不滿主流傳媒歸邊、選擇性報導、報導手法受幕後老闆影響，使傳媒成為了一些有錢人的發言工具，一班80後和獨立人士，在不受別人影響和干預下，開始自己報導新聞，說出自己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使事實不容被扭曲和抹黑，如獨立媒體的出現、網民在YouTube、Facebook寫出或做出自己的新聞報導，開創了報導新聞的新世代，人人都可以是記者，不用再依賴主流傳媒。

就像70年代的社運份子辦傳媒辦雜誌（如《七十年代雙週刊》），只是今日的80後和社運份子，辦的是網上媒體而已，本質一樣，如青臺、FM101、獨立媒體等等。

社運不用再依賴政黨

一年前，如果問大家，社運中最激最前線最多人參與的是哪班人，多數人應會回答是社民連和其支持者。但今天再問同樣問題，得出最多的答案應是一班獨立和自發的年輕人；一年前，如果問大家，社運的代表人物是誰，相信最多人答的會是長毛，現在，最多人答的，應是陳巧文。而這班年輕人不用靠任何政黨、不用政黨的帶領、有自己一套思想、沒有充斥大佬文化、不用被逼接受大佬的一套思想、不用指揮等吹雞也可發起一場又一場抗爭運動。和政黨不同，政黨充斥大佬文化、要聽指示、等帶領，局限性大很多，所

以動員力比現在自發的年輕人低很多。

以前議題和行動模式由政黨先定下和設定，如果市民同意和支持，便會跟隨政黨的領導去抗爭，很大程度上，議題和爭取模式的手法是被政黨所囿限了。現在已經沒有哪些議題沒人參與、行動只用哪些手法的局限。只要有人關心某一議題，即會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自發為這議題的事爭取，且爭取手法變化萬千，可能每次皆有新意思和突發行動，不像以往政黨帶領的那麼死板。

以前是群眾跟着政黨走，現在是政黨跟着群眾走。

這班新世代為社運帶來了新的一面和生機。

開始使政府改變舊有思維

在八十後運動白熱化前，政府的思維只有經濟發展，但現在，已開始改變思維，多在其他方面思量了，開始改變了政府的意識形態。

如政府比以前更注重保育，雖然注重程度還很低，還需有很大改進，但總算行出了第一步。活化中區警署、保留中環街市、活化工廈等政策都顯示了政府開始關注保育了。

政府也開始注重環保，啟德發展區的公共屋邨將會設計為綠色屋邨，引入大量綠化和環保設計。這些改變，相信與80後大力提倡發展同時要關注環保及保育有莫大關係。

筆者眼中的80後

近代中國評論家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說：「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國父孫中山：「民生是人民的生活（包括菜園村，古洞北村，大角嘴的人民），社會的生存（包括經濟、保育、環保等多方面因素），國民的生計（包括小市民和大財團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人人的權利應是平等的，沒有人能享有特權）。」「中國現在有許多青年志士，還是主張爭平等自由，歐洲在一兩百年以來，本是爭平等自由，但是爭得的結果，實在是民權。因為有了民權，平等自由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民權，平等自由不過是一種空名詞。」

1919年，中國成千上萬的青少年為了國家、為了民族而走上街示威抗爭，要求「外抗強權，內除國賊」；1966年蘇守忠在天星碼頭絕食抗議天星加價，而引起的抗議運動，開始有人自發保衛社會，以求喚醒人們去追求一個理想社會、60年代的工運和反建制思潮，人民去追求理想國度和反對政府的打壓與高壓手段、70年代的反貪行動去反對社會的不公義、保釣運動，為了民族心而走出來、1989年為了聲援北京的學運人士而出現百萬人大遊行、2003年，為了要求政府撤回廿三條而出現50萬人大遊行、2009年，中國的年輕網民為聲援鄧玉嬌，為她伸張正義，進而為社會討回公義，不惜

身體力行，冒着被捕的風險支持鄧玉嬌等等；今天的八十後運動其實就是當年這些運動的延續，性質雖不一樣，但內裏的精神也是相同的。同樣是為弱勢抱不平，同樣是反對不公義、同樣是去追求一個理想社會、同樣是反抗建制的壓逼、同樣是出於愛國愛港之心。今天的80後就是當年的「你」，今天的80後就是當年火紅年代的「你」，難道連「你」也不明白他們嗎？

沒有人會無故的有娛樂不去娛樂，而走去上街抗爭；沒有人不喜歡安坐家中而無原因的向特權階級和政府咆哮控訴。必定是出現了不公義的事情，令到真正的社會利益和真正的社會核心價值受損，人民才會走出來。因此，就算我們不認同，亦無可能每次皆認同80後出來抗爭的意見和觀點，我們也應樂觀其成，因為他們也是身體力行的去為香港好。即使不支持他們，最少，也不要敵視他們。

有人批評現在有些80後太激進，又拉鐵馬，又有警民衝突，又包圍禮賓府，難以接受和有些擔心。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說：「大學生激進點是應該的。」而80後中，有些激進點，也並無不妥。在89年，不是有約二萬名市民為了聲援李卓人而去包圍港督府嗎？為何同時是和平理性的行動，當年叫理性，今天就叫太激進呢？其實，只要不傷害到他人，令他人的身體受損，或侵犯了別人的自由和權利，激進點也不算過份。現在有外界認為80後激進，其實是因對他們感到

陌生。和以前的社運、從前年輕人的抗爭手法不同，現在的80後行動富有創意性，每次行動的手法皆千變萬化，召集方式由以往的等號召變成自己的自發，皆使社會對這些改變一時難以適應，導致認識不深，產生陌生感。一時難於理解，才會認為是激進，才會產生憂心的感覺。但久而久之，定必漸漸明白。正如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所說：「每一個世代都有其理想追求者及行動派，這是常態，不用感到甚麼震驚。」

對於政府和行動派的80後難以共處，水火不融，只要政府多和他們溝通，主動伸出友誼之手，矛盾定必減到最少。蔣經國說：「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政府如能用此態度去管理香港，用此態度去看待80後，就會發現其實大家是可以和睦共處的。

但肯定的是，只要一天政治制度還是處於不公義的狀態、弱勢還是被特權階級欺壓、政府的政策還是偏向既得利益的一班特權階級，為了他們而犧牲無數小市民的利益，青年人一定會前仆後繼的走出來，八十後運動、九十後運動、零零後運動、強大的社運力量一定會運行下去。只要看看大部份市民，包括是當醫生和律師的中產都感到置業艱難甚至無力置業、樓價高得脫離現實，即使努力工作二、三十年也買不起一個安身的居所時，地產商不斷興建的還是普羅大眾難以負擔的豪宅，甚至連市建局的重建項目和港鐵的上蓋項目，建的也是豪宅，而不是普羅大眾能負擔的中小型住宅和

居屋！市建局、地產商、港鐵不斷建豪宅，但豪宅價格不跌反升，全因政府政策偏頗。本地人買不起，政府就放寬和鼓勵內地人來買，只要內地人能花650萬來買樓，便可憑着投資移民，即時成為香港人。在這政策下得益的只有地產商，小市民卻會因樓價狂升而受苦；政府的政策只是吸引內地資金進貢地產商而非投放入香港社會以幫補市民，只會令貧富懸殊擴大。這只是政府向既得利益的一班特權階級傾斜而犧牲無數小市民利益政策中的冰山一角，但由此已可見我們的政府是如何荒謬！地產商賣樓是否明碼實價也是一個問題。買一個800呎的單位，隨時因是發水樓而只得500呎的實用空間；現在買樓只有天價和實價，卻沒有明碼，全因在政策上是許可的。在街市買菜，遇到呃秤也可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但買樓遇上呃秤卻投訴無門，這不是政府怕了和偏幫地產商的好例子麼？

要社會有所改變，價值觀行回正軌，並非一朝一夕的事，需付出不少代價。當中必定經歷失敗、再失敗，挫折、再挫折。但只要堅定心志，用勇氣去面對，抱着永不言敗、永不放棄的精神，向理想、向夢想不斷進發，終有一天，成功是會降臨的。

近年來，當你在大型超市結帳，或光臨連鎖式的零售店，如萬寧、OK便利店、7-11，或光臨連鎖式快餐店，如麥當勞，你例必會聽到店員對你說：「歡迎光臨。」當你離開店

舖的時候，店會會對你說：「再見、請下次再光臨。」或類似的說話。但奇怪的是，你每次聽到這些說話時，不會覺得很親切，甚至已經麻木了，連回應也省下。但當你光顧一些獨立的小型商店，如屋村的文具舖、家庭式的茶餐廳、街坊型的理髮店和洗衣店等，內裏的店主或店員向你打招呼、或親切的對你點頭微笑、甚或只是詢問你有甚麼需要，你也自自然然的有一份親切感，有一種大家既是買方賣方的商伴關係，也像朋友般的人性關係，不只是作交易那麼簡單，而是心靈上、情感上也有些交流。

為何會這樣？因為大集團、連鎖店的員工向你說出恭維說話，不是發自內心或出於真心，而時經過公司培訓、應上司或顧主的要求，才這樣做，且對每個顧客也是一式一樣的說話，那些說話是先經上司設定，然後員工遵令對顧客說出。員工只是在交差和執行命令，並不是發自內心或出於自然。他們只是一班被訓練出來，務必要說出那些話的「機械人」、所做的是根據被塞在腦內的公式，而非來自自己的思想，是機械化下的指定動作和人性。相反，那些小型的、街坊的、家庭式的店舖，內裏的店員向你問好，並不是出於訓練，乃是發自內心，所以你會覺得親切。

很可惜，香港正是一個這樣的社會，發展模式正是這樣，強權和政府要把人民培訓成「機械人」，把自己認為是對的思想，強塞入人民腦中，把人民的思想公式化及機械化，

把人訓練成一式一樣，每天跟着指令做事和生活的「機械人」。年輕時每天返學放學、做功課、考試，人人都是讀一樣的學科，吸收一樣的學識和技能，走到一樣的學校，學的是一樣的東西，考的是一樣的試，所有學科、知識範疇由政府和強權編定，不得偏離軌道，否則便是大逆不道。思想言行如不在強權批准的範圍內，或和強權借教育、傳媒輸入腦袋的不符，便要受到打壓和懲罰。長大了，也是像機械人般，每天返工放工OT、執行公司指令，做同樣的工作，且只可做指令內要求你做的事，就連何時吃飯休息，也是根據權力為你編排的程式表。日復一日的，每天做同樣的事情。如果不是這樣，根據自己喜歡的模式生活，尋找自己的生活方式，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而不跟着set好了公式行事，便會被視為好食懶飛，是異種，不是在貢獻社會。即使做生意，賺不了錢便是失敗，賺得越多就越代表成功，不管你做甚麼生意，你的生意有甚麼意義或對社會如何有幫助，總之賺不了錢的，便要結業和淘汰。但原來大部份收入，也只是奉獻給租金、業主和地產商，賺得越多便要奉獻越多，租金便越高。努力得不到合比例的回報。小商戶面對無理加租和地產商的壓榨，只可選擇默默接受和結業，不能有其他選擇。而政府和強權只是那些地產商的幫兇，而非協助小市民離開被無理苛索的局面。

人在機械化的社會下，只是被訓練成賺錢工具，每日重

複又重複做同樣事情，不容許有自己的個性，思想也只可以跟着強權輸入在你腦的思想，不可超出強權定下的框架，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生物。

社會發展模式也一樣，只可是朝着經濟和GDP發展，股市樓市上昇便代表發展，建築物越摩登便代表發展越成功。社會利益只能以錢來衡量，能賺錢的才是發展，能賺錢的才是好東西。所以不能帶來金錢利益的花草樹木和大自然環境，要不斷被砍伐和破壞，來興建能賺錢的豪宅、商場、基建。不能賺錢的人，便被視為廢人，視為沒有價值。強權認為是舊的建築，落後的東西，不管其歷史和文化價值，也要拆毀，再重建成可為特權階級賺錢的建築。所以你的菜園村要拆、九龍城寨要拆、郊外鄉村也拆，而郊外和原野不能賺錢，不能推動GDP，也要拆毀來改建為能賺錢的石屎森林。

如果你認為社會發展並不等於經濟和GDP發展、你的思維和強權要求和輸入你腦內的思維不同；如果你要求社會反思甚麼才是真正有利於社會，而不是以金錢來衡量社會利益，你就是異類，是白痴，是在搞破壞。如果你甚至走出來，用行動去表達自己的「另類」聲音、用抗爭或社運來表達你要求社會思維要有所改變，你便是在破壞社會的穩定和諧，是在搞分裂，是在破壞社會秩序。如果你在這些抗爭中，推鐵馬、爭取應有的示威權，不管你有否傷害別人，你便是激進、是暴力、是要不得，要受遣責。如果你的思維偏

離限定的框架，你便是離經叛道。

不管一路走來的社運人士，或是被社會標籤為所謂的「80後」，其實就是反思強權和政府一路以來把人性機械化、把社會發展公式化、把利益計算程式化、把人民思想限定化的行為。八十後運動是一種對社會既有公式的反思，我們應樂觀其成，不要用偏見的思維去把他們妖魔化，反應肯定和嘉許他們的行為，欣賞他們的熱情。

最後希望大家閱讀完本書後，原本對他們肯定的，會更肯定；原本對他們不理解和有誤解的，會認識到他們真實的一面。

補購

吳志森◎作品

《香港人•不高興》

《折翼牢籠》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香港人•不高興》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折翼牢籠》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八十後運動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八十後運動

香港未來應往哪裏去？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快樂的抗爭

「80後」的出現，提醒香港的本土身份覺悟，新一代真的以香港為家，不容財閥和高官上下其手，破壞香港人的家園。而且，他們不是上一代火爆爛撻的革命青年，他們很多是溫柔的素食主義者和田園生活愛好者，甚至視抗議、絕食和苦行是身體和靈性的修煉。他們運用新的知識工具和動員網絡，剖析官商勾結的制度，解放香港人的思想，身體力行，付諸行動。

快樂抗爭是很理性的，很過癮的，而且有實效的。不玩，香港就會玩完。不玩白不玩。

——陳雲

溫柔的解放

封面設計：原秋白

ISBN 978-962992240-5
80
9 789629 922405
www.subculture.com.hk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SCB 522 $80
ISBN : 978-962-992-240-5
Printed in Hong Kong